

# 學術研究

## ACADEMIC RESEARCH

ISSN 1000—7326

總第106期

1991 · 3



廣東華達企業(集團)有限公司

HUA DA ENTERPRISES (GROUP) LTD GUANG DONG PROVINCE

屬下單位  
 廣東華達機器廠 廣東華達機器研究所  
 廣東華達鋁材廠 廣東省飼料機械設備總廠  
 廣東華達裝飾工程部 廣東華達實業拓展部  
 中外合資廣東華達燃氣設備廠

地址 Add: 廣東省肇慶市廠排街  
 CHANG PAI—STREET, ZHAO QING CITY,  
 GUANG DONG PROVINCE  
 電話 Tel: 232182 232192 235181  
 電掛 Cable: 2151 傳真 Fax: 0758—235181  
 郵政編碼 Post code: 526020

法人代表: 葉永強



#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宋健



地址 Add: 廣東省中山市中山港  
 ZHONG SHAN PORT,  
 ZHONG SHAN CITY,  
 GUANG DONG PROVINCE

電話 Tel: 596818  
 傳真 Fax: 596877  
 電掛 Cable: 9179  
 郵政編碼 Post code: 528437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是國家科委、廣東省人民政府和中山市人民政府三方於1990年3月聯合興辦起來的，是經國務院批准的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也是目前由國家科委直接管理的四個高技术產業開發區之一。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是以國內大院、大所、大學雄厚的科技力量為後盾，引進外資和國外先進技術及設備，採取以中外合資為主，包括其他合作方式，開發、引進、生產和銷售高新技術產品為宗旨的融技工貿為一體的綜合性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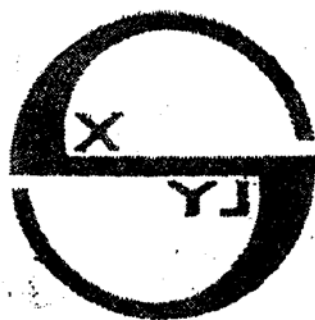
展翅再腾飞  
 办好高科技  
 谢明仁  
 赞中山高科技区

中山市委書記謝明仁題詞

促進回化  
 拓展科技  
 湯炳權

中山市市長湯炳權題詞





# 学 术 研 究

**主 编：梁 钊**

**副主编：张硕城**

|                  |   |
|------------------|---|
| <b>编 辑 者</b>     | 学术 研究 编 辑 部<br>广州市越秀北路222号<br>邮政编码：510050 |
| <b>出 版 者</b>     | 广东 人 民 出 版 社                              |
| <b>印 刷 者</b>     | 广东 新 华 印 刷 厂                              |
| <b>发 行 者</b>     | 广东 省 报 刊 发 行 局                            |
| <b>订 阅 处</b>     | 全 国 各 地 邮 局 (所)                           |
| <b>国 外 总 发 行</b> | 中 国 国 际 图 书 贸 易 总 公 司                     |
| <b>国 外 代 号</b>   | BN268          北 京 399 信 箱                |

代 号：46—64    国 内 定 价：每 册 1.50 元

国 内 统 一 刊 号：CN44—1070

ISSN1000—7326

广 告 经 营 许 可 证 号：粤 工 商 广 字 01044 号

本 刊 每 逢 双 月 25 日 出 版



学术研究（双月刊）一九九一年第三期（总第106期）

目 录

· 哲 学 ·

- 《资本论》的科学性与生命力…………… 刘景泉（6）  
也谈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  
——与肖新生同志商榷…………… 易佑平（14）

· 经 济 学 ·

- 时间眼界及其连续性：计划与市场的动态结合方式  
…………… 刘志彪（21）  
新加坡宏观经济管理模式的特点…………… 曹云华（26）  
外向型经济发展中的出口增长与收益调整  
——台湾与广东的比较研究…………… 王 珺（29）  
股票所反映的股权关系及法律调整…………… 潘嘉玮（33）

· 教育 学 · 人 才 学 ·

- 对广东人才工作的回顾和思考…………… 李作铭（36）  
九十年代珠江三角洲的基础教育…………… 吴光普（39）

· 历 史 学 ·

- 民本主义论纲…………… 陈胜彝（45）  
中国近代军阀与中国近代化进程…………… 郭剑林（52）  
清代东南地区货币地租质论…………… 陈支平（58）

· 中 华 民 族 凝 聚 力 研 究 ·

-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首次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萃  
…………… 关履权、李锦全、孔庆榕、李权时、李明华、阮纪正（64）



责任编辑 黄荣显

· 文学 · 语言学 ·

- 论《文心雕龙》的逻辑体系····· 劳承万 (74)
- 元好问诗论新探····· 刘明今 (81)
- 悲壮的史诗: 论左联作家的乡土小说····· 杨剑龙 (86)
- 林贤治《人间鲁迅》漫评····· 张 华 (93)
- 现代专科(翻译)词典的释义系统
- 谈王宗炎主编的《英汉应用语言学词典》····· 陶原珂 (99)

· 逻辑学 ·

- 推理的分类及其标准质疑····· 王经伦 (104)

· 企业研究 ·

乡镇企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关键

- 广东省澄海县发展乡镇企业的思考····· 邹培基 (108)
- 对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思考····· 周耀文 (111)
- 管好用活资金, 使企业经济持续增长
- 广东顺德北滘南方电器厂的实践与思考····· 苏 林 (114)

· 书 评 ·

- 《社会主义辩证法新探》的进展····· 李恒瑞 (116)
- 《第三产业经济学》的探索····· 陈圣河 (119)

· 书海酌蠡 ·

- 释“肥而不臃”(谭步云·113) “均露均霜”应作何解(王双怀·107)



# ACADEMIC RESEARCH

No. 3, 1991

## CONTENTS

- The Scientificity and Vitality of Marx's "Capitat".....Liu Jingquan ( 6 )
- Another Talk about the Starting Point of Marxism --- Questioning  
to Mr. Xiao Xincheng.....Yi Youping ( 14 )
- An Outlook of Time and Its Continuance: A Dynamic Combination  
of Planning and Market ..... Liu Zhibiao ( 21 )
- The Characters of Singapore's Pattern of Macroeconomic Managem-  
ent ..... Cao Yunhua ( 26 )
- The Adjustment between Export Increase and Profits in the Develo-  
pment of Export-oriented Economy -- A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aiwan and Guangdong..... Wang Jun ( 29 )
- Stock Relationship and Legal Adjustment Reflected in the Share  
Certificates..... Pan Jiawei ( 33 )
- Retrospection to the Management of Qualified Personels in Guang-  
dong..... Li Zuoming ( 36 )
- The Elementary Education in the Delta Area of the Pearl River  
during 1990s.....Wu Guangpu ( 39 )
- An Outline of Minbernism..... Chen Shenglin ( 45 )
- The Modern Chinese Warlords and the Modernizational Course in  
China.....Guo Jianlin ( 52 )
- The Substance of the Money Rent Adopted in the South-east Area  
of China in Qing Dynasty.....Chen Zhiping ( 58 )
- Summaries of Five Theses of "The First Symposium on Strenthening  
the Cohes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Guan Luquan, Li  
Jinquan, Kong Qingrong, Li Quanshi, Li Minghua, Yuan Jizheng ( 64 )
- On the Logical System of "Wen Xin Diao Long".....Lao Chengwan ( 74 )



- A New Approach to Yuan Haowen's Theory of Poetry  
..... Liu Mingjin ( 81 )
- A Solumn and Stirring Epic: the Rural Novels Written by the Writers of the 'Left Union'.....Yang Jianlong ( 86 )
- A Random Talk about "Lu Xun in Man's World" by Lin Xianzhi  
.....Zhang Hua ( 93 )
- A System of Explaining Meaning in a Modern Discipline Dictionary  
..... Tao Yuanke ( 99 )
- Question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Reasoning and Its Criterion  
.....Wang Jinglun ( 104 )
- The Cruxes of the Continued, Stable and Coordinated Growth of Township Enterprises --- Consideration of developing township enterprises in Chenghai County, Guangdong Province  
..... Zou Peiji ( 108 )
- Several Points of Pondering over How to Strengthe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an Enterprise.....Zhou Yaowen ( 111 )
- Well Administering and Utilizing the Capital Funds to Make Enterprise Economy Increase Continuously --- A retrospection to the practice of Guangdong Shunde Beijiao South Electric Appliances Plant..... Su Lin ( 114 )
- The Advances in the Works "A New Approach to the Socialist Dialectics".....Li Hengrui ( 116 )
- The Seeking in "Economics of the Third Industrials"  
.....Chen Shenghe ( 119 )

## 《资本论》的科学性与生命力

刘景泉

马克思以毕生心血凝聚而成的《资本论》，象巍峨的泰山那样雄伟，象浩瀚的东海那样宽厚，象喷薄欲出的朝霞那样动人。从《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问世以来，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检验，经过无数具有各种不同观点的学者的评说，谁都不能否认《资本论》是一部巨著。然而由于各种原因，非难甚至攻击《资本论》者仍然大有人在。在当今风云激荡、世事多变之秋，认真领会《资本论》的基本原理，深刻认识它的伟大生命力，评论一下某些奇异的观点，看来是完全必要的。

《资本论》的科学性与生命力，首先在于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灿烂前景，给无产阶级和其他广大劳动群众以巨大的精神力量。

正由于《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揭露出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矛盾，论证了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否定的历史必然性，击中了资本主义辩护士的要害，因而它总是引起资本主义及其代言人的恼怒和攻击。当然，也有同志由于不明真相而怀疑《资本论》的正确性，产生了种种困惑。有的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与古典资本主义不同，可以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目前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那么发达就是证明，相反，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却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因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否定谁、谁战胜谁尚是一个谜。这里的确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的论断是否依然正确？对此必须作出有理有据的回答。

毫无疑问，现代资本主义与古典资本主义相比，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特点：在所有制方面，除了私人垄断资本的发展外，以国有资本和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的国家垄断资本不断壮大，国际垄断资本空前发展。在分配方面，推行“福利国家政策”，改善群众生活福利，鼓励“工人持股”，让工人成为企业小股东，并得到一定的股息红利。在人际关系



方面，通过“工人参加管理”，缓和劳资的矛盾。在生产方面，特别重视科技的研究和应用，从而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等等。无视上述诸方面的变化，否认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给广大群众带来的实惠，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把这些变化夸大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已经改变，以为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占有制的矛盾已经解决，资本主义生产不会再发生停滞和危机，则是一叶障目，根本上违背了客观实际。

从所有制方面来说，不论是哪一类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占人口极少数的大资本家，仍然占有或垄断着国家经济命脉，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群众，却只有必要的生活资料和微不足道的“资本”。总的来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异化、相脱离的状况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仍然象《资本论》所分析的：“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事实上的基础或起点。”<sup>①</sup>虽然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创造了物质条件，但它的资本主义本质并没有改变，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sup>②</sup>在分配方面和管理方面，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些缓和劳资矛盾的办法，如推行“福利政策”，提高工人的工资、福利待遇，让工人掌握一些股份，吸收一些工人参加某些管理，等等，但是这仍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和管理方式的性质。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与管理方式，是在资本主义所有制基础上产生的，其目的是维护资本家对劳动群众的剥削和统治关系。某些方式方法的改变并不意味着本质的改变。提高了的工人工资，仍然是提高了劳动效率的劳动力的价值。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仍然为资本家所剥夺。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率，总的趋势是逐步上升。劳动群众持有一点股份、参与分红和参加某些管理，根本无法支配企业的性质和命运，仍然象《资本论》所揭示的那样：“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sup>③</sup>

无需讳言，有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在某个时期发展相当迅速，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已经解决，资本主义不再会被社会主义所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必然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否定，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的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异化，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人与人之间相异化。“随着资本的发展，劳动条件同劳动相异化（颠倒）。颠倒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而不只是与之相适应的分配方式的基础。”<sup>④</sup>资本主义这种异化、颠倒的生产方式及其分配方式，虽然在一定时期、一定阶段上能刺激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制度本质上是不合理的，是妨碍生产力发展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化生产力存在着尖锐的、不可克服的矛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全面地、深刻地分析了这个问题：“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

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末，它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sup>⑥</sup>

有的同志原以为社会主义否定资本主义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短期内就可以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可是当看到目前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呈现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景象，就走向另一极端，得出资本主义“永垂不朽”的结论，这是一种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思想方法。其实，社会主义否定资本主义是异常复杂、困难的事情，是长期的、曲折的过程。中外的近现代史表明：由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在各国情况不同，双方展开斗争的条件、方式不同，以及各种内外交错的因素，历史的发展会呈现出各种不同的画面：有一类剥削制度的国家，腐朽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群众对剥削阶级的统治表现出异常不满的情绪和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加上有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从而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以社会主义制度取代了剥削制度，俄国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便属此例。另有一类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去缓和社会矛盾，社会生产力仍在曲折地发展，群众生活还比较安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恐怕还不存在用新制度去否定旧制度的条件，因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sup>⑦</sup>还有一类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矛盾虽然很尖锐，人民群众对现实也很不满，具备了社会革命的客观形势，但是由于缺乏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领导艺术高明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组织群众的斗争，一时也无法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由此说明，社会主义否定资本主义，已经不是空想、幻想，它早已在地球上某些国家里变为现实。即使尚未具备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由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的作用，在这些国家也总有一天会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曲折的、复杂的过程。因此，既不要看到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目前的相对稳定与繁荣就以为资本主义“永垂不朽”，也不要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某些国家实现就以为短期内就可以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这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作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结论的。

有的同志看到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就怀疑社会主义制度是否优越，社会主义否定资本主义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持这种观点的同志，确实看到了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的问题，但他的疑惑或结论却是不正确的，原因是他缺乏具体分析，未能把现象与本质区分清楚。我们从许多材料可以看到，造成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大体上有如下几方面原因：一是某些领导人以权谋私，腐化变质，欺压群众，引起广大群众愤怒。另一是外部敌对势力渗透，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施展“和平演变”的战略在某些国家得逞。还有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多样性、复杂性，人们一时还无法认识其必然性，还不可能正确地建设社会主义。以上几种原因，都不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或社会主义原则本身所引起的，相反，恰好是破坏、违反或没有认识社

会主义原则、规律所造成的。可见，不能把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问题，与社会主义制度或原则混为一谈，不能以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暂时出现的困难和反复去否定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经过历史实践的检验，《资本论》下述论断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sup>⑦</sup>

## 二

《资本论》所以具有科学性和生命力，还因为它揭示了社会生产各个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为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有人认为，《资本论》是19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的作品，而今是20世纪末，科学与生产发展水平、速度大大超过马克思的年代，《资本论》的原理对今天不可能适用了。

这种逻辑推论与结论是不能成立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按照那些人的逻辑：20世纪的科学生产发展了，19世纪的理论（不问哪一种理论）对今天就不能适用。这种前提与结论之间显然没有必然的联系。许多科学理论，由于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给人们的实践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因而它具有永恒性，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阻隔而失去它的效力。当然，它会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入和发展而更加丰富起来，甚至修改它的个别的观点，但是，它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却保持着其伟大的生命力。《资本论》也是属于这样一种科学理论。因篇幅所限，我们只是着重围绕生产建设有关的几个方面，探索一下《资本论》的正确性及其对今天人们实践的指导意义。

### （1）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sup>⑧</sup>这说明：劳动过程（生产过程）的主体是劳动者，即有目的进行生产活动的人，劳动过程（生产过程）的客体是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要处理好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综合）的关系，或人与物的关系。劳动者是致动者，主动者，是驾驭、使用、改造、发明、制造生产资料的主体，只有不断提高人的素质（包括体力和智力），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异化，两者处于分离、对立的地位，劳动者就不可能处于自觉、积极的状态，甚至会产生象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居于这样考虑，马克思强调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sup>⑨</sup>决定劳动生产率高低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劳动者之外的自然条件，它包括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土壤的肥力、



鱼产丰富的水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森林、金属、石油等等。无怪乎《资本论》这样说：“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sup>⑩</sup>马克思关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人与自然等等关系的论述，对于我们今天的生产建设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如果说，我国某些时期社会生产的发展比较健康，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处理好生产过程中的人和物的关系，反之，往往是没有处理好这些方面的关系。

## （2）科学与生产的关系

经济建设中另一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是科学与生产的关系。马克思以惊人的智慧，揭示了生产与科学的辩证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一方面社会生产是科学发展的基础、源泉。这是因为工农业、交通运输业等生产发展的需要，是科学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sup>⑪</sup>同时，社会生产为科学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和物质条件。“沃康松、阿克莱、瓦特等人的发明之所以能够实现，只是因为这些发明家找到了相当数量的、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已准备好了的熟练的机械工人。”<sup>⑫</sup>另一方面，科学又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巨大动力和根本保证。科学水平高低，决定着劳动者、生产资料的水平高低。生产过程的三要素，物化着科学的因素。“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sup>⑬</sup>科学揭示了生产发展的规律，为生产发展指明方向，解决生产过程的难点，成为生产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正如《资本论》说的：“应用力学、化学等等，总之就是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这个原则到处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sup>⑭</sup>马克思这些论述，至今仍然是金科玉律，对于当代的生产建设，仍然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那种认为《资本论》落后于今天的科学水平，没有看到科学的伟大作用等等的非议，是毫无根据的。

## （3）社会生产系统中诸环节之间的关系

一个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是由诸方面、诸因素按照一定规律构成的有机整体。被誉为社会系统论创始人的马克思，揭示了社会系统的内在结构及其运动规律。马克思认为，构成社会经济生活的生产、分配、交换（包括流通）、消费四大环节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生产是决定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基础，但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状况又直接制约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拿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来说，生产决定着消费表现在：第一，它为消费提供材料、对象，没有生产，就不可能消费。第二，生产状况规定着消费的性质、消费的方式，人们消费的数量和质量归根到底决定于生产力水平的高低。第三，生产促使消费的需要，例如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观众。“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sup>⑮</sup>这是因为：第一，产品只有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不能被人消费的产品实际上是一种废品。第二，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需要，人们消费的需要推动着生产不断革新和发展。生产与交换也是互相作用、互相

制约的。毫无疑问，生产是交换的基础，社会生产的发展水平决定着商品交换的水平。然而必须看到，商品交换状况又直接影响社会生产的状况。“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能够对组织极不相同、按其内部结构主要仍然是从事使用价值生产的那些部门起中介作用。”<sup>⑥</sup>如果商品交换、商品流通顺畅，金融、信贷业务发达，就会大大促进生产的发展；反之，如果商品流通受阻，商品滞销，市场疲软甚至出现危机，金融、信贷业务阻塞，那就必然导致生产停滞，甚至崩毁。生产与分配也是经济生活中的两个重要环节。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但是，分配的方式、分配的数量和质量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积极性，对社会生产的状况有巨大的反作用。马克思经过周密的分析，然后指出：“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互相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sup>⑦</sup>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揭示了社会生产系统中两大部类生产的内在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第Ⅰ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生产）和第Ⅱ部类生产（消费资料生产），互相依存、互为条件、互相转化并共同构成社会生产的整体。第Ⅰ部类要为第Ⅱ部类提供生产资料，用生产资料武装第Ⅱ部类；第Ⅱ部类要为第Ⅰ部类提供消费资料，使第Ⅰ部类生产能持续地进行。这两大部类之间必须交换，在简单再生产时是 $I(v+m) = IIc$ ，在扩大再生产时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都必须提供出剩余产品给对方，如“第Ⅰ部类必须用它的剩余产品为第Ⅱ部类提供追加的不变资本一样，第Ⅱ部类也要在这个意义上为第Ⅰ部类提供追加的可变资本。”<sup>⑧</sup>

还必须指出，马克思在分析社会经济生活时，特别强调农业、交通运输的战略地位。农业为整个社会各行各业的人提供不可缺少的粮食，为第Ⅱ部类生产提供原料，为第Ⅰ部类生产提供必要的物品，因此“农业劳动（这里包括单纯采集、狩猎、捕鱼、畜牧等劳动）的这种自然生产率，是一切剩余劳动的基础”，“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也就是使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工业的人有实行这种巨大分工的可能”。<sup>⑨</sup>在现代化生产条件下，交通运输是商品生产、商品流通的血脉。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生产来说就越是重要”。<sup>⑩</sup>那些闭关自守、生产狭小的社会，其交通运输必然是原始的、落后的。

我们仅从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有关科学与生产，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以及社会生产系统中诸环节、诸要素之间的关系的论述中，可以明澈地看到《资本论》的基本经济理论及其所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规律、生产与需要互相制约的规律、商品价值规律、货币流通规律、剩余价值和积累规律、再生产规律、有计划分配劳动规律、时间节约规律、人口规律等等，仍然是当今现代化大生产的指南，仍然是正确处理社会与自然，经济与政治，农、轻、重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法宝。回顾以往的历程，我们深深感到，当我们遵循《资本论》所揭示的客观规律办事的时候，我们就取得重大的成就，反之，就会遭到严重的挫折。那些无端非

难《资本论》的人，该是结合现实自我反思的时候了。

### 三

《资本论》是一部伟大的经济学著作，同时又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资本论》的科学性和生命力，不仅因为它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经济建设的规律，而且还在于它充满着令人叹为观止的深邃的哲理，给人以无穷的智慧和启迪。

首先，马克思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各种经济问题，使《资本论》成为哲学与经济学融为一体的杰出著作。马克思在1867年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到：给天主教的周刊《纪事》寄去了一本书（即《资本论》第一卷），“他们对于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不会不予以注意。”<sup>②</sup>《资本论》的体系、内容和叙述的方法都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灿烂光芒。《资本论》的体系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各个原理、范畴充满着联系和转化的辩证法；《资本论》揭示的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运动规律，揭示的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的内在关系及其规律，就与唯物辩证法的原理、规律、范畴交织在一起；《资本论》的叙述方法体现了逻辑与历史一致、从抽象到具体等辩证逻辑方法。有位俄国学者在彼得堡的《欧洲通报》发表了一篇专谈《资本论》方法的文章，认为在马克思看来，“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的社会关系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马克思赞成这位俄国学者对《资本论》的方法的分析，指出“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考察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sup>③</sup>

其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总结了人类思维历史的经验教训，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形成了在社会实践基础上把辩证法、辩证逻辑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三者融为一体的哲学思维方法。

有些西方学者认为《资本论》的方法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不科学的方法。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马克思确实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甚至承认他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但是他又明确地指出他的辩证方法“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sup>④</sup>恩格斯对此作了正确分析：“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sup>⑤</sup>无疑，黑格尔在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自觉地提出了辩证法体系，但那是以绝对观念为本原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体系，认为“辩证的运动本身，则以纯粹的概念为它自己的原素；它因此具有一种在其自身就已经彻头彻尾地是主体的内容。”<sup>⑥</sup>“理念完全是自己



与自己同一的思维，……而且在这个对方里只是在自己本身内的活动。”<sup>⑩</sup> 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关于辩证法、认识论、逻辑三者同一的合理思想，在《资本论》中实现了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辩证法、认识论、辩证逻辑三者统一的构想。《资本论》运用唯物辩证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体现了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一致；《资本论》的范畴、原理及其体系，正确反映了人类认识运动的辩证过程及其辩证规律，体现了唯物辩证法与认识论、逻辑的有差别的同一。难怪列宁这样评论说：“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sup>⑪</sup>

再次，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分析社会形态的变迁及其规律，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及其规律，使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变成科学。众所周知，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两大发现之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性；运用劳动二重性学说创立了新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论证了劳动者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及社会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运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全面地、系统地考察了科学、艺术、哲学、法律、政治、宗教等等的地位和作用。因此，“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sup>⑫</sup>

总之，马克思的《资本论》既是一部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巨著，又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哲学珍品，它不仅赢得了世界上亿万群众、科学工作者的崇敬，而且还征服了为数不少的比较公正的西方学者。例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史家雷蒙·阿隆曾经这样评论说：“《资本论》是一项伟大的工程，我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它又是一项天才的工程。”<sup>⑬</sup> 我们奉劝那些还没有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就随便加以非议的人，先静下心来老老实实地学习《资本论》后再发议论吧。我们规劝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抱有成见而信口开河的人，还是收敛一点为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26页

② 同①，第25卷，第495—496页

③ 同①，第678页

④ 同①，第46卷下册，第536页

⑤ 同①，第25卷，第279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⑦ 同①，第832页

⑧ 同①，第201—202页

⑨ 同①，第42卷，第120页

⑩ 同①，第560页

⑪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5页

⑫ 同①，第419页

⑬ 同①，第46卷下册，第219—220页

⑭ 同①，第505页、424页

⑮ 同①，第46卷上册，第28页

⑯ 同①，第25卷，第367页

⑰ 同①第46卷上册，第36、37页

⑱ 同①，第24卷，第584页

⑲ 同①，第25卷，第713、715、716页

⑳ 同①，第46下册，第16页

㉑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239—240页

㉒ 同①，第20、23页

㉓ 同①，第24页

㉔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122页

（下转第25页）

# 也谈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

——与肖新生同志商榷

易佑平

肖新生同志所撰的《马克思主义出发点探析》一文（见《学术研究》1990年第5期）对马克思主义学说“首先描绘什么问题”做了有益的“探析”。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问题实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所以我将不止于自己的笔拙，兼与肖新生同志商讨，望能因此增加我对该问题的理解。

## 一、与肖文的商讨意见

肖文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由若干观点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构成的理论体系。因此，“出发点，也就是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它是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的第一个前提，“是一个最简单、最普遍、最抽象、最直接而又最基本的概念或范畴，并且孕育着矛盾的‘胚芽’”，“具有提挈整个理论的作用”。这是很值得商榷的。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倒影”通过“凹透镜”的作用，并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中贯彻、最终扬弃了费尔巴哈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列宁指出：“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做了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地方，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英明地迈进的一步。”<sup>①</sup>但是辩证法，也即马克思主义体系的逻辑结构不仅是黑格尔式的纯粹概念运动过程，而且更是客观物质世界内在的普遍的规律。恩格斯把这两种辩证法分别称为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并且指出：“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在整个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着的由于对立而产生的运动的反映而已”。<sup>②</sup>马克思主义逻辑体系是来源于自然界的合乎规律化。因此，出发点决不能是一个“逻辑的起点”，而只能是一个现实的起点。同样，作为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的第一个前提，也只能是一个现实前提。它不是一个“概念或范畴”，甚至也不单纯是“原子”或“分子”。当然，作为理论体系的起点，它不仅是“最简单、最原始、最直接”的，而且也应该是“最普遍、最抽象”的。它的直接性在于它的绝对现实性，它的普遍性在于它的实在统一性。因而，它不仅孕育着矛盾的“胚芽”，而且本身即是全部矛盾最生动的展开。

如果肖文认为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有它们各自的出发点，就不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的一贯立场上，从不同的角度考察社会和历史的结果。同时也正因为马克思把经济学和社会学变成了哲学，才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迄今为止唯一逻辑严谨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哲学与经济学、政治学（或社会学）在马克思那里唯一不同的地方只在于，研究对象的广度、深度和角度的不同，它们具有逻辑的一贯性。

把唯物主义流派存在的根本原因看成是由于它们在实际上从不同的物质或物质的不同侧面出发也是错误的。肖文把物质分成自然物质和社会物质两种，而且，“不仅如此，整个自然物质是以无限的时间和无限的空间作为存在形式的，其中又可分为‘纯自然物质’和‘社会自然物质’，而前者是尚未进入人的认识范围的物质，只是人们将来的认识对象，决不可能成为现实中认识的出发点……”，以前的唯物主义是从自然物质（或部分自然物质）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则以社会物质为出发点。我认为这种物质分类法纯属多余。这里的“纯自然物质”等同于康德的自在之物，社会物质类似于列宁的“我们之物”，但是把两者绝对地区别开来了，就不能说明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的转化。诚然，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的形成是以以前和现在作用于人类社会的物质世界为基础的，但是有一个自明的命题：物质的统一性原理。自在之物之于我们仍然是“自在”的，但是根据物质统一性原理，一切思维的他在之物（包括思维的物质器官），都是客观的实在，它们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紧接着，肖文把社会物质换成生产方式，并随着理论的深化，又把生产方式换成生产力，以之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出发点，他认为：“有了生产方式才有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才有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这样，唯物主义的第一原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原理让位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原理，这是缺乏历史根据的。

“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sup>③</sup>，生产方式也产生于原始人开始制造工具的时期。然而，在此之前，正在形成中的“挥舞着棍棒的原始群”已经有了音节分明的语言了，<sup>④</sup>而语言的确是人类的第一次意识活动。

有三种物质再生产活动，一种是个体的肌肉力的再生产，一种是种的繁衍，一种是生产资料的再生产。很显然，前两种再生产曾经一度决定着人类的存在和发展，而最后一种再生产活动（即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方式）是在较晚的时期才开始影响人类的生活，并随着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私有制和交换关系的确立而越来越决定人类的存在和发展。如果以生产力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就会使得马克思主义堕入感觉主义、存在主义的历史观中，割裂整个史前和关于无机物合乎规律地运动的自然史以及有机物神奇的进化史。

特别令我不敢苟同的是，肖文认为：“生产力就是……比构成它的要素还要高级的物质世界。”这种观点可能会导致商品拜物教或货币拜物教等等。人的本质力量就在于，人不仅是自在的对象化存在物，而且是对象化自身。正是人类才给自然物赋以社会的力量。然而，由于初民的无知，或由于私有制的存在，生产资料等自然物掌握在社会的一部分人手中，从而它也就是支配人的力量，并与主体的人——劳动者部分地或完全地分离。



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才支配着人和社会的命运。然而全部历史都曲折但坚决地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生产力总是以巨大的破坏性,把人类社会一个阶梯一个阶梯推向自由之旅。马克思主义者的全部热望就在于此:通过不断积累各种物质手段,特别是通过对自身的改造(消灭私有制和阶级),从而达到完全驾驭生产力的目的,向自由的必然王国迈进。

我完全同意肖文对“抽象的人”以及集体的人的看法。费尔巴哈的人,不仅是一个感性的,而且仅仅是一个受动者。马克思第一个给实在的人赋以能动的意义,从而在根本上改造了费尔巴哈的人的概念,从费尔巴哈“爱的幻想”中回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现实生活中来。马克思主义的全部革命性就在于,始终不移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代表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锐利的武器,积极地参与改造世界的活动。我十分赞成肖文的意见,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以人民群众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因为“人民群众”这个概念一旦离开历史现实,就成为最空洞无聊的谎言。马克思分析了历史上存在的各个阶级的地位以及相互关系,从而指出了无产阶级必将使全人类获得解放。他的学说充满着党性,这个党性就是:以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不仅为着无产阶级切近的利益而奋斗,而且代表整个运动的未来。

## 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出发点

要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正如肖文所做的那样,必须首先明确出发点这个概念的意义。其实所谓出发点,不外就是理论所从来的地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按照客观世界(包括人类社会)的本来面貌,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肖文由于过分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以前唯物主义的区别,从而拒绝把客观物质世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出发点。然而,“按照客观物质世界的本来面貌,认识并改造世界”这句话本身就包含着一个必要条件:只有不但唯物地,而且辩证地考察客观物质世界,才能达到按其本来面目反映它并最有效地改造它从而利用它。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唯物主义根本没有更多的意义,只是在这里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sup>⑥</sup>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原理分野,但这并不意味着唯物主义完全解决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一切唯物主义都承认意识来源于物质,但是对于意识怎样来源于物质,特别是意识怎样回到物质中去这两个问题,却只有运用辩证法才能得到彻底解决。

以前的唯物主义,不论是朴素唯物主义,还是机械唯物主义,对于意识怎样来源于物质的问题作出了要么神秘主义要么镜子式反映论的回答;而对于意识如何回到物质中去的问题,如果不是断然地否定之,就一无例外地在此过渡到唯心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则认为:意识是物质的反映和人脑的机能,它的反映是能动的,是从呈现在物质世界的表面现象着手,进而揭示物质世界内在的运动规律。另一方面,人的思维本身也有自己

的相对独立的运动规律。认识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但精神向物质的转化问题是旧唯物主义者连想都不敢想的问题。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马克思主义把自身建筑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上，而不象黑格尔那样，把他的整个体系建筑在空中楼阁之上。马克思主义从“有”过渡到“有”的辩证过程，也根本区别了黑格尔从“无”过渡到“无”（绝对精神）的辩证过程。

同时，虽然任何意识形态都来源于物质，但是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只有在讨论物质第一性的条件下，它才是绝对的，离开这个条件，它也与任何其他原理一样，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我们可以认为客观物质世界是一切学说的出发点，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明确的问题，并没有同样明确的结果。由于思维规律的相对独立性，在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这个出发点被弄得面目全非了。唯心主义通过迂回曲折的自我否定，则直接地站到了这个出发点的对立面上了。

唯心主义总是有一个假想的（逻辑上的）世界开端，这个开端如果不是借助于盘古的“开山斧”或夏娃的原罪，也与毕达哥拉斯学派那样，把数学逻辑或者各种学说体系人为规定的元逻辑设定为世界的起源，还不问这个起源是否有它自己的起源。这意味着，唯心主义在追溯历史时，历史就是他们头脑中的逻辑向前演绎。而当逻辑经过如此漫长的僵死的黑暗即将看到明亮的阳光和千娇百态的自然风光以及异态纷呈的风土民情时，他们的思维因为感到末日的来临而停止活动，从而在思辩终止时开始他们的世界历史。柏拉图把“善”作为出发点，并把“最高的善”作为最终目的，而从不问（实际上不能问）“善”之所从来和之所依归。唯意志论者叔本华、尼采，把意志作为物质世界的运动之源，而不管在意志之先，物质世界已有其自在的运动之源；现代的存在主义哲学，把其体系建立在对存在概念的逻辑分析上，他们的存在只是一个纯粹的概念，而不愿意问活生生的实体的存在。

在经济学上，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亚当·斯密以前的重农学派，是对资本主义在漫长的中世纪艰难地“怀胎”阶段的反映，但是他们并没有理解资本和劳动，更没有处理好资本、劳动和土地三者的关系，他们的学说是以土地为出发点的。以亚当·斯密开端的古典学派，完全地站在了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把资本作为社会生产“逻辑的起点”，而劳动和土地则都是可以用资本加以“收买”，从而只是资本的附属形式。但是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感到，资本这个“起点”不能是无条件的，它必须遵守市场规律，于是出现了凯恩斯主义以消费心理学为出发点的经济学唯心主义。然而，凯恩斯主义并没有完全医治好资本主义经济的脓疮。他一方面强调了供求规律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加强了政府的财政和货币平衡功能，对市场进行干预。近年来兴起的新古典学派，虽然该学派声称他们的目的不是要回到十九世纪，但是他们唯一所谓新的东西，就是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对政府的干预政策提出了异议。他们的这种以人们对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的自由选择为出发点的幼稚学说，自然是受到历史发展的否定，它与古典学派的区别就是：古典学派是在资本的优势还不明显，

封建的残余还很严重的情况下的产物，而新古典学派则是资本和劳动获得了完全自由的象征和前奏。但是，无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怎样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怎样实现他们的自我否定，都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因为他们都在一个假想的起点前止步了。他们的阶级性使得他们不可能从私有制着眼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只有马克思的经济学，才一开始即以资产阶级私有制为研究对象，以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为出发点，把雇佣劳动力的存在和使用看成是资本主义大生产的起点，才最终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并从异化劳动对立统一的运动过程预言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来的必然性。

### 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出发点

正如一切概念一样，“出发点”本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客观物质世界无限丰富而且永恒运动着，这要求我们，必须在运动中具体地把握这一概念。“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貌反映世界并改造世界”，这个原理本身即要求我们必须以实际存在的情况的变化发展为转移，具体地、历史地把这一原理贯彻到底。

1. 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众所周知，马克思是从给社会实践赋以能动的、革命的意义开始他的新哲学的。虽然人类社会的历史只是自然史中微不足道的一小段，但是人类社会认识自身的生活条件，并因此追溯到前人类的自然历史过程，都依赖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其中，给社会以最大破坏力量和持久革命力量的社会实践，是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

虽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只是唯物辩证法基本精神的要求和体现，但是社会实践却是人类真理性的认识所从来和所去的地方。唯物辩证法就其作为科学的方法论而言，它来源于实践，它的真理性也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社会实践作为主体的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及人类自身的活动是有主观和客观的两重性。它的主观性在于它是人类的有目的的活动，它的客观性在于，实践的主体和客体都是客观的实在。但是仅仅说明这些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马克思以前，实践观首先是在唯心主义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旧唯物主义者从来没有涉及到这一问题。当唯心主义者在深沉的思索之后演绎他的体系的时候，他在实践他的唯心主义，当唯心主义者认为锻炼身体有助于他的健康的时候，他的散步，是在实践他的唯物主义。实践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不足以把马克思主义与唯心主义区别开来，也不足以把马克思主义与旧唯物主义完全区别开来。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实践唯物主义”的人，显然犯了片面的错误。因为只有唯物辩证法才科学地解决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矛盾运动关系，而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矛盾运动关系正是各个哲学流派的分水岭，尽管是在不同的层次上。

认识来源于感性直观，人的直觉是人的第一实践活动。但是承认这一点还不足以成为唯物主义者，康德和黑格尔都承认人的全部知识来源于感性直观的。“从感觉出发，可

以遵循着主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我论（‘物体是感觉的复合或组合’），也可以遵循着客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物主义（感觉是物体、外部世界的映象）。”<sup>⑥</sup>认识论的第二个前提是感性必须转化为思维。这个过程必须运用概念，而概念决不是任意捏造的，而是经过千百次反复地实践同一逻辑的结晶化而成的。“没有共性就不能有认识”，<sup>⑦</sup>而概念正是对事物共性的抽象。但无论是感觉的获得，还是思维的运动莫不是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人的认识活动乃是一个辩证的过程，而认识的辩证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的实践过程。

但是，实际还有着比这更高、更重要得多的内容。马克思指出：“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sup>⑧</sup>革命的实践家马克思的一生正是这样来实现自己的诺言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一切哲学的本质区别。无产阶级的革命是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实践活动。社会实践（而不是实践）的中心内容也即是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同时也正是基于这一点，社会实践才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

2. 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熊彼特曾经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因此他的经济学很强调研究生产方式。然而由于他的资产阶级立场，使他看不到剥削的存在，因此他对生产关系只是做了纯粹的抽象研究。对马克思经济学的中心内容剩余价值论采取了对立的态度，使他不能接触到生产方式的本质。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是一切社会制度产生和灭亡的根源，其中物质生产力处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性质，使马克思着重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经济关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对雇佣劳动的分析为出发点，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他发现了劳动和商品的二重性，以剩余价值代替了古典经济学派流行的地租、利润和利息的收入分类法，并用工资来描述生产关系的各种表现，从而发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全部秘密，也论证了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必然性以及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必然性。

3. 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质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出发点。肖文引用了马克思一个“十分生气”的例子：马克思嘲笑了以“普遍的人性”为出发点的“蠢汉们”，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就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认为他的分析方法是从生产力——“社会物质”出发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方法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sup>⑨</sup>

我首先要肯定地认为，社会制度的更替都可以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生产力的发展有质的一面和量的一面。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已经在质的方面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准备了物质条件，但是，社会化程度的加深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原因。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原因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尖锐化，它完全可以由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危机来准备。



“一般说来，社会改革永远也不会以强者的软弱为前提；它们应当是而且也将是弱者的强大所引起的。”<sup>①</sup>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就是资本的生产力，它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加强的，甚至是通过经济危机经常的“刺激”来加强的。如果祈求通过生产力的进步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目前的历史阶段下，对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只能被理解为社会主义善良的遁辞，而且也不能够解释为什么社会主义首先在俄国、中国等等这样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全部基础就在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质以及它与其它各阶级的矛盾关系。圣西门、傅立叶、欧文都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但他们的学说之所以是空想，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发现无产阶级所蕴含着的伟大的内在力量。他们只是以一种仁慈的同情心幻想以一种外部力量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他们甚至不得不请求资产阶级政府的帮助。这种思想也反映在与马克思同时代的人蒲鲁东和拉萨尔身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地分析了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特点，发现在这个下贱的、愚昧的、贫困的阶级身上，具有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品质。这个由于机器大工业巨大发展而日益赤贫化的无产阶级是最彻底、最坚决、最先进的革命力量，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并且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自己的事情”，<sup>②</sup>无产阶级解放自己的手段就是暴力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以后，将有一个过渡的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里，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

正如马克思主义体系是一个完整的、严密科学的有机体系那样，马克思主义中三个组成部分的各个出发点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根本出发点，而且各个出发点之间也是紧密联系的。

可以这样总结如下：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实践能力的反映，生产力的主要方面是劳动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是科学社会主义真理的执行人。无产阶级只有运用唯物辩证法，以实际情况为转移地制定自己的政策和策略，才能够顺利而光荣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① 《列宁全集》第19卷第558页

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74页

③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3页、第4卷第238页

④ 参见《世界上古史纲》上册第3页

⑥ 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第117页

⑦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一章第一节

⑧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第4卷第284页

⑨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382页

⑪ 参见《共产党宣言》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

责任编辑：冯生

## 时间眼界及其连续性： 计划与市场的动态结合方式

刘志彪

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改革，迫切需要从理论和方法上寻求计划与市场这两种机制之间的新的平衡点。以往对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的理论探讨，多局限于静态的经济分析，而且视角均是针对客体经济。这种研究方法极大地限制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本文试图从动态的角度，对计划主体与市场主体之间的结合方式进行新的透视。

在经济分析中所述的时间眼界，是指各经济主体在决策时纳入考虑的时间区间的长度。一般来说，经济主体的时间眼界长，其决策便具有长期性和战略性，否则必然是“短平快”的经济行为。计划者的时间眼界与市场竞争者的时间眼界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东西。

在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现实经济运行中，决定计划者时间眼界长短的因素，至少有这么几方面：

1. 全民共同利益或社会总福利目标。如国家和民族的繁荣与振兴，科技进步及产业高度化发展，消灭贫困与公平分配等。在一个具体的计划年度中，则主要表现为局部与整体、眼前与将来关系的协调问题。

2. 科学技术，包括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经济学和其它社会科学提供的依据。如新的产业革命，高科技投入，产业技术转移与管理，“研究——投资——生产”周期以及人才培养周期等都对拉长计划者的时间眼界有决定性作用。

3. 来自于现实市场运行结果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如统计分析表明现实经济受到了基础性的瓶颈产业的障碍，那么发展投资及发展政策便要关注中长期的基础产业的发展。

4. 政府自身特殊的行为目标函数。如管理简便，政局稳定，统治长久等等。这些因素偏好，是构成宏观经济变量动态选择的重要方面，并影响或决定整个经济运行的时间眼界。

5. 计划者偏好。在我国现阶段的公有制经济中，计划者职能是政府职能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计划者偏好往往与政府偏好混合在一起，通过政府的行政职能加入经济计划管理过程中。但是这并不排斥计划职能部门的行为目标函数在日常的具体管理过程中或在较短期的计划管理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性。

市场竞争主体的时间眼界因构成市场主体的成份比较复杂，为此，这里我们以生产者的时间眼界为例来说明。这种阐述方法主要是从简便的角度出发，但绝不是说作为消费者和劳动者身份出现的居民的时间眼界不重要。<sup>①</sup>除了上述计划者时间眼界会从宏观上决定生产者的时间眼界外（如政策不稳定，生产者的市场预期就不稳定，经济行为就会趋短），决定生产者的时间眼界的因素主要有：

1. 市场近期趋利动机。生产者的行为如果为短期的市场信号和盈利冲动所左右，其时间眼界必然是短期的和盲目的。

2. 长期积累或企业稳定发展的动机。生产者如果追求发展稳定，或者追求长期积累的最大化，其时间眼界必然是长期的，否则就会分光吃尽，不顾企业的长远发展后劲。长期或稳定积累的动机，主要取决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在竞争效率决定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下，企业不重视中长期的战略管理必然会破产和倒闭，因而任何一个具有理性的管理者，其再生产行为都是应该追求稳定的和长期的市场利益。但在政府行政控制和保护下，企业发展战略管理问题便会置于脑后。

3. 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动机。即企业在进行决策时，对自己的社会形象以及企业活动对社会经济影响的考虑，如争创国内、国际一流企业，主动承担社会义务，抑制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遵纪守法，企业家具有较强的事业心以及爱护职工等等。由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和长期性，所以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其时间眼界也必然是长期的。

据此，我们可以把计划与市场的动态结合问题，归结为这么两方面：

1. 在时间眼界的长度上，计划主体与市场主体是否协调。如果两者都具有较长的时间眼界。那么在此基础上的以共同利益为导向的经济合作关系就比较容易展开，政府计划也较易为各部门或各企业所拥护和执行。否则必然会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发生较大的摩擦和冲突，降低计划调节的效率，加大市场调节的盲目性与自发性。

2. 时间眼界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如果作为计划主体因种种原因（如政府官员的任期等）不能有连续的时间眼界，或者在某一计划时期中频繁地更换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那么这种间断性的和不稳定的发展计划必然会损害和扰乱市场主体的经济预期，不仅会使原订的发展计划方案难以实施，也会使市场主体不再信任新的发展规划。

关于第一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从理论上概括出计划与市场在时间上动态结合的四种模式。

模式 I：较长的计划者时间眼界与较长的生产者时间眼界的结合形态。这种结合方式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计划者和生产者共同把发展和增长作为自己的主题任务。由于发展是经济和社会整体的结构变动，其过程往往呈现出较长的周期波动；由于增长一般是由投资活动推动的，投资过程具有较长的时间跨度（5—6年），所以计划者所具有的较长的时间眼界可以有利于制定烫平经济周期波动的远景规划，制定与投资建设周期大体相当的中期计划，以解决连续性的投资问题。对于生产者来说，企业的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动态选择必然表现出注重战略管理的倾向，如在投资政策上选择具有长期市





为具有战略意义，但是当要对成千上万种产品和几十类指标规定计划任务，并且要把该任务落实到部门、地区和企业时，中长期计划显然是难以奏效的。因为仅从技术的角度看，要把众多的计划指标分年度落实到较长的计划时间区间里，是根本不可能的。计划期长了，不确定性就会增加，由此形成的预测精度就会递减，预测误差递增。因此集权的计划管理一般只能通过年度计划为主的形式来实现。具体特征是计划指标一年一定，并且在计划执行中频繁地修正和更换计划目标与任务。这就决定了中长期的发展任务必然淹没在事无巨细的计划指标的修订和讨价还价的行为中。同时，处于年度计划全面控制下的企业既无动力也无压力，跟着政府的年度计划的指挥棒转，无法事先合理地规划自己的生产能力和发展方向。

关于第二方面的问题，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显得更为重要。连续而且稳定的计划者时间眼界，除了是形成生产者连续和稳定的经济预期的必要条件之外，也是下列诸因素的必然要求：<sup>②</sup>

1. 现代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时间周期趋长，投资规模巨大，投资风险也加剧。同时现代产业的发展，早已使经济活动超越了自身的狭窄范围，而与科技、社会、生态、人口和劳动力素质等广泛地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发展的综合体。所以，如果计划者的时间眼界不长，或时间眼界不连续和不稳定，就无法给现代产业的发展留下生存的空间，东一榔头西一棒的分散的资源配置方式，只能延误发展的时间并丧失发展的机会。

2. 在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企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其使命是不仅要安排年度的人财物使用计划，更重要的是要不断地进行市场开拓，在开拓中求生存和发展。企业战略管理中的许多重要内容，诸如研究与发展、工艺设备革新、人才培养、市场研究等等，均不是一个年度计划所能包含得了的。因此，计划者的时间眼界不连续，政策多变，不可避免地会打击寻求长期发展的企业。与此相反的是，计划者时间眼界稳定连续，那么在既定的宏观发展框架内，企业自由选择的空间就会扩大。

3. 现代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科技进步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国际经验表明，实现科技进步的“科学——技术——生产——需要”这一完整的周期，至少要10—20年的时间；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分工协作关系的广泛发展，许多重要的宏观经济问题越来越带有跨部门和跨地区的特性，在某个特定的地区和部门范围内，很难顺利地解决这些综合性的问题，而必须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几个五年计划连续不断的努力才能完成。为此需要最高管理决策层运用最优化原则和综合纲要原则，以整个社会发展的总目标作为规划的出发点，通过连续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投资来解决综合性的问题。显然，不连续的计划者时间眼界是无法胜任这种重任的。

综上所述，为了在经济发展中实现计划与市场的动态结合，使较长的计划者时间眼界与较长的生产者时间眼界相结合，并保持各自时间眼界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就需要：

1. 把计划管理的重心转移到中长期计划上来，在松动集权关系的同时，使五年计

划成为计划管理的基本形式。具体来说就是：（1）计划指标一定五年，一次公布下达。同时改革年度计划的工作内容，年度计划不应该主要是下达产量及投资指标，而主要应该是根据五年计划目标进行供求调节。（2）政府计划当局根据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完成五年计划分年度的目标和总目标考核其工作实绩。（3）以远景计划作为中期计划管理的基本保证，远景计划必须切实可行。如果缺乏切实可行的远景计划，那么随着五年计划的自然滚动，新的五年计划的公布和年度调节的依据将成为空谈。同时缺乏切实可行的远景计划也会使政府计划者的时间眼界变短，或者不连续。（4）采用“滚动计划”技术，保证五年计划与远景规划的时间衔接，保证五年计划与年度计划的衔接。

2. 塑造企业内部寻求长期发展的内在机制。中国改革实践证明，仅仅通过放权让利和简单的承包关系，并不能使企业内部自然生成寻求长期发展的力量，相反会加剧其短期化行为。这方面的问题较重要，也很复杂，涉及到企业经营制度及产权改革，这里从略。

3. 实现计划主体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动态的连续协调。在进行短期的计划管理时，难免会遇到来自需求的易变性和短期的商业周期的影响，这往往会影响计划方案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因而要求计划者与生产者之间经常进行各种形式的沟通和交流，并在双方之间取得理解和一致，避免市场短促波动及由此引起的生产者时间眼界变短的可能性。

- ① 居民的时间眼界在消费方面主要受周期的影响，而当其作为劳动者身份出现时，则主要受企业制度影响，本文对此略而不论。
- ② 连续和稳定的生产者时间眼界，也是计划方案动态实现的微观基础。这个问题虽然重要，但为了使所讨论的问题更为集中，本文暂略。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经济学系

责任编辑：郑英隆

---

（上接第13页）

- ②⑤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第45页
- ②⑥ 黑格尔：《小逻辑》第59—60页
- ②⑦ 《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7页
- ②⑧ 《列宁选集》第1卷，第10页
- ②⑨ 《社会学主要思潮》第165页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责任编辑：范英

# 新加坡宏观经济管理模式的特点

曹云华

在如何看待新加坡宏观经济管理模式这个问题上，众说纷纭。而笔者认为：新加坡宏观经济管理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国家控制与市场经济两者之间的高度统一。新加坡经济的起飞从一个侧面证明，市场经济和国家控制这两种方法是完全可以结合的。在当今世界各国，没有绝对的市场经济，也没有绝对的国家控制，不论是哪一种体制的国家，都同时兼备这两种方法，只不过是侧重点不同罢了。新加坡的经验就在于它找到了在新加坡这块国土上使这两种方法能够有机地结合起来、互相补充、和睦相处的最佳结合部。换一句话说，就是找到了使这两种方法相互结合的纽带和桥梁。因此，新加坡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榜样，既不是纯市场经济的，也不是纯国家控制的，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使两者达到最佳结合的一种模式。

新加坡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首先是建立在经济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的基础上的。经济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在新加坡经济的各个领域都在发挥作用，尤其是在下列二个领域有突出的表现：

一是自由港政策。新加坡在历史上就是一个最彻底地贯彻自由贸易政策的自由港。在1959年实行自治至1963年独立前，新加坡在推行最初的工业化计划时，曾一度实行“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增加课征进口税的范围，并规定进口限额。但从1967年起新加坡政府就逐步放弃了其早期的贸易保护政策，推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目前，新加坡的自由港政策包括：自由通商、自由通航、自由航空、自由通讯、人员自由进出、货币自由汇兑等。

二是自由企业政策。实行自由企业政策是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长期推行的基本政策。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曾指出，私人企业是我们达到经济成功这一目标的最有力工具。只有在自由企业制度下才能做到“有力者出

力，有才者出才”。他还说，赢利在我们新加坡并不是一个肮脏的字眼，企业的目的就是赢利，而决不是扮演慈善家的角色。新加坡的自由企业政策包括：向外资全面开放国内各个经济领域，尤其是制造业领域。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同，新加坡的特殊做法是不专门制定“外国投资法”，实行内外资一视同仁的政策；不规定投资比例，不强制或限制以某种方式投资，使外资在制造业领域拥有充分的自由；国家的大部分经济活动都由私人企业经营，不实行国有化，也不实施反垄断法，让企业之间进行自由竞争；即使是国营企业也必须参与市场竞争，实行优胜劣汰的原则。

然而，市场经济远不是新加坡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全部内容。新加坡政府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对国家社会经济生活进行了强有力的调控和干预。在新加坡，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介入程度是相当高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政府在土地资源的分配与使用上拥有绝对的垄断权。新加坡政府于1966年通过“土地取得法”。该法令第五章第一款规定，政府随时都有权为了下述目的而征用土地：（1）为了公共目的；（2）为了创造新的工作机会或是为了公众服务和利益；（3）为了居住、商业或工业的目的。总之，政府随时都有权宣布为了某种特别目的而征用土地，征用价格比市场价格低30%。上述法令的通过使政府掌握了新加坡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最宝贵的资源，从而能够以较少的代价去推行其雄心勃勃的建屋计划、工业化计划和市区重建计划。目前，新加坡政府拥有的土地占全国土地的75%，是全国最大的地主。可以说，新加坡政府通过法律手段而几乎完全垄断了土地资源的分配和使用。

其二，政府控制货币的发行和资本。新加坡没有中央银行，政府通过半官方的金融机构，主要有金融管理局、货币局、投资局、中央公积金

局和邮政储蓄银行、发展银行以及三家控股公司，掌握了全国50%以上的资本。金融管理局实际上起到了中央银行的作用，负责制定货币政策，监督和管理其他金融机构的活动。金融管理局对货币的发行、利率调整、投资方向等起着决定性作用。

其三，政府控制劳动力和工资。政府的雇佣法令对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包括节假日都有明确规定，还设有工业仲裁机构处理劳资纠纷。政府通过建立各种基金会和专门机构指导就业和进行技术训练。新加坡政府本身就是最大的雇主，它雇用的政府职员占全国就业人口的20%（包括国营企业雇员）。新加坡私人机构雇员的工资虽然都是由私人机构自行决定，但政府通过由政府、资本家、工人三方组成的全国工资理事会对全国各行业的工资水平施加重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其四，政府控制物价。新加坡实行自由价格制度，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但是，政府在这方面也决不袖手旁观的。政府通过控制货币发行、控制利率、控制消费基金、实行强迫储蓄（如中央公积金制度）等手段，对物价的总水平和通货膨胀率进行宏观调控。

其五，政府垄断全国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事业。政府负责提供各项公共设施，包括交通电讯、港口机场、工业用地、广播电视以及大部医疗卫生和保健服务。

此外，政府还在各部设立许多法定机构，负责制定与社会经济生活有关的各项政策和计划。

与经济现代化的进程相适应，新加坡政府干预经济这只“有形的手”越来越显得强有力，政府活动的规模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一点从新加坡政府消费的有关数据中也可以得到证实。据统计，从1965—1989年，新加坡政府消费增长了17.7倍。在1965年，政府消费总额为3.1亿新加坡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4%，到1989年，增加到56.8亿新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0.8%。1985年，这一指标曾高达14.3%。至于人均负担的政府消费，其增长幅度十分惊人，在1963年，人均负担的政府消费才163.2新元，1989年增至2116.9新元，在24年内增长了12倍。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新加坡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介入的程度在经济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是有很大差别的。从60年代的工业化初期至80年代初基本上实现工业化，这是不断强化政府作用

的阶段。新加坡在这个阶段取得的巨大成功，可以说是政府强有力干预和介入经济活动的结果，是政府伸得长长的干预的手把它捏成的。80年代中期以后，新一代领导人对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重新认识，认为强化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是新加坡建国和工业化初期不可缺少的和行之有效的因素。但是，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意味着必须把这一作用降到与今天的情况相适应的限度。1986年公布的《经济委员会报告书》建议：今后，除非有诸如涉及到国家安全方面等特殊原因，政府应更多地依靠私营部门的主动性来达到新的增长和繁荣……。

最近几年，新加坡政府在减少政府作用方面的实践，诸如国营企业私有化，让储蓄者对中央公积金的使用和管理发挥更大的作用，裁减政府人员10%等，已经开始收到积极的成效。它重新凸显了新加坡宏观经济管理模式的基础——经济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最近，设在瑞士的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和世界经济论坛联合发表的《1990年度世界竞争力报告》十分赞赏新加坡政府实行的“自由放任的工商业政策”，这种政策允许以市场为主导的商业通过价格竞争和消费者的选择促进成长。该报告书还特别指出，新加坡政府所推行的自由的金融政策使新加坡具有“金融活力”。

国家控制和市场经济两种管理方式，长期被一些人认为是水火不相容的东西，然而它们却在新加坡有水乳交融般地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且创造出一个举世瞩目的“新加坡奇迹”来。迄今为止，国家控制和市场经济能够像新加坡那样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的实例并不多见。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往往导致无政府状态，然而，过多的不适当的国家控制又给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另一方面的灾难。据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过多的、不适当的国家干预的必然结果是市场的扭曲，从而引起一系列不良的连锁反应，包括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和浪费、抑制储蓄和投资，降低劳动生产率和阻碍经济发展等。新加坡当然也存在国家干预和市场扭曲，但这些干预与扭曲是被控制在一定的“合理”范围内的。新加坡政府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它把市场经济和国家控制两种方法成功地揉合在一起，既避免了绝对市场经济体制下那种自由放任和无政府状态，又防止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死板和僵硬。迄今为止，许多国家都曾在如何使市场经济和国家控制两种方法相互结合方面作过不少



尝试，遗憾的是，取得成功的并不多。新加坡为什么能在这种试验中取得成功？其主要因素有如下几个：

第一，新加坡在历史上就是一个主要从事转口贸易的港口，有自由通商、自由贸易、自由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习惯和传统。这些习惯和传统对于现在的新加坡政府形成灵活、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纵观那些形成高度集权经济管理体制的国家的历史，几乎都是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统制，几乎没有或是缺少自由通商、自由贸易和自由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传统。

第二，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岛国，资源缺乏，市场狭窄，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加入到国际经济的大循环中去竞争，建立一个“坚定开放型”的外向型经济体系。而像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国要在国际经济的激烈竞争中求得胜利，就必须依靠市场经济的灵活和敏捷，依靠市场经济体制下那种高度的竞争精神。

上述两个因素赋予新加坡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较高的“自由”程度。然而，在新加坡，“自由”是有限度的，政府那只“有形的手”到处都在起作用。在许多领域，其介入的程度并不亚于台湾和南朝鲜，甚至还超过一些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但是，在新加坡，这种高度的政府介入和干预，非但没有产生在一些实行高度国家控制的国度里经常出现的官僚主义、低效率、裙带风、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正好相反，新加坡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介入和控制以高效率、高度廉洁而著称于世。这主要应归功于以下第三和第四个因素的作用。

第三，建立了一个高度渗透性的权威政治体系。在新加坡，国家充分掌握主要的社会化过程，通过政党、工会、社会团体将政府的指令和影响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这种高度渗透性的权威政治体系，不仅创造和提供了高度稳定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同时也赋予经济技术官僚充分的高度的独立自主地位。在这种权威政治体系下的经济决策可以依据长期的发展目标来制定和推行，并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和连贯性，可以有效地避免许多短期行为。它不用担心政党的更替和政府的上台、下台，也不必屈从某个经济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更进一步来说，经济技术官僚可以借助强有力的政府机器及其所掌握的意识形态和一切社会控制系统来直接促进经济建设和创造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一切条件。例如，建立经济发展的共识；抑制不适当的炫耀性消费和鼓励储蓄；维护家庭的社会控制及经济互助功能；等等。

第四，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官僚体系。新加坡奉行精英主义，建立了一个事权集中、政策工具完备、人才充沛、组织庞大的经济行政组织，以及负责把经济政策付诸实施的训练有素的公务员队伍。这个强大的经济官僚体系负责制定和推行经济政策，掌握了各种完备的政策工具和手段。这些政策工具和手段除了一般为人们所熟悉的财政及货币政策、工资政策、教育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外，还包括广泛的行政裁量及法规制定权、工商执照核发权、特种物质专卖权等。这个强大的经济官僚体系可以运用的工具还包括信用工具和庞大的国营事业体系。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责任编辑：谭湛明

（上接第35页）

引起重视的问题。应该明确规定监察人是股份公司的法定常设机构，负责对公司业务执行及公司财务实行监督审查；监察人有权随时调查公司的业务及财务状况，查核帐册文件等；监察人应从股东中选任，具体人数由公司章程规定；监察人的必备条件之一是，没有因经济犯罪而受过刑事处罚；公司董事、经理及其他职员不得充任监察人，等等。

总之，我国股份公司的立法应以引导大众参与投资为出发点，而努力抑制股票购买行为的投机性质，使股份公司制度能真正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法系  
责任编辑：谭湛明

# 外向型经济发展中的出口增长与收益调整

——台湾与广东的比较研究

王 珺

在60年代初期,台湾省由于岛内市场和资源有限,由进口替代的内向型经济转变为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从而跨入了“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行列。

台湾省的经济的发展基本上经历了三个时期,1958年以前可以看成是第一阶段,其标志是1958年台湾省名义出口汇率的大幅度贬值,这个时期的发展特点是:年平均15%的出口增长率低于年平均21.6%的财政收入增长率。而且,这个出口增长率是靠单位创汇补贴额每年平均增长74.1%来维持的。由于单位创汇补贴基数小,所以,出口补贴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仍低于1%。1959~1973年为第二阶段,在这个时期内,名义出口汇率基本上稳定40:1的水平上,出口增长每年平均为27.1%,大大高于年平均15.5%的财政收入增长率。单位创汇补贴额平均每年增长9.7%,大大低于前一阶段的平均增长率。但由于出口迅速增长,出口补贴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由2.12%上升为29.38%。因此,出口增长明显地充当了这个时期台湾省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角色。第三阶段是1973年的“石油危机”之后,这个时期的名义出口汇率开始升值。单位创汇补贴额也在减少,年平均20.1%的出口增长率基本上与年平均19.9%的财政收入增长率相同。由于出口增长率降低和财政收入增长率的上升,以及单位创汇补贴额的下降,所以,出口补贴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由1973年的29.38%迅速下降为15.27%。①

广东省是我国改革和开放较早的省份之一。凭借其天时,地利与人和等优势和一些优惠政策,在80年代中期,广东也把发展外向型经济作为明确的发展战略目标,近年来的实践表明,转向外向型经济使广东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在分析广东省出口增长与出口补贴之前,我们先做两点假设:第一,假设所有的出口都需要补贴。实际上,在出口总额增长中,除了外贸专

业公司组织的出口以外,还包括“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的出口,而后者是得不到政府的财政补贴的。第二,假设广东省是一个经济独立的地区,出口补贴全部由省财政支付。实际上,大部分的出口补贴都是由国家财政支付的。

1978—1989年期间,广东省的出口增长大约也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83年,出口增长年平均为9.5%,低于单位创汇补贴额每年平均增长11.9%的速度,平均换汇成本每年上升6.6%,由于财政收入每年递增1.6%,出口补贴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由28.41%上升为73.41%。第二阶段是以1984年我国官方汇率大幅度的贬值为标志的。1984—1989年期间,出口增长率年平均为30.2%,而单位创汇补贴额平均增长率为41.7%,这两个指标都大大超过第一阶段的平均水平。虽然这个时期的财政收入每年以21.8%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第一阶段的平均水平,但是由于它比同期的单位创汇补贴额增长率低近20个百分点,所以,出口补贴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由15.48%上升为123.49%,这意味着1989年全省的财政收入都不足以支付出口补贴。通过上述比较,我们会进一步发现,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各项指标增长率都比后者快得多。②

比较一下两省外向型经济发展与出口补贴,我们会看到,在外向经济发展过程中,两者之间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从共同点来看,在外向发展启动时期,降低币值和增加补贴是刺激出口的基本手段,由此形成了高速度的出口增长率。1958年,台湾开始降低币值,经过了7年的逐步调整,基本稳定在40:1的汇率水平上,与初期相比,汇率贬低了60%以上。本来,降低币值使官方出口汇率接近于实际换汇成本,会减少出口补贴,但是,台湾省的单位创汇补贴额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不断上升,每出口一美元所得到的

补贴由1959年的1.6元增加为1973年的5.87元。这说明,台湾单位创汇补贴额不仅仅是换汇成本与官方汇率之差,而是大于两者之差,从而鼓励企业扩大出口。由于每一年的补贴额构成规定的换汇成本的一部分,因而,换汇成本实际上是政府规定的换汇成本。1984年以后,广东省出口的大幅度增长也同样是汇率贬值,出口补贴增加的结果。但是,对于广东省来说,汇率贬值与出口补贴增加之间则表现出一种交替关系。1984年,汇率由1.98:1变为2.8:1,广东省所得到的出口补贴由每出口一美元所获得1.26元降低为0.35元。随着换汇成本的不断提高,多出口必然导致多补贴。

从不同点来看,台湾省外向经济发展的成本低于广东省。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指标上,第一,台湾省的单位创汇补贴率,最高年份的比重为15.39%,最低的年份为0.89%,平均水平为9.39%,广东省的单位创汇补贴率,最高的年份为78.74%,最低的为12.51%,平均指标为31.88%,所以,后者高于前者。第二,台湾省的出口补贴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最高的年份是29.38%,最低的年份是0.35%,平均水平是10.26%。而广东省的出口补贴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最高的年份是123.49%,最低的年份是15.48%,平均水平是57.84%。第三,在1959—1973年期间,台湾省出口补贴每年平均增长39.5%,由于同期出口增长率每年平均为27.1%,单位创汇补贴额年平均增长为9.7%,所以,较快的出口补贴额增长主要是由出口增长率拉起的,单位创汇补贴额上升对出口补贴总额增长的影响远远低于出口增长率的影响。相反,广东省在1984—1989年期间,出口补贴每年增长84.4%,而出口增长率年平均为30.2%,单位创汇补贴额每年平均增长41.7%,显然,单位创汇补贴额的上升对出口补贴总额增长的作用要大于出口增长率。

通过两省在外向经济发展中的出口增长与出口补贴的比较,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台湾省的外向型经济偏于“高速度与低成本”的类型,广东省则属于“高速度与高成本”的类型。

造成两省出口速度与成本之间差异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三方面。第一,规模差异。1985年的数字统计,台湾省人口为1900万人,广东省为6250万人,台湾省人均3050美元,广东省人均950元人民币,合人均340美元;台湾省货币购买力总额为58.56亿美元,广东省为21.25亿美元。台湾

省的人口相当于广东省的30.7%,货币购买能力相当于广东省的2.76倍。单纯从这个指标来看,台湾省的市场需求潜力比广东省大得多。但是,广东省不是一个独立的省份,而是全国11亿人的市场中的一部分,所以,市场规模比台湾大。在目前扩大商品经济和利益导向的国内市场环境中,广东省的出口增长遇到了台湾省所不曾遇到的矛盾,即国内市场与对外出口的需求矛盾。由于多数工业品都不是在国内市场饱和前提下才出口的,若扩大这类产品出口必然会相应减少国内市场的供给量,国内市场价格会上升,这会增加产品内销的吸引力,政府为了获得外汇,保证外销,必然会增加对出口企业的补贴,因此,国内市场价格上升越快,出口补贴就愈多。第二,国际环境的差异。台湾省在60年代初期开始转向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60年代是战后国际经济环境的黄金时代,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关税限制减少,数量管制基本上被消除,国际资本的流动限制在许多国家内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其结果使世界贸易出口量迅速增长。1960—1970年期间,世界农产品产量平均每年增长2.5%,出口每年增长3.9%;矿产品产量每年平均增长5.4%,出口每年增长7.2%;工业品产量每年平均增长7.4%,出口每年增长10.2%。广东省的外向化发展是在80年代初期开始的,80年代的国际环境已经明显地不同于60年代,主要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浪潮盛行。非关税壁垒成为贸易保护的主要特征,再加上世界经济的低速增长,导致了80年代世界贸易出口增长率明显低于60年代,1980—1985期间,农产品每年产量平均增长2.6%,出口增长率为1.2%,矿物资源和能源产量每年平均增长5.4%,出口增长率每年下降3.6%,工业品产量每年增长3.1%,出口增长率每年平均为4.8%。③由于台湾省在60年代面临的国际环境比广东省在80年代面临的国际环境有利,所以,如果两省是同样的出口增长率,那么,台湾省所付出的单位成本会比广东省要小一些。第三,经济管理体制的差异。从经济自成体系的台湾省来看,随着向外向经济战略的转移,经济体制也相应地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比如,降低货币币值,放松外汇管制;减少关税和排除进出口数量管制等行政手段。这种体制为台湾企业直接地参与国际经济活动提供了方便,减少了体制限制方面的障碍。对于广东省来说,确定了外向发展战略之后,经济体制也需要有一个较大的调整。但

是，经济体制调整的许多方面是广东省本身所解决不了的，比如，汇率、关税和外汇管制等等，这些都取决于国家的经济体制调整的进程和步骤，国家在经济体制方面作出的调整是从全社会的经济利益得失出发的，这样，广东省希望国家政府在经济体制方面的调整可能与其实际的调整程度会发生不一致。这种所希望的与实际的体制调整差异，与台湾省的战略目标与体制配套的相对一致性相比，也是造成出口高成本的因素之一。

发展外向型经济不能一味地追求出口规模的扩大，而应该在降低换汇成本，增加出口收益的前提下，扩大出口，否则，出口规模愈大，收益外流愈多。广东省之所以能够维持在单位创汇补贴额平均增长41.7%情况下的出口增长30.2%的高速度，究其根源，是因为出口补贴额是由国家财力支付的，假如由广东省财力来弥补出口亏损，这种高速度的出口增长率就不可能出现，除非平均换汇成本大幅度地降低。然而，在短期内，平均换汇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不容易出现，据我们匡算，1978—1989年期间，官方汇率调整对广东平均换汇成本的影响力是29.47%，而同期广东省物价水平增长对它的影响力是53.24%，④由于在短期内物价水平不会下降，所以，平均换汇成本很难大幅度降低。在这种情况下，降低高速度的出口增长率，减少国民利益外流仍不失为一种有效途径。

然而，这个途径毕竟不是治本的办法，要治本，只有在降低创汇成本，增加出口收益方面狠下功夫。而要向着这个方向努力，不仅要调整广东省内的产品构成和市场流向的结构，更主要的是，国家要调整贸易政策和外贸管理体制，为广东省的外向型发展创造条件。由于各省基本上实行相同的外贸管理体制和政策，所以，广东省的“高速度与高成本”也可以说是全国外贸发展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只是近年来广东省出口增长率快于其他一些省份，这个矛盾也就显得更加突出。因此，国家在外贸政策和体制方面的进一步调整和改革，决不仅仅意味着只为某个省份创造条件，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外贸发展战略和各省外贸发展的效益问题。

为了在降低创汇成本，增加出口收益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沿海地区外向经济的发展，我们建议，应在以下三方面作出调整和改革。

首先，官方汇率需要进一步下调，使其接近换汇成本。1989年12月，在我国治理整顿取得初

步成就的情况下，人民币币值主动下调了21.7%。这次大幅度地调低汇率，不仅对扩大进口替代产品的生产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因官方汇率与实际换汇成本接近，也减少了国家财政部门对各地出口的补贴。然而，这次下调并未完全到位。比如，1956—1976年期间，台湾省的平均换汇成本只比官方汇率水平平均高8.3%，在汇率调低之前，广东省的平均换汇成本比官方汇率水平高41.9%。调低汇率之后，前者比后者高21.18%。比较表明，我国的官方汇率还需要进一步下调。当然，汇率下调会使出口产品价格进一步上升，依赖出口原料、零部件的加工工业成本增加，也会使企业外汇贷款的还本利息的负担加重。但是，由于官方汇率与平均换汇成本接近，政府可以把节省下来的一部分出口补贴暂时用于对进口商品的必要补贴，以保证进口价格的基本稳定。汇率下调会促进出口增长率快于进口增长率，在这种条件下，汇率下调所节省下来的出口补贴除了直接补贴进口以外，还会有剩余，这个剩余就等于汇率下调所增加的国民收益。

此外，汇率下调也是打破我国的“高速度、高成本和高补贴”出口模式的突破口。由高成本刺激起来的高速度的出口增长是以财政支付的出口高补贴为前提的，一旦因财力约束而使出口补贴额受到控制时，出口的高速度就会降下来，形成“低速度、高成本和低补贴”的出口类型，这是前一种类型的转化形式，实质是一样的。造成出口高成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汇率高估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广东省与台湾省的出口增长的实践比较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此，降低高估的汇率是降低出口成本、减少出口补贴的基本前提，也有利于我国打破“要人民币与要外币”的交替循环。

其次，充分发挥外汇调剂市场的作用，使其运转规范化。扩大外汇调剂市场具有以下三方面的作用。第一，可以提高创汇成本与用汇收益比较的透明度。目前，我国仍是大部分出口企业管创汇，政府管用汇的“分工”运行，这种运行产生了两种结果：其一是微观效益与宏观效益的脱节，其二，是进口出口的脱节，如果存在比较规范化的外汇调剂市场，首先可以纠正第一个脱节现象，因为市场汇价是政府和企业各自判断创汇成本与收益的一个公开标准，对于企业来说，需要对市场汇价与平均换汇成本之差作出判断，如果前者大于后者，企业会扩大外销。对于政府



来说,也需要对市场汇价与汇率基础上政府支付的单位创汇补贴额之差作出判断,如果前者大于后者,政府会考虑通过增加补贴,鼓励企业多出口,这会使现行的“分工”运行的不透明状况得到纠正。(至于纠正进出口脱节的问题,我们在最后一点中分析。)第二,为改变出口补贴形式创造了条件。我们知道,一国长期的大量的出口补贴形成因违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规定而会招致进口国家的反倾销的抵制和国际上的非议,这就需要改变政府直接补贴出口的形式,而规范的外汇调剂市场为改变这种形式创造了条件。比如,政府可以按照市场汇价向有外汇储备的地区和企业购买,其中,市场汇价与官方汇率之差就可以看成是出口补贴的转化形式。在60年代后半期,台湾政府主要采用这种手段来支持本地区外向发展。第三,可以平衡一些进口替代企业的外汇收支平衡。一些进口替代企业的外汇平衡是依靠一部分或零部件的进口加工和内销来实现的,没有外汇调剂市场,这类企业的外汇无法实现自我平衡,直接影响到进口替代的发展。如果市场估价过高,引进成本过大,那么,从事进口替代的一部分企业,可能会转向外销,去追求创造一美元的收益大于其成本的差额。因此,市场汇价可以调节进口替代与出口扩张产业的比重变化。

最后,在逐步扩大外汇调剂市场规模的基础上,政府应以稳定市场汇价为中心,对其进行调节和管理,从而分担企业的一部分创汇风险。在“企业出口亏损多少,政府财政就补贴多少”的运转方式中,全部的创汇风险是由政府来承担的。扩大了外汇调剂市场以后,企业与政府的联系,除了事先规定的一部分指令性出口计划指标以外,愈来愈多的外汇转化为企业与政府的市场交易,这样,一方面在第二点建议中所提出的进出口脱节的现象可以得到相应的纠正,因为指令性计划指标以外的创汇与用汇在企业范围内形成了统一。另一方面由政府承担创汇风险在形式上已转变为由企业承担。这个转变是硬化企业预算约束的客观要求。但在发展初期,创汇的不确定因素过多,风险过大,企业难以一下子适应,这就需要发挥政府对外汇调剂市场的作用。对于企业来说,创汇的成本与收益能否平衡取决于市场汇价与预期的换汇价成本的比较,预期两个可变因

素比较的不确定性总比一个因素相对稳定而另一个因素变化要困难。而政府的调节应以稳定外汇市场价格为中心,即在供不应求时,卖出一部分外汇,在供大于求时,买入一部分外汇。通过稳定市场汇价,使企业集中预测影响换汇成本方面的因素变动,增加预测的准确性,减少企业创汇风险。总之,在我国出口增长中,应把降低创汇成本,增加出口收益放在第一位,只有这样,才能在扩大出口中获得比较利益。

① 资料来源:“中国台湾省”,李登辉、梁国书,摘自《半工业化经济发展战略》第346页。B·巴拉主编、朱元兰译。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5第一版。

《Taiwan Statistical Date Book》1987.

② 资料来源:《广东统计年鉴》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③ 资料来源:GATT:国际贸易1985—1986图表A—1

④ 根据公式

$$ARC = EHR \cdot EP \cdot DDG / PWH$$

$$\ln ARC = X_1 \ln EHR + X_2 \ln EP +$$

$$X_3 \ln PDG - X_u \ln PWH$$

其中ARC = 平均换汇成本 EP = 有效保护率  
PDG = 广东省物价指数 PWH = 香港消费物价指数

对广东省1978~1989年的上述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经过初步测算我们发现,EP和PWH两个因素对ARC的变动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这样,公式修正后的计算结果是:

$$\ln ARC = -1.6125354 + 0.2946917 \ln EHR + 0.5303243 \ln PDG$$

$$\left( \begin{array}{l} T = -3.4119227 \\ S = 0.4726178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T = 2.8465989 \\ S = 0.1035241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T = 4.7628131 \\ S = 0.1126066 \end{array} \right)$$

$$R^2 = 0.957901$$

$$R^3 = 0.948546$$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经济系

责任编辑:谭湛明

# 股票所反映的股权关系及法律调整

潘嘉玮

随着部分企业股份制的试行并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以及一些地区证券交易所的建立，股票发行与转让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及其法律调整，将成为90年代我国立法研究的热点问题。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将有助于我国有关的立法工作。下面试就与股票相联系的股权关系及其法律调整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对于股票，马克思曾经下过一个定义：股票“是对一个股份公司拥有的实际资本的所有权证书。”（《资本论》第2卷、第387页）也就是说，股票是资本成份的证券化，它表明其持有者对公司财产拥有一定份额的所有权。然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股份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日益分离，股东在股票购买中越来越专注于股票票面金额与售价之间的差额，而对股票所表示的股东权——所有权却表现得“漠不关心”，使购买股票的行为越来越变得是一种投机行为而不是一种投资行为。在我国目前关于股份制企业所有权的理论探讨中，一些学者也提出了股票不再是“资本的所有权证书”，而仅是股东定期向公司收取红利、股息的一种凭证，是股东对公司享有债权的纽带的观点。如果这种理论能够成立，那么股票所表示的股东所有权将会消失，股东在股票市场上的买卖行为就会因其陷入盲目性而带有很大的投机性。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股票的本质进行再认识，并加强有关方面的立法，否则，股票买卖将会成为投机者的乐园。

股票所反映的股权关系，实质是一种财产所有关系，它表明投资人对公司财产拥有的所有权，并以此确定投资人应得的投资收益。当投资人以交付一定资金购买股票的形式向公司投资后，投资人对公司的财产即拥有了一定份额的所有权。

在现代公司制度中，由于财产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分离，使公司财产所有权的四项权能发生了分离。公司独立地享有了对公司财产的占有、使用与部分处分权，而投资者（股东）却丧失了这部分权利。于是产生了一种“法人所有权”的理论，认为投资人在向公司交付了一定数额的资金以后，他即丧失了对该资金的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权，由此也就丧失了对公司财产的所有权。公司财产由公司法人所有，股东只能凭着其投资凭据——股票定期向公司收取投资利益，所以投资者与股份公司的关系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在所有权的四项权能中，收益权与处分权是所有权的最高权能，是所有权的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丧失了这两项权能，就无所谓所有权；而占有权和使用权的离

异，并不会影响所有权的归属，相反，这往往是所有权人实现其收益权的一种方式。在股份公司中，股东对公司财产的收益权及部分处分权并没有丧失，公司对财产占有使用的结果，是以股东的收益权承担的，公司任何人员无权分配公司的红利。同时，股东对公司财产仍保留了部分处分权，如：请求法院裁定解散公司的权利、申请公司重整的权利、诉请法院开始特别清算的权利等等，这些权利正是股东对公司拥有的财产所有权的保障。相反，公司却无权自行决定公司的合并、吞并及解散等事项，也无权自行决定对公司的清算。由此可见，公司对财产仅拥有、占有、使用及部分处分权（这些权能已足以使公司享有法人的资格），这些权能只能构成经营管理权；其行使的结果，最后由股东拥有的收益权承担。所以，股东才拥有公司的财产所有权。

其次，股份公司的管理体制表明，公司对财产行使占有、使用及部分处分权时仍要受到股东的监督甚至直接控制。在股份公司中，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在股东大会上，股东对公司重大事项有表决权；股东还享有诉请法院裁判解任董监的权利、诉请法院裁定检查公司业务及财产的权利、请求召集股东大会改选董监的权利等等。另外，董事会为公司的决策机构，而董事必须具有股东的资格，它是股东对公司的财产所有权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权相联系的桥梁。它表明股东的财产所有权决定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公司经营管理权的产生与行使并没有完全与股东的财产所有权割断关系，大股东通过董事会直接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许多国家还规定了股份公司的监察人制度，监察人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必须具有股东资格，负责审查公司业务及财务状况等。公司监察人制度的设立，是股东对公司享有所有权的又一明证。

否定股东所有权的理论不仅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在实践中是有害的。其一是使股份公司丧失了所有权主体的监督，公司经营者占有、使用、处分不属于自己所有的公司财产，又不受股东的监督，其结果却由股东们承担。在这种权力结构下，股东的权益难以保障，股份公司的命运也可想而知。其二是使股东日益远离公司而不再是实际意义上的投资者，成为只关注股票市场行情的投机者；股票将不再是“资本的所有权证书”，而成为买卖双方在其时值差额上进行投机的“赌注”。这样，股票发行不但失去其作为筹集社会闲散资金最便利方式的意义，而且还会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极大的混乱。

在当代股份公司制度中确实有股东权逐渐淡化的情形。一些学者，特别一些企业家也着力于鼓吹这种淡化，而问题在于应该通过立法确认这种淡化还是通过立法限制这种淡化。我认为应该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即必须通过立法强化股东权，以加强股东（特别是公股）对公司经营管理的监督与制约，充分保障股东的合法权益（从而也保障了作为公股持有者——国家的权益），有力地限制股票发行中的投机行为，把公众通过购买股票参与投资的行为导向健康的轨道。借鉴各国股份公司的一些有效制度，笔者认为我国的股份公司制度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立法：

（一）健全股东大会制度。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对公司财产所有权的集中体现。为了充分保障股东参加股东大会、议决公司重大事项的权利，应对股

股东大会召开的程序作出法律规定，其中如：股东大会召开的期限，一般为一年至少召开一次；股东大会的召集权人，除规定公司董事、监察人有权召集及法院依法命令召集外，应规定持有公司股票达到公司股份总数法定比例的股东，依法定程序，有权召集股东大会；股东大会的通知形式，应以尽可能保证股东能及时获取开会通知为宜。

(二)规定关于股票转让的限制。股票转让是股东收回其投资的主要方式，一般来说，股票的转让应遵循自由的原则。但为了防止股票发行与转让中的操纵股市、控制股东权等行为发生，同时也为了保证公司资金的稳定，法律对以下的股票转让行为应作出限制。

1. 公司不得收回或收买自己的股票，或把自己的股票收为质押物，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因为公司是以股票发行的方式而获得资金的，如果公司以资金取得自己的股票或将其收为质押物，将会威胁到公司资本的充实，同时还会使公司经营者从中投机，操纵股市或用于控制股东权等行为的发生，从而影响到公司债权人与股东的权益。如果公司因法定事由（如受赠、或股东破产清算时以公司股票抵公司债务等）而取得自己的股票，也应规定于限定的时间内售出。

2. 公司发起人认购的股票，在公司登记设立后一定期限内不得转让，以确保公司设立后一定时期的资金稳定，同时也防止公司发起人利用发行公司股票投机取利后逃脱责任。

3. 公司董事及监察人持有的股票，在其任期内转让应受到数额限制。这一限制有利于加强董事及监察人的责任心，也防止其行为有损广大股东的权益。

4. 公股的转让应受到特别的限制。公股在社会主义股份制企业中占着主导地位，公股的转让对公司资本的稳定及股票市场的稳定关系极大，因此必须规定公股的转让不能改变其性质，即不得向私人转让，除法律另有规定，并经特别程序批准外（如为了稳定股票市场，依法转让部份公股等）。

(三)规定公司定期发布经营状况的公告。为了使广大股东了解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行使其对公司的监察权，并由此了解自己应获得的投资收益以及决定自己的资金投向，公司应定期发布经营状况公告，公布公司的资产状况、经营情况。公告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公司营业计划、资金分配、收支盈余概算、市场分析、专家审查意见、公司债券发行记录、财务资料、财务分析、最近年度会计师查帐报告书、最近年度营业报告书等。公司定期发布公告不仅是股东行使股东权的有力保障，同时也能有效地抑制股票市场涨落的各种人为因素，增加股票实值计算的透明度，减少公众股票购买行为的盲目性。

(四)建立公司监察人制度。股份公司的管理较为复杂，股东又不直接参与公司的管理。因此，建立公司监察人制度，使股东通过该项制度行使其对公司的监察权确属十分必要。我国股份制企业目前仍在试行阶段，大多没有建立监察人制度，这是一个应该

(下转第28页)



## 对广东人才工作的回顾和思考

李作铭

“八五”期间，是我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要进行产品、产业结构调整，要建立比较健全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系，要奠定21世纪经济腾飞的坚实基础。要达到以上目标，我们需要有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大气候，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需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但是，我认为，还有一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这就是人才的问题。

人才问题，历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和事业的成败。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认为科技的载体是人才。在谈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他又精辟地指出，《决定》提出的十条都很重要，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九条，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事情成败的关键是能否发现人才、选拔人才。我省改革开放10年来的实践，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推动人才工作的开展。一是拨乱反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知识分子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下力气解决知识分子夫妻两地分居问题；为2万多名用非所学、用非所长的知识分子调整工作；在工作上坚持“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理论，逐步推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的形成。二是围绕科技、教育、卫生等战线的体制改革，先后制订和颁发了有关科技体制改革、人才流动和放宽放活科技人员等政策规定和措施，鼓励广大科技人员以技术承包、联合攻关、租赁领办等多种形式深入工农业生产第一线，为企业和农村的科技进步作贡献，促进了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的紧密结合。三是开展了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到1989年6月底，全省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共有99万专业技术人员评聘了专业技术职务，使广大专业技术人员的才能与贡献得到社会的恰当评价，对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起到积极的作用。四是积极创造条件，逐步改善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除追加科研投入、增加教育经费外，1985年以来，国家和我省先后制定了17项措施，使知识分子的工资水平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据统计，我省专业技术人员5年中平均每人增加6级多工资。五是建立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制度，不断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业务素质。六是加强了专业技术人才的管理和队伍建设，建立了激励机制，对重点研究项目、中青年骨干以及在充分发挥老专家学者作用等方面采取了一些倾斜政策。这些措施的实行，有效地推动

我省专业技术队伍的发展。据统计,1980年我省只有专业技术人员46.6万人,1989年达到104万人,增长1.2倍。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自然科学人员由1980年的18.3万人增加到1989年的42万人,增长2.3倍。这支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在我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客观地看,我省目前的专业技术队伍的现状,与我省“八五”计划以及今后10年发展规划的总体要求,还是很不适应的。

一、从总量上看,专业人才数量少,密度低。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1990年6月底,全国每10万人口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为1422名,而我省仅为1338名,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排第15位;按自然科技人员统计,1989年全国每万名全民所有制职工拥有自然科技人员1024名,我省仅824名,排第11位。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科技人员,包括工业企业中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从事研究与开发的技术人员,我省也低于全国水平。据1988年统计,全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每万名职工中拥有工程技术人员508名,而我省只有401名,居第25位。

二、人才在不同产业、地区中的分布不合理,与经济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农业技术人员奇缺。据1989年统计,我省仅有农业技术人员21558名,每万名农业劳动力只有13.2名农科人员,仅为全国平均29.4人的44.9%。从事科研和技术服务事业的科技人员偏少。1989年,全省从事科研的人员仅为8978人,比1986年的13980人减少35.78%,为全国平均减幅(16.12%)的2.4倍。能源、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以及某些支柱产业的科技力量配置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不相适应的矛盾。此外,人才地区分布也不合理,全省48个山区县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41%,而专业技术人员仅占全省的16.28%,每10万人口拥有专业技术人员800名,仅为全省平均数的59.79%。

三、某些领域技术人员年龄分布出现“断层”,骨干力量后继乏人。工程技术、农业技术和科研人员中,出现了36—45岁的低谷区;在高级职称人员中,51岁以上的占74%,有的地区达90%以上,大大超出全国平均69.8%的比例。“八五”期间,我省将有70—80%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退休,骨干力量和学术带头人后继乏人的现象将更加突出。

四、专业技术人员的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我省现有中高级专业职称人员中,1983年前评聘的仅占30.2%,而1986年恢复职称评定后再评聘的占69.7%。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分别比1985年下降2.83%和26.76%。此外,前几年,由于“一手硬一手软”的失误,部分大、中专毕业生政治思想和业务素质下降,与社会普遍希望的政治思想素质好、基本功扎实、踏实肯干、有社会责任感的的要求不相适应。

以上情况表明,要实现我省“八五”计划和今后10年发展规划的宏伟目标,调整、改善我省人才结构,增加人才总量,提高人才素质,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工作。我们在安排90年代的工作时,一定要把解决人才问题放在战略的位置上来考虑。

一、各级党委、政府要把人才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在考虑“八五”计划和今后10

年发展规划时，一并考虑人才问题；要坚决贯彻落实和宣传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努力创造本地区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软环境，使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气。

二、要大力开展人才交流和国外人才智力引进工作。1983年以来，我省通过人才引进，从外省市调入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才7.9万多名，对缓解我省人才不足的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今后，我们要继续坚持这一做法，积极从外省市引进人才，储备人才，为今后经济的发展准备后劲，同时，要大力引进国外人才智力。广东地处沿海，毗邻港澳，华侨众多，有地利人缘优势。1983年至1990年，我省共执行引进人才项目558项，引进港、台和国外专家1000多人；派出培训项目283项共2776人。人才智力引进和派出培训，为我省发展外向型经济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因此，各地要把这一工作列入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此外，制订优惠政策，吸引留学生回国工作，也应引起我们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人口统计资料显示，我省目前在海外工作或学习的达18676人，这是一笔可贵的财富，我们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尽可能地吸引他们回国工作，为我省的经济腾飞贡献力量。

三、要抓好教育结构调整和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工作。当前，我省高等、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存在着专业配置和层次结构不合理的现象，长线专业过长，短线专业过短，不太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八五”期间以及今后10年，我们要从我省经济发展布局出发，合理调整专业设置结构，同时，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和职业学校，培养适应不同需要的不同层次各类人才。此外，我们还要努力开展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把它作为提高我省现有专业技术队伍素质的基本途径来抓。一方面，这是解决人才分布和需求失衡、人才知识更新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经过近些年的努力，我省成人高等教育也已有长足的发展，及时地从学历教育转向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

四、要加强人才立法，制订和完善有关人才工作的政策和配套措施。要下力气解决人才单位所有、流动难的问题；要采取措施，解决知识分子有关工资、住房、医疗等生活待遇问题。对山区、经济不发达地区，以及农业和重点工程、重点项目，要实行倾斜政策，予以重点扶持。

作者单位：广东省人事局

责任编辑：郑英隆

# 九十年代珠江三角洲的基础教育

吴光普

学  
术  
研  
究

近十年多来,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中,珠江三角洲迎来了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的繁荣。1978年至1988年,工农业总产值由70.25亿元猛增到362.5亿,增长了4倍;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两番多。这个地区的土地面积约占全省的1/7,人口约占全省的1/4,国民生产总值在1988年已占全省的1/2。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为该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1983年,珠江三角洲基本普及了小学教育;1989年,该地区21个市县中,已有17个市县区经过了省验收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这是珠江三角洲基础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丰碑。

迈入九十年代,珠江三角洲基础教育将会有新的发展和提高。这是以下两个基本因素决定的。其一是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现在,珠江三角洲经济正在继续整顿,步入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时期,在产业结构上,具有现代化水平的技术密集型企业正在逐步增加,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正在向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相结合的产业结构过渡;基本形成了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开放城市等多层次

的格局,走以外贸为导向、乡镇骨干企业为主体、以科技进步为动力的经济发展道路,外向型经济将得到愈来愈大的发展。这种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生产结构的变化,要求拥有一支具有初中或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和相应职业技术的普通劳动者队伍,同时也要求拥有一支相当数量的、结构合理的科技、外贸、金融、管理、公关等专门人才队伍。然而,目前普通劳动力的文化和技术素质与客观要求很不适应。据1987年统计,佛山市农村劳动力中,高中文化程度仅占5.4%,初中文化程度占13.7%,小学文化程度占37.4%,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43.5%;乡镇企业职工绝大部分是“洗脚上田”的农民。近几年来,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虽有所提高,但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这种现实矛盾,迫切要求该地区各级领导和群众进一步发展基础教育。其二是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当前世界各国和各地区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正在向现代化进军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各市县也在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生产设备和科学技术。如佛山市,到1987年底,工业企业中四、五十年代的设备已基本

淘汰，50%以上的生产设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其中属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世界先进水平的占45%左右，塑料、家电、电子、陶瓷、纺织五大行业基本上达到了现代化生产技术水平。基础教育面对生产、科技的这种发展态势，不能不充分重视学生素质的培养，在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中等教育结构等方面进行相应的深化改革，以适应现实和未来的客观要求。

从以上两个基本因素出发，九十年代珠江三角洲基础教育的深化改革将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 一、从升学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

普通中小学，当然承担着培养学生升学的任务，但是，如果不顾学生全面素质的和谐发展，而把升学作为办学的指导思想和衡量学校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是违反基础教育本质的。由此必然会产生种种违背教育规律的要求和措施，如延长授课时间；增加大量超教学大纲要求的超负荷的升学考试参考资料，频繁地考试；削减非考试科目（如音乐、体育、图画、手工劳动等）及其课时；片面培养尖子生，大量淘汰中、差生，等等。其结果，降低了基础教育质量，影响了人的全面发展，造成基础教育与社会客观要求脱节。对此，中央和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已引起高度重视，要求采取社会综合治理措施，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把基础教育真正办成提高中华民族素质的教育，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这个正确的决策，将成为珠江三角洲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

基础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九十年代基础教育的基本要求是：培养学生具有适合

社会发展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行为，有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具有比较系统而坚实的文化科学基础知识、良好的智力和适应能力，有探求精神和创造能力；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身体素质；具有正确的欣赏美、评价美和创造美的基础知识和能力，在复杂的文化环境中能够辨别真伪、是非、美丑和善恶；懂得现代生产的基本原理，学会使用现代生产的简单工具和劳动技术。这是为21世纪造就所需人才奠定良好基础而对中小学学生实施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技术教育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目标。同时，必须把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结合起来，使受教育者成为富有个性的全面发展的新人。为此，在这个基础教育的转变中，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端正教育思想，树立并强化基础教育是公民素质教育的正确观点；（2）坚决落实使学生品德、智力和体力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中小学根据各自特点开设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课程，构建适当的课程体系；（3）优化学校领导和教师这两支队伍；（4）增加教育投入，进一步改善学校设施和教学设备，为全面的素质教育创造必要的或良好的物质条件。

二、巩固和发展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成果，大力提高教育质量。

预计在1992年前，全地区都将实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但由于师资、经费等条件的限制，在九十年代，高中教育还不可能普及，而只能有较大的发展；基础教育发展与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大力提高教育质量。

统计数字表明，教育质量问题是巩固



和发展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成果、提高基础教育水平和效益的主要矛盾。中山市某镇1987年小学毕业生598人升入初中，其中语文数学两科平均分不及格的占50%，两科总分达不到80分的占13.4%，最低的只有15分。肇庆市1989年市统一命题的小学毕业会考，语文数学两科平均合格率为50.2%。台山县1989年全县初中毕业生9704人考高中，6科平均分只有49.2，合格率为86.8%，其中数学科合格率仅有26%，英语科合格率只占17.88%。这就是说，初中一年级新生约有一半不合格，但由于实施普及初中而被招收入学；高中一年级新生的不合格率也高。生源的知识基础差，已给中学教育带来了许多实际问题。如许多初中生因学习成绩不好，考试不合格，失去了继续学习的兴趣和信心，半途辍学，造成目前初中生非正常流失率较高。据1989年统计的流失率，中山市为2.7%，台山县为1.98%，佛山市为1.76%。由此可见，在实施普及义务教育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数量与质量、发展与提高的关系问题。历史的进程要求我们，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珠江三角洲基础教育在今后十年，必须科学地指导发展，积极地提高质量，扎扎实实地改革不符合时代和社会要求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学形式、教育方法、考试制度、教育评价和教育管理，向着基础教育现代化的方向迈进。

三、改革基础教育的单一模式，建设基础教育的新结构。

珠江三角洲基础教育的模式和结构正在发生变革。以前，基础教育只是单一的普

通教育，这种模式是工业革命时期的产物，其任务是使学生学习和掌握普通文化科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普及义务教育的实施、学生毕业后就业机会的增加和社会对就业人员素质要求的提高，学生在中小学阶段只学习一些普通文化科学知识，已经不能适应就业的要求了。近年来，中小学毕业生不会种田、不会养殖、不会做工、不会经商等现象很普遍。这种不符合国情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教育，引起了学生、家长和社会的批评，他们普遍希望和要求把职业技术教育引进普通教育中去。笔者曾在东莞市和中山市的普通中学作过抽样问卷调查，在回答“你认为普通高中需要开设职业技术课程吗？”的194名高生中，有163名填“很有必要”和“必要”，占84.1%；24名回答“可有可无”，占12.3%，只有7人填写“不必要”，占3.6%。这说明，基础教育的模式和结构已到了不改革不行的时候了。

基础教育模式的改革，核心问题是变革单一的普通教育为普通教育为主，实施普通教育与劳动技术教育或职业技术教育相结合的模式，使基础教育真正做到为学生升学打基础，又为就业打基础。这会引起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是否会降低基础教育的质量。产生这个疑虑，是由于人们仍以学习书本知识的成绩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基本标准。这个传统的教育质量观应该改变了。现代职业要求从业人员不仅要掌握普通文化科学知识，而且掌握一定的职业技术知识；不仅要有书本知识，而且应有实际本领，不仅能动口，而且会动手；不仅能认识世界，而且能改造世界。中小学教育要

为培养现代人打基础，就必须进行这些方面的培养和训练，并以之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一种标准。普通教育职业化，职业教育普通化，这是时代的潮流。它不仅不会降低教育质量，两者的结合所带来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还会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

第二，是否会过早专业化。“过早专业化”，是针对教育史上一种降低普通教育水平而进行手工艺匠学徒式训练的倾向提出来的，今天切不可简单地以它来否定普通教育模式的改革。因为，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相结合，能够使学生学到必要的普通文化科学知识，又学到一些生产、管理方面的科学技术原理和经济原理，学会一定的职业技能，这不是训练手工艺学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委员会编写的《学会生存》一书指出：“如果所谓的普通教育要真正成为普通的教育，那就必须发展技术教育。如果普通教育要具有充分的教育价值，那就必须注意使智力训练与体力训练和谐一致，并经常把学习与工作结合起来。”这反映了新技术革命时代对基础教育的新要求。现代社会的教育，已由职前的一次性教育发展为终身教育。基础教育是终身教育的一个开端环节，学生受完中小学教育之后，还会边工作边学习，普通文化科学知识还能够不断丰富、提高。因此，尤其是在经济还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使中学生在学习和掌握必备的普通文化科学知识的同时，学到“一技之长”，更能提高基础教育的价值。

第三，要研究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比例关系。现在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以普通教育为主，兼施劳动技术或职业技术教育。但两者在小学、初中、高中各阶段

的具体比例如何？珠江三角洲各市县都在探索。譬如，初中阶段的办学模式已经多样化，有的在初中开设职业技术课；有的采取初中二年级“分流”（指读完初中一年级后，一部分学生继续接受普通教育，另一部分学生在接受普通教育的同时增加职业技术课比重）；有的采取初中三年级“分流”；有的采取初中“三加一”（即对初中毕业后升不上高中的学生，进行一年的职业技术教育）。初中教育模式将如何发展、完善，是亟需从理论和实际上加以很好探讨的问题。基础教育模式的改革，有力地推动着基础教育结构（主要是中等教育结构）的改革。珠江三角洲中等教育结构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调整普通中学与职业技术中学的比例。在中等教育结构改革之前，中学基本上都是普通中学，中等专业学校、中等技工学校和职业中学极少。近10年，通过发展职业技术中学和把部分普通中学改为职业中学，普通中学与职业技术中学的比例已发生很大变化。据珠江三角洲8个市县统计，职业中学已发展至145所，1881个班，招生人数3.28万人，占高中阶段招生人数的47.9%，在校学生人数7.09万人，占高中阶段在校学生总人数的42.6%。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渐趋合理。二是把单一化的中等教育结构变为多元化结构。目前，有普通教育与劳动技术教育相结合的普通中学，还有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相结合的一校两制的综合中学。如中山市杨逸仙中学，校内即有普通初中班，又有以学习专业技术为主的高中职业班，还有以学习文化基础知识为主兼学一点职业技术的普通高中班。这种学校，将会在珠

江三角洲显示其生命力而得到逐步发展。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高中入学率将有较大增加，但不能主要靠发展普通高中来满足初中毕业生的升学要求。应实行普通高中、综合高中、中等专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中等技工学校并举，办学形式可灵活多样。在农村应加强基础教育的横向联系，搞好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统筹安排。中等教育阶段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相互渗透的道路，使基础教育以提高劳动者全面素质为重点的要求得到真正落实，把培养初、中级技术人才放在突出位置，使基础教育迎合了社会的需要。

四、进一步开拓筹集教育经费的渠道，增加基础教育经费。

过去十年，本地区各市县的教育经费虽有数倍至十几倍的增长，但由于学生、教师和学校的数量都有很大的增加，办学条件需要改善，再加上物价上涨等因素影响，基础教育经费仍是紧缺的。新会县是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县，人口84.8万人，1985年以来，县财政每年都支出1000万元以上用于教育，1988年达到1650万元，年人均经费接近200元，但除了支付公办教师的工资等人头费外，中小学的办公费用平均每个学生每月只有一角多。这是难于改善办学条件的。因此，增加教育经费，确是巩固和提高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发展高中教育的最必要条件之一。

增加基础教育经费的基本对策有两个方面：

一是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这是本地区增加基础教育经费的根本措施。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经济实力较厚，

只要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在认识上进一步把重视教育与增加教育投资联系起来，只要学校教育办得切合社会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前景是乐观的。实行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需要建立一个合理的体制。它应该是以国家财政拨款、征收教育税、收取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和义务教育阶段的杂费为主，以鼓励工矿企业、社会团体、个人集资办学和华侨港澳同胞捐资助学为辅，政府和群众相结合，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但它丝毫不减轻政府对发展教育应负的责任。特别是义务教育的经费，应该而且必须主要由政府承担。

二是调整不合理的教育经费结构。这主要是指大中城市而言。如深圳市，1982年—1988年间的教育经费中，高等学校学生每年人均事业费4946.14元，中专生2181.22元，中学生498.32元，小学生204.73元。大学生人均事业费为中学生的9.25倍，为小学生的24.16倍。（引自深圳市教育发展战略研究总课题组：《深圳市教育发展战略研究报告1990—2000年》第七稿）这种教育经费结构，过份倾斜于高等教育，必然削弱基础教育。为了保证中小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顺利进行，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必须适当增加基础教育经费的比例。

五、优化学校管理干部队伍和师资队伍。

优化学校管理干部队伍（指校长和教导主任），是办好学校的关键；优化师资队伍，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优化这两支队伍，是使基础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根本保证。

珠江三角洲现有中小学校的学校管理干部，基本上都是从学校的骨干教师中提拔任用的。他们有丰富的教学教育工作经验，基本素质都是比较好的，能够兢兢业业地想把学校办好，但都比较缺乏教育基本理论和管理科学的理论修养，“经验型”者居多。这是不少学校在深化改革中打不开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今后，随着校长负责制的推行，校长的素质对办好学校具有更大的意义。深圳市等提出要实行校长资格证书制度，要求校长须经教育基本理论、管理科学、方针政策和思想品德考核合格并取得证书后方能任职。这个制度，应该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推广开来，促进办学水平走上新台阶。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师资队伍，曾有过一段不太稳定的时期，经过近几年各级政府采取一些如提高教师经济待遇和开展尊师重教活动等措施，已经基本稳定。当前，优化师资队伍的素质，是一个主要矛盾。

所谓师资队伍的优化，是指把师资队伍建设成为品德高尚、业务精良、善于教书育人的队伍。珠江三角洲教师队伍的情况，与这个要求还有相当差距。以教师的学历合格率来说，各市县的情况不同。深圳市最高，据1988年统计，中学教师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者占总数89.4%，小学教师有中师、高中毕业以上学历者占总数88.5%，幼儿园教师中幼师毕业和取得专业合格证书者占总数72%；而江门市，据1987年统计，高中教师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占总数82.37%，初中教师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者占总数31.81%，小学教师具有中师、高中毕业以上学历者占总数的

74.44%。教师学历达标率，只是说明教师队伍状况的一个方面，教师的素质和胜任率的现实问题和潜在问题更多。优化师资队伍的工作还是很艰巨的，主要有：

1) 建立教师在职进修制度，有计划地安排教师脱产、半脱产和普遍不脱产的岗位培训，提高教师的学历水平；鉴于当前高中教师学历合格率不高和教师队伍存在青黄不接的断层现象，应把抓好高中教师学历提高和青年教师的培养摆在突出地位。

2) 改革和完善各级各类师范教育，从根本上提高师资队伍的素质。目前，急需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提高师范生源的质量，争取更多的优秀中学毕业生报考师范学校，这是一个关系到提高教育质量和民族素质的有战略意义的重要问题。各级各类师范学校均须根据时代、社会对教师的要求，改进办学思想、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方法、教育管理、考试制度和教育评价等。根据该地区的情况，师范院校面向农村的倾斜度大一些，是十分必要的。

3) 各校自己努力培养教学工作和德育工作的尖子，利用他们的典型经验，带动一般；鼓励教师开展教育改革实验、教学研究和科学研究，及时推广他们的研究成果，奖励其中的佼佼者，形成浓厚的学术气氛。

当广大教师的全面素质得到更大提高之时，基础教育必将出现新的面貌。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陶原珂

# 民本主义论纲

陈胜莽

在以儒学为正宗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主义是儒家用以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

民本思想在商周先秦时代已萌芽、出现；民本主义形成为思想体系，则在汉晋唐时代，到明清日趋完善，鸦片战争以后，开始与近代民主主义相衔接。

民本主义不论在兴衰起伏、更替频仍的中国古代，还是在中西文化互相碰撞、不断汇流的中国近代，都有其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

然而，近代以来，政、学两界人士在探讨或接受民主问题时，却往往以民本主义的传统观念去理解、附会、扭曲以至改造西方传来的民主主义观念，“仍以古时之民本主义为现代之民主主义”；<sup>①</sup>或者只是强调两者的区别，而不察两者之联系与衔接，对民本主义，理论上简单摒弃，实践中却不注意清除其消极影响。

重新考察民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揭示民本主义的内涵和它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作用，探讨其对近代民主思潮的影响，仍不失为研究儒学与中国文化的一个颇有价值的课题。

## 一、民本思想的历史发展

### 1. 商周先秦时代，民本思想的萌芽和出现。

夏史虽仍无文献可考，但商以夏亡为鉴，则有遗文可据。《商书·盘庚中》之“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等记载，即含重民之意。

商周更替，以兴亡论民本之思想内容逐步丰富，“敬天”与“保民”被紧密联系起来。周人深信，崇“德”之君，才能受天命；“德”即保民，夏商之亡，“惟不敬厥德”。<sup>②</sup>故《周书》所载周公之诰，就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见”、“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义”之论，并提出了为政“当于民监”、“明德慎罚”<sup>③</sup>等主张。

春秋战国时代，天下大乱、列国争雄。如何才能得民心以王天下？成了诸子论证治民之术的中心内容。从孔子“养民也惠”，“惠则足以使人”的仁治观；<sup>④</sup>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其民斯得天下”的贵民论；<sup>⑤</sup>到荀子以舟喻君，以木喻民，提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重民说，<sup>⑥</sup>为此后民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 2. 汉晋唐时代,民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

秦政权的急速兴亡,提供了比之夏商周王朝更替更为震警人心的实践经验。汉初贾谊提出了“民为政本”的著名理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民无不为命”、“民无不为功”、“民无不为力”也;“民者,万世之本”,“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戒之哉!戒之哉!民为政本。”<sup>⑦</sup>

贾谊的“民为政本”理论,很可能是伪古文尚书《夏书·五子之歌》所概括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雏型。据前代学者之考证,古文尚书原本早失,世传东晋梅本,乃魏王肃伪作。故以《五子之歌》为夏人思想,所据不足;谓民本思想始于《五子之歌》之说,恐不妥。其一,夏桀以前,仍无邦国兴亡之痛,探讨“邦宁”之民本理论尚无实践基础;其二,自商以夏亡为鉴始,以致两汉重民之议众多,却未见人引用过“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一语,此语为后人概括两汉以前之重民思想而成,似可无疑;其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一语,言简意赅,内涵丰富完整,可谓已形成理论体系,毫无原始质朴感。若无秦汉兴亡盛衰之巨大实践,这一理论体系,似难形成。

隋朝又一次急速兴亡,对唐人之影响不下于秦。唐太宗与魏征就屡议“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sup>⑧</sup>《贞观政要》就是他们实践和丰富民本主义理论的记录。

## 3. 明初至清中叶,民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完善及其开始与民主主义相衔接。

明初之民本主义者多从“立君养民”方面发挥重民思想。尽管朱元璋不喜欢孟子的“民贵君轻”之论,但他还是说:“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食者民之天,民乃邦之本”;<sup>⑨</sup>他实践民本主义,讲求“施实惠”于民。<sup>⑩</sup>

从黄宗羲对专制君主的批判和对治民牧民之术的讲求,<sup>⑪</sup>到唐甄提出“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的“国无民岂有四政”论,<sup>⑫</sup>从康熙论久安长治应“以足民为首务”、<sup>⑬</sup>乾隆论“自古至治以养民为本”,<sup>⑭</sup>到嘉道年间,林则徐以“国计与民生,实相维系……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sup>⑮</sup>之理,对“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阐发和实践,表明从明清之际到嘉道年间,思想家和政治家们面对现实,进一步吸取和完善前人养民治民之道,探讨在新形势下的固本宁邦之方。值得注意的是,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和梁廷楠等开眼看世界的先驱,还把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民主政治,当作民本政治理想的实现,在中国作了肯定性的介绍,<sup>⑯</sup>透露了中国民本主义开始与西方民主主义相衔接的信息。

## 二、民本主义的内涵及其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作用

1. 内涵。民本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其构成部分主要有三:

其一、“民”在“邦”、“国”中之地位与作用。所谓“民惟邦本”、“国以民为基”、<sup>⑰</sup>“民者,国之本”、<sup>⑱</sup>“百姓,所以养国家也”<sup>⑲</sup>等等,都肯定民是邦国的基础、本根,即

统治者赖以建立金字塔式统治机构的基底，故民在邦、国之中，既处于被统治的绝对地位，又对邦宁与否起着决定性的制约作用。

其二，君主、政权与“民”之关系。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君若足民，则“民之从之也轻”；②“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③“君依于国，国依于民”④等等，都说明，为君者若能以贵民为首务，君所依之“国”、所治之“社稷”，将随之得以巩固；如是，君之治民，民之从君，则轻而易举。可见，君对于社稷和民，既具有绝对统治之权，又负有贵民以存社稷之责。孟子倡“民为贵君为轻”、君若足民则“民之从之也轻”之义，实质是要解决如何才能使君主易于治国治民、使民易于从君的问题；可谓欲取先予，通过贵民以隆君之论。

其三，“固本”与“宁邦”之关系与固本之措施。所谓“本固邦宁”；“民存则社稷存，民亡则社稷亡”；⑤“民安则国安，民乱则国危”⑥等等，都说明，存民、治民、固本，只是手段；存社稷、求国安、达邦宁，才是目的。本不固，则邦不宁。如何固本，即如何存民、治民？其具有积极、进步一面者，在于重民。重民之义，约有三端：一是重视民意，争取民心，稳定民情，“以民情向背而顺导”；二是重视民力，珍惜与利用民力，“导民务本”，即安民于田，以农为本；三是重视民生，培育元气，通过赈灾兴利、整刷吏治、省刑罚、除繁苛等养民措施，以求“元气培而本根固”。诚然，这些“下恤民生”之法，乃是“上筹国计”之方，“安贫保富之计”。民本主义尚有其消极、反动的一面，即“邦宁”受到威胁时，反民、残民以保邦就将跃居为治民之主要手段。“恩威并用，剿抚兼施”——历代民本主义者都曾施展此策，治民宁邦。

## 2. 民本主义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作用。

由上可见，民本主义并不是与封建专制主义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性的“一种民主思想”。它只不过是儒家“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思想之简称。就其阶级实质来说，仍是属于封建统治阶级范畴的改良思想，即比较开明和具有某些民主因素的、力图对封建国家作某种改良维新以求长治久安的重民思想。

因此，在古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其作用首先就在于：通过调和阶级矛盾，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限制和“软化”专制暴政，以维护封建专制政治的正常运转。整个过程，始终以君主为本位。中国的民本主义，把国家久安长治的希望寄托在崇“德”的圣君贤相身上，用“德”来约束他们，促使他们成为清官和好皇帝。

这就表明，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与近代民主主义有着质的区别：

民本主义以君为本位，依靠圣君贤相，“为民”作主；民主主义则以民为本位，实行民主自治，“由民”作主。

民本主义属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体系，也是封建统治者的“治民”之术；民主主义则属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也是资产阶级所需要建立的“民治”之制。

民本主义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目的；民主主义则以否定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目标。

正因此，中国的民本主义，以商周先秦时代萌芽、出现的民本思想为基础，到秦汉以后形成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成为治国治民之指导思想；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哺育了古代中国历代的清官和好皇帝，使他们不同于竭泽而渔的贪官、残民以逞的酷吏、碌碌无为的庸僚、逢迎谄媚的佞臣，不同于倒行逆施的暴君和无所作为的昏君。这些真诚信奉和自觉实践民本主义的清官和好皇帝，不但在中国历史上开创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比较安定繁荣的局面，而且，在天灾频仍、民生凋弊的年代，在维系国计民生、恢复与发展生产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同时，由于他们在统治阶级内部和人民大众中，享有较高的威望，每当外族入侵时，一般都能成为相信“民心可用，民力可恃”的抵抗派代表，为捍卫民族利益作出过贡献。

亦因此，民本主义尽管与民主主义有质的差别，但它强调国家的基础是“民”，基础巩固，国家才能安定、繁荣。这是一种带有一定人民性的国家学说，不失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含有“民主性精华”的部分。尽管不同时代的民本主义者所指的“民”，范围有所不同，但都强调“民”对“邦”的重要性，这就与近代民主主义或多或少有其相通或相似之处，因而有可能成为近代中国人接受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基础和衔接点，成为近代中国民主思潮发生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料。

### 三、民本主义对中国近代民主思潮发生发展的影响

#### 1. 鸦片战争前后至戊戌变法前，近代民主思潮的酝酿。

如上已述，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和梁廷楠等人在介绍美国民主制度时，民本主义这个“旧瓶”，已被他们利用来装上西方民主政治的“新酒”，尽管他们还没有理解，也不可能提出效法西方民主制度的政治主张。只是到了1870年以后，随着中国人对西方了解的加深，效法西方、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治，才被当作一种救时的主张提出来，成为当时一些敢于正视现实的有识之士的政治共识。但这种政治方案的出发点，仍在于补君主专制之弊，谋清王朝久安长治之策；他们所提出的重民意、达下情、去遵隔、结民心等主张，大都是民本主义的传统命题；他们所提出的议院方案，只是备君主谘询、以沟通上下之情的机构，与西方的议院制仍相去甚远。不过，于此亦可看到：西方的民主主义观念，在中国获得最初的表现，正是这些有识之士，进一步借助民本主义的旧思想框架，引进新思想内容的结果。

#### 2. 戊戌时期，近代民主思潮的勃兴。

康梁维新派对西方民主观念的大量引进和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了早期维新思想家，但其思想体系仍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地之中。康有为“托古改制”，把作为变法理论依据的进化论，与古老的公羊三世说揉合在一起；把改制的核心内容——君主立宪，与传统的民本主义合二为一。他从传统的民本思想中，引伸民权思想的“大义”；民本主义与民主主义仍然混淆不清。他们所宣扬的民主主义，实际包含着许多非民主主义的政治观念。然而，形成这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

“新学”，正是康梁维新派充分利用民本主义的思想资料，大力宣传近代西方民主主义的结果。也正是他们，充分利用中国士大夫们熟知的传统观念，阐发新的政治价值观，有力地推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主思潮的发展。恰如梁启超所云：其“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sup>⑤</sup>

### 3. 辛亥时期，中国近代民主思潮的高涨。

辛亥民主思潮的推动者，是与旧士大夫完全不同的新式知识分子。尽管他们的思想深度与认识水平也不足以对民本主义做出系统的、理性的清理与批判，但他们在借用民本主义的思想资料进行革命民主主义宣传时，较之康梁，又跨进了一步。孙中山在《香港兴中会章程》中，就直接引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一语，作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的号召。<sup>⑥</sup>然而，他把民本主义框架中那些维护专制王朝久安长治的旧传统，作了革命性的摒弃，输进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新内容。此外，他还刊行黄宗羲的《原君》、《原臣》这类民本主义作品，大力进行反清反封建的宣传。刘师培、林白水更大量集录历代民本主义言论，写成《中国民约精义》一书，宣传卢梭的《民约论》。传统的民本主义，被注入了崭新的内容，被纳入到近代民主主义体系之中。

### 4. 五四时期，对中国近代民主运动的反思。

五四启蒙思想家，比之倡导民权的前几代人都不同，他们对传统文化采取了毫不妥协的态度，试图从思想上彻底清除封建专制主义的根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辨明传统的民本主义与近代民主主义的质的区别。陈独秀鲜明指出：“所谓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所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此等仁民、爱民、为民之民本主义，……皆自根本上取消国民之资格，而与以人民为主体、由民主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sup>⑦</sup>他们把近代民主思潮推向了新的高峰。然而，他们在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时代氛围中，却没能对具有某些民主因素的民本思想进行理性的、冷静的反思与清理，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 四、民本主义对近代中国民主思想家政治家的制约

民本主义不仅作为一种传统的政治思想资料，渗透到近代中国民主思潮发生发展过程中，而且经过长期的积淀，已内化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从更深的层面上制约着近代思想家政治家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

### 1. 从近代民主的主要特征，看民本主义的思维模式对近代思想家政治家的制约。

民本主义以国家为本位，以君主为本位，它从统治者的视角出发，政治思维的取向是自上而下的。近代思想家政治家们所追求的民主主义，与传统的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本来是格格不入的，但他们在思维模式上，却表现出与古代民本主义者有着惊人相似之处。

其一，近代中国民主思潮注重国家的振兴，忽略个人的自由、平等和独立。早期维新思想家与康梁维新派提倡效西法、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时，就强调其目的是为了兴国、强国、“张国势”，挽救民族危机，而不是把它作为实现人民主权的手段。孙中山后

来说得更明确：为了国家的自由，个人应“牺牲自由”。总之，国家成为一切政治考虑的轴心。这一特征固然与近代西方列强东侵、中国民族危机严重有关；但传统的民本主义强调一切以“邦宁”为转移的思想模式，也使近代政治家思想家们仍受影响，使他们的思维模式，与古代那些以天下为己任、以治国平天下为理想的民本主义者，极其相似。

其二，近代中国民主思潮注重民权的组织形式或政体，忽略人民主权的实际内容。这一点与上一特征密切相关，也与民本主义与国安、邦宁为目的之思维模式暗合。

其三，近代中国民主思潮注重自上而下地实现民主政治，忽略民众自身的民主实践。康有为在戊戌时期，就试图“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依靠圣君“乾纲独断”来推行变法，<sup>②</sup>实行君主立宪；孙中山则想依靠少数“先知先觉”的人造成民主共和，然后再把现成的民权交到人民手中。正象李大钊所指出，这是“以英雄政治、贤人政治之理想，施行民主政治”。<sup>③</sup>这种政治设计的思维模式、思维取向，与民本主义多么相似；民本主义者倡导圣君贤相为民作主，向人民施仁政，人民是被动的接受者，而康有为、孙中山倡导民权的思维取向，也是自上而下，试图为民作主，把民权恩赐给人民。

## 2. 民本主义对近代思想家政治家行为模式的制约。

康有为、孙中山、陈独秀等近代杰出人物，在思想上热烈追求民主主义，但在行为上为什么都倾向于家长式的权威主义，表现出唯我独尊、唯我正确的独断的政治作风呢？显然，他们的政治行为模式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制约和影响：其一，英雄政治、贤人政治观念，体现在领袖人物的实践中，往往就以家长式的权威主义出现，这是思维模式在政治行为上的反映；其二，民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相互依存、相互强化而形成的政治文化土壤，是产生家长式权威主义的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民本主义不仅是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也迎合了广大自给自足的、分散的小农心理需求，成为他们的政治理想。他们缺乏自我组织和自我解放的力量，总是乞求圣君、贤相、清官、廉吏，乞求一个高高在上的救世主。在这样的政治文化土壤之中，近代的政治家想要引导和动员“一盘散沙”般的广大民众，组织仍带有浓厚小农意识的知识分子，似乎除了借助家长式的权威主义之外，别无选择。这种现实的需求与政治领袖人物既有的贤人政治、英雄政治的心理定势相汇合，势必紧紧制约康有为等人的行为模式。

## 五、余 论

基于在民本主义到民主主义的历史发展变换的过程中，两者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民本主义确为近代中国人接受近代民主主义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和衔接点，对于近代民主思潮发生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由于两者毕竟有着本质的区别，民本主义又成为近代民主思潮深入发展的包袱和障碍。这一传统重负，对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对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家们的消极影响和制约，也不能低估。由此，近代历史启示我们：进一步分解、清理民本主义的“民主性精华”和“封建性糟粕”，与完成现代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历史任务，并非无关，亦非关系不大，仍有待于进一步努力。



- ①⑲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353页。
- ② 《周书·召诰》。
- ③ 《周书·康诰》、《周书·酒诰》。
- ④ 《论语·公冶长》、《论语·旧货》。
- ⑤ 《孟子·尽心下》、《孟子·离娄上》。
- ⑥ 《荀子·大路》。
- ⑦ 《新书·大政上》。
- ⑧ 《贞观政要》卷一、四、八，《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 ⑨ 《明实录·太祖实录》卷六五。
- ⑩ 《明宝训》。
- ⑪ 《明夷待访录·原君》、《明夷待访录·原臣》。
- ⑫ 《潜书·明鉴》。
- ⑬ 康熙十二年谕户部。
- ⑭ 乾隆二年七月谕。
- ⑮ 《林则徐集·奏稿》(上),第148页。
- ⑯ 参阅拙著:《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4—317页。
- ⑰ 王符:《潜夫论·边议》。
- ⑱ 《淮南子·主训术》。
- ⑲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二《再上龚舍人书》。
- ⑳ 《孟子·尽心下》、《孟子·梁惠王上》。
- ㉑ 《贞观政要》卷四。
- ㉒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 ㉓ 荀悦:《申鉴·杂言上》。
- ㉔ 贾谊:《过秦论》。
- ㉕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32页。
- ㉖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页。
- ㉗ 《戊戌变法》(四),第34页。
- ㉘ 《李大钊文集》(上)第563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林有能

(上接第85页)

于是提出“学至于无学”,在体制格调上不求一一合于古人,而重视师法其创作态度,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情性为创作的最高宗旨。就创作原理而言,元好问这一观点显然比严羽通达,无拟袭之弊。但是元好问所称的性情又往往和“正”联系在一起,以至论唐诗说:“唐人之诗,其知本乎,何

温柔敦厚,蔼然仁义之言之多也。”反不如严羽以体制之悟论唐诗,推宗其格力、气象、兴趣、音韵等,比较接近唐诗艺术的真谛了。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语言文学所  
责任编辑:刘斯翰

# 中国近代军阀与中国近代化进程

郭剑林

把中国近代军阀放在中国近代化进程来考察，便会发现其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还是起了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 一、从君主专制政治向军事分权政治过渡

中国的君主专制政治历时几千年，“皇帝”偶像对中国大臣将军和黎民百姓均具有强大维系人心的魅力，在政治权威上富有极大向心力。但自1840年以来，西方社会政治学开始传入中国，这种“皇权”便动摇了。洪秀全要诛灭皇帝咸丰，曾国藩“抗诏北上勤王”，而其湘军营制体制“只论事寄轻重，不论品秩尊卑”，竟出现“在他军充当统领，而在此军充当营官，在他军充当营官，而在此军充当统领者。时地既殊，势分即异”的怪现象。<sup>①</sup>

所谓的“君主尊严”、“国家名器”、官秩尊卑、上下级关系全乱了套！及至孙中山得袁世凯的“合作”而一举把皇帝赶下台，建立起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这样，在近代中国社会伴随着农民起义、改良家鼓吹立宪、革命家实行革命，湘、淮、北洋军事集团“待以地方之任，兼带湘楚之兵，事权归一，毫无掣肘之处”，<sup>②</sup>在所据地盘内实行军事分权，并由军权而政权而财权而用人权，造成“中外系望，声在政府上”<sup>③</sup>的新的政治局面，终于导致了“君权神授”论的彻底破灭。近代史表明：当旧观念面临危机，走向衰亡，而新观念通过各种渠道不断传播而又一时尚不占主导地位时，社会文化心理即呈现出一点“空白”。

历史又表明：君主专制政治毕竟逐步被打破了，晚清至民初这段历史既然是君主专制政治向军事分权政治的过渡时期，社会是前进了。诚然，曾、李、袁军事分权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巩固晚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自己的独裁统治。但客观上也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民国以后的北京中华民国政府，政治上多元化，思想文化、社会风俗也有一定的开放与改革；它在形式上一直标榜着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在北洋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设有两院制的国会，总统由“民选”产生，也不像皇帝那样“尊严”，“凡事独断专行”了。一方面是“天赋王权，这个旧的封建官僚社会的最高政治表现和最高政治代表，不可能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作出任何真诚的让步。它的保全自身的本能，它所依赖的站在它后面的社会，将经常驱使它收回已经作出的让步，保存自己的封建性质，冒险实行反革命

政变。”④……袁世凯与张勋复辟帝制，即是证明。另一方面，无可否认，资本主义因素逐步渗透到政治、经济、军队的各个领域，这又是“天赋王权”无法阻挡的。

军事分权政治，表现在各大军事政治集团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实力，控制中央地方政权，使权力重心经常发生游移，造成国会、内阁及省议会、省务院形同虚设之局，使中华民国、“湖南国”等在军人手里仅是漂亮的门面而横遭摧残和破坏，暴露了独裁者的倒行逆施，使北洋政府“令不出都门”，从而播下了人民革命的火种。但他们在形式和表面上又不得不基本保持着“共和国”的旗帜，且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专制者妄图走回头路。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每一次政治改革试验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对人们政治思想的影响，忽略每一次经验积累的社会价值和它在推动下一次试验的历史作用。这是必须指出的。

军事分权政治，还表现为地方自治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国的地方自治萌芽于19世纪中叶，至1908年预备立宪全面推开。不仅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极力主张；而且，中国近代军事政治集团亦高唱并实行地方自治。袁世凯、徐世昌均颁发有关地方自治的条例和法令，至黎元洪时，更是秉直系吴佩孚意志下令“尊重地方自治”，“各省与不抵触国宪范围内，得自制省宪”。⑤使省宪运动，“联省自治”运动在全国普遍兴起，形成地方自治、宪政运动的高峰。

## 二、从世袭政治权力向竞争政治权力过渡

封建君主制政治是同世袭政治权力互为因果关系的。但在君主尚存，曾国藩就选李鸿章为替身，李鸿章选袁世凯为替身。民国以来，袁氏曾有将政治权力“传诸子孙”，使王权复活之举。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不断增长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来吸收、改造西方近代文化占统治地位，所以，袁世凯、张勋的“王权”梦难以实现，近代中国的军事政治集团便代之以武力为后援，以“民意”为口头禅来激烈竞争政治权力。

事实上，辛亥以后，在北洋系统治时期，最高政治权力及地方政治权力竞争异常剧烈。经济财产私有，而政治权力“公有”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

北洋政府一直标榜实行“责任内阁”制，即以国务院及所属各部为行政中枢，国务院总理居于行政首长地位，并不对总统负责，而是通过国务会议处理重大国务。但必须以在国会中取得大多数议员的信任为前提，组阁者势必在国会中得到有力的拥护，即对国会负责，受国会的限制。国会有权否决内阁的要案，有权弹劾阁员使其去职，而内阁则无对付的武器，只好俯首听命。大总统虽享有若干特权，但仅是一种名义，其特权或由别的机关行使或受种种限制。

这样就造成“府院之争”，国会解散，阁潮迭起的动荡政局。所以，北洋系统治时期，十易国家元首，包括临时大总统、大总统、代总统、临时执政、大元帅等名称，他们或由临时参议院（国会的前身）或由国会——民意机关所选出，自为“合法”大总统；而内阁总理更迭42届，高达59人次；共组成过5届国会，颁布过7部宪法。所有这些，多

少表明：完全倚仗“高贵血统”和某家姓氏来独揽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的时代已送进了历史博物馆；“天赋王权”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代表”对近代资产阶级社会不得不作出了“让步”，而使那些“乱世英雄”们凭着自身的实力（不管是正当的还是卑鄙的），打着“民意”的招牌去竞争政治权力。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而不是“最黑暗、最反动”时期的历史大倒退。

### 三、从“以礼治国”向“中体西用”过渡

在封建闭关时代，政治只是朝廷深宫中的东西。鸦片战争后，改革成为近代历史的主旋律，笼罩在政治权力之上的神秘面纱被揭开，社会各阶层人士竟相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各国的发展。

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等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是旷古未有的奇耻大辱。他们对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强烈不满，甚至绝望，政治思想开始由“以礼治国”向“中体西用”转变。龚氏“往往引公羊之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sup>⑧</sup>林氏主张“上崇国体”，“内修吏治”，抵抗侵略，但要了解西方世界。<sup>⑨</sup>魏著《海国图志》指出：要“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冯氏《校邠庐抗议》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源，辅以西方诸国富强之术”。

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认为：“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sup>⑩</sup>“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术而非孔孟之常经也”。要“主以中学辅以西学”。<sup>⑪</sup>

而康有为、严复等则进一步主张“体”、“用”不可分割论。康氏“托古改制”、“三世大同”思想即将西方政治学灌进了“孔子之道”。严复指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体”与“用”是互为表里、互相结合的。这就是“援西学入儒”、“返本开新”，即以民族本位为立场，走“西学中用”道路。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上述改良派的思想与近代实力派湘系、淮系、北洋系头目的思想，在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来吸收、改造西方近代文化，以谋求中国近代化方面是趋于一致的。在这一点上学术流派与军事政治集团也是互相利用的。所以，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吴佩孚等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和对帝国主义的揭露以及对顽固势力所进行的一定程度上的冲击和斗争，是有意义的。冲击力和挑战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合力进行的。

鸦片战争后，即19世纪60年代，近代中国即兴起“新儒学”派。而曾国藩则是这派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第一人。他是由著名理学家演变为洋务运动的创始人的。李鸿章、吴佩孚等均效法之。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近代“新儒学”的产生，是以中西文化冲突为历史背景的。他以弘扬儒家“道统”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为宗旨，力图站在民族本位立场上，走“中体西用”的改革开放道路——改革和调整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体系。他说：“中国文武制度，事

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sup>⑩</sup>故“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sup>⑪</sup>“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炸炮、学造船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长技我皆有之”，<sup>⑫</sup>然后方可“制夷人。”“其远略”落实在“自强”，“使西洋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sup>⑬</sup>正是根据这种“中体西用”理论，他设立军械所、机械制造局、新式学堂及翻译馆，试制洋枪洋炮、轮船，翻译书籍以及选派留学生赴美学习。以后留学生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而有新军的“反戈一击”，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自治运动等。这种引进近代西方的物质文明与中国传统的孔孟、程朱之道的精神文明相结合，即以孔孟、程朱之学为主体，融合中西、“返本开新”的主张和实践，在当时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对今天亦有值得重视的启迪价值。

吴佩孚从曾国藩著述中领悟到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内圣外王”的道理，认为：“致知、格物、诚意、正心，而以修身为其归宿。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以修身为其起端。由修身而心正、意诚、物格、知致所谓内功，即内圣之功；由修身而家齐、国治、天下平，所谓外功，亦即所谓外王之学。”<sup>⑭</sup>

这就是说，曾、吴所强调和所奉行着，修身养性而已。他以“内圣”取“外王”，表现出明显的泛道德主义倾向。他们修养的实质内容，“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好，“心正、意诚、物格、知致”也罢，都要用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来衡量，均为个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精神文明建设的系统工程。他们认为，所谓“内圣之学”，就是“即物求道”、“致知格物”之学，<sup>⑮</sup>也即经世之学、“身体力行”之事。坚持“致知”工夫与“身体力行”工夫的统一，反对理论与实践的脱离。“外王”不只是政治，还包括整个物质生活和现实生存。首先是科技、生产、经济方面的问题；其次是反侵略、爱国图存问题。

清末民初，中西文化既有冲突、对立的一面，又有融合、会通的一面。在位者既首当其冲，为寻应付之方，故或多或少接受一点西方文化。因而在施政方式、政府结构、社会礼仪等方面均发生了变化，一定程度上标志着社会生活逐步民主化、文化传统的进步与革新。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一代新文化大师脱颖而出；蔡元培成功地改造了北京大学；邵飘萍、黄远庸两位新闻巨擘一则则“独家新闻”，一篇篇时论文章众口交传；革命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洋时期成长起来。这一切，同北洋政府的文化政策的宽松和社会改革及社会文化心理失去平衡有关。

#### 四、从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

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民间不计，统治阶级中是在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方针下逐步从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的。“中体”与“西用”既有相互矛盾的一面，坚持“中体”，“西用”受到一定束缚与影响；但又有某些会通的一面，即“西用”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冲决“中体”的小块堤坝。它们是在这种制约与反制约的错综复



杂矛盾运动中前进的。

近代湘、淮、北洋三系是土地与资本兼而有之。大小军事政治头目普遍占有大片土地，广置田房产舍，从事小块出租方式收取地房租，采取前资本主义的经营与剥削手段。他们就是“新起的诸侯……几乎有名的大地主中，找不出几个不是出身于军阀官僚的。”<sup>⑦</sup>这种土地、房舍占有高度集中于军人之手，而土地的使用分散于个体小生产者，就形成各个“土围子”，“独立王国”。这也正为近代军事政治集团割据自雄、拥兵称霸造成了先决条件和物质基础。他们利用手中控制的权力，可以任意扩充私人军队和强占地盘、霸占良田、种植鸦片；或利用官款兴办近代工业企业，而将所获私款存放于中外银行；或者发放高利贷，进行超经济掠夺。所以，封建剥削、地主阶级，是近代湘、淮、北洋三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阶级和经济基础。

然而，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必然带来的“半资本主义性”，也使三系多少带有资产阶级性。近代军事工业企业，如前所说，是从曾国藩开始兴办的。其门生淮系集团头目李鸿章从70—90年代创办了十几个民用企业，基本上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李氏得力幕僚盛宣怀有资本1611万元，是中国早期最大的资本家。1886年淮系大将周盛波与官绅杨宗濂、吴懋鼎等在天津创办自来水公司，资本18000两。北洋系总头目袁世凯创办了更大更多的工业企业诸如银元局、官银号之类的金融事业；直隶工艺总局则是倡办民用工业的总的领导机关，“民用一切开办之，保护之方，莫不代为筹画，总以扶助为主义。”<sup>⑧</sup>对天津大城市的兴起和工业企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袁氏与周学熙等人在清末已创办了北洋机器局、滦州煤矿、启新洋灰公司、北京自来水厂等近代工业企业，颇富民族资本性质。以后的北洋直系头目曹锟家族在天津所积累的资本约6000万元之巨。<sup>⑨</sup>而号称“北四行”的盐业、金城、大陆、中南，这四家银行的资本主要来源于北洋系头目的投资。诸如徐世昌、王占元、孙传芳、冯国璋、倪嗣冲等人，他们在中国近代工业企业的投资是相当惊人的。

近代军事政治集团通过政权，尤其是军队霸占土地，榨取地租；又通过官款、私款投资于近代工业企业获得利润，转过来再购置田房产舍和进行高利贷剥削。这种土地与资本相互转化、增殖，使他们成为新起的大地主，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近代资产阶级的行列，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毛泽东指出：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sup>⑩</sup>湘、淮、北洋三系的产生与发展，政治、思想及军事的近代化，正是这种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反映。

## 五、从封建军队向资本主义军队过渡

中国近代军事的发展，分为湘系、淮系、北洋系三个阶段：“湘军演变而有淮军，淮军演变而有北洋军。”<sup>⑪</sup>它们的兴起与发展是以封建大一统专制体制走向分崩离析、民族

主义和民主主义勃兴为其历史条件的，是学习西方、实行社会改革的直接产物。

曾国藩对“英夷”侵华强烈不满，作诗谓“国仇犹未雪，何处著迂儒”？<sup>①</sup>湘军是在既无“国恩”又无“皇恩”，变“世兵制”为募兵制，自筹军饷，自练军队的情况下兴起的。但它一旦兴起即迅速形成集团势力和尾大不掉之局，此后，中央的一兵一卒，一饷一糈，无不仰求于督抚。<sup>②</sup>1861至1862年，正当太平军向江浙胜利进军，席卷江南财赋之区时，曾国藩曾反对“借师助剿”太平军，后为清廷和军情所迫，转而同意西方“进兵”，认为“舍此别无良策”。<sup>③</sup>李鸿章则乘机把西方先进军事技术与制度结合起来引进中国。在军事与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使他成为近代中国采用西法练兵的第一人，其时间且先于日本。淮军水陆军正是在外资支持下（通过海关每月拿出十几万两白银为淮军开支军费，提供贷款和洋枪洋炮）而迅速发展壮大的。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告终。社会上层“一时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sup>④</sup>清廷亦看到旧军编制难改，勇营制陈腐不堪，必须效法西方，改革军制，以求自强。12月，袁世凯到天津小站编练新建北洋陆军，是中国近代陆军军制全面近代化的开端，在军队的训练、装备方面，较淮军更为彻底的采用西方国家军队的军制、军规、条令（袁颁布十余种）及最新式武器装备，可以说“全盘西化”。

1899年袁世凯炮制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问世，纯是西方战术体系，与淮军、勇营制截然不同。1910年，袁世凯又颁布了《新定步兵操法》，在北洋新建陆军的战斗法则和战术思想方面又引进日本操典，使中国陆军在战术思想运用和军事学术发展方面前进了一步。在军官素质、征兵标准、军队建制、军事教育、武器装备、兵种配合、战略战术等方面，都相应地、全面地采用了西方或日本的军制模式。毋须讳言，无论北洋军、淮军，其“中体”与“西体”存在着严重矛盾。新建陆军是从旧军的躯体中脱胎而生，军队中的封建隶属关系、宗法思想成为部队的一条支柱。然而，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体系，防碍着资本主义军队的发展，新军官兵就毅然冲破封建隶属关系和宗法思想的藩篱，接受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打破旧军桎梏，掉转枪口成为埋葬清王朝的武装力量。北洋海军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倾向更为浓厚，大多成为孙中山的追随者。这是由封建性军队向资产阶级式军队转化、由倾向革命到投身于革命的明显的历史证据。北洋军起了承先启后的进步作用似毋庸置疑。

① 《左文襄公集·奏稿》第39卷第2—3页。

②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第11卷。

③ 《清史稿》第39卷第1201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02页。

⑤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343页。

⑥ 已往史学界对北洋系统治时期的一种评论。

⑦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⑧ 林则徐：《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

⑨ 王韬：《易言跋》。

⑩ 郑观应：《危言新编·凡例》。（下转第98页）

# 清代东南地区货币地租质论

陈支平

研究清代社会经济史的人们，尤其是研究清代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人们，对于清代农村租佃关系中的货币地租格外重视。因为，货币地租的普遍出现，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是清代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空前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货币地租作为自然经济的对立面，它既是封建地租的最后形态，又是封建地租的解体形态，马克思曾经指出：地租一旦采取货币形态，“虽然直接生产者和以前一样，至少要亲自生产他的生活资料的最大部分，但是现在他的产品已经有一部分必须转化为商品，当作商品来生产。因此，整个生产方式的性质就或多或少要起变化”。<sup>①</sup>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则把清代地租形态的变化与货币地租的发展，称作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三大历史前提之一。换言之，没有清代的货币地租，便不可能有中国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

然而至今为止，从事实上论证清代货币地租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密切关系，却多少有些不尽人意。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有关清代货币地租的记载相当有限，虽然近年来有不少同志努力发掘清代官中的档案资料，作了一些数量的统计，但这些从中央官府题本上得出的统计数字，难免失之空泛，人们从这些统计数字中，似乎可以看到清代中国的天南地北，处处都有货币地租出现，但是至于这些货币地租是怎样出现，有些什么不同的种类和特点，就不得而知了。

笔者认为，要恰如其分地论述清代货币地租的历史地位，并进而展望清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清代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就很有必要对清代货币地租的种类和特点作一更为仔细的分析。本文试图对清代东南地区的货币地租作一区域性的初步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教。

冯尔康先生认为，在中国历史上，货币地租最早出现在官田上，货币地租有着从官田向民田发展的趋势，<sup>②</sup>这是十分正确的。因此，清代东南地区的货币地租，首先在官田或半官田的租佃关系上，逐渐流行起来。我们试举清代江西省的十个县份的部分学田租示例说明。（见表1）

清代江西省的学田租佃，当然并不完全象上举的十县一样，收取或折取货币地租，有一些地方一直到清代末期，学田租依然按照“民田俗例”，收取实物租，同时，在上举的十县学田中，也不是全部收取货币租，如昭萍县、萍乡县、万载县、清江县，在收取货币地租的同时，也收取一定数量的实物租，但综合各方面的资料看，清代学田收取货币租，无疑是同时代其他各类田土中比重最多的。

清代各地学田租的折银比例较高，显然是受到明代中叶以后赋役折银化的影响，特别是明代万历年间推行一条鞭法之后，赋役的折银化更加普遍，于是，作为官田和半官田性质的学田，也从明代中叶开始，其田租用银钱折纳的现象日益增多，到了清代，封建政府在下达有关学田的法令时，也已基本上以折银交纳学田租为准，<sup>③</sup>《清朝文献通考》中记载，学田“租耕收租以待学政”，每亩征收租银六分四厘零至六钱九分零不等。雍正二年，总计天下学田为三千八百余顷，年征收租二万三千四百余两。<sup>④</sup>清朝中央政府对于学田的这些规定和管理当然是以当时学田租交纳货币的一般情况为依据的。

清代各地学田租的折银，对于其他的官田和半官田的田租交纳，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从地方志的资料看，这一时期各府县的育婴堂、救生会、抚孤院，以及各种与官府有联系的公共设施，这些设施的土地租佃，其田租用钱银折纳的

情况也比较多，如长江下游三角洲的苏、松、常、镇诸府，各地方志中也多有这些田产把地租征收实物改为收纳货币的记载。

清代官田和半官田性质的学田，育婴堂田及其他公共事业的田产，其部分收纳货币租，除了受到明中叶以来赋役货币化的趋势影响之外，这些田产的用途，也决定了他们收纳货币比收纳实物更为方便的特点，如学田的主要用途，是完纳钱粮，支付掌教膳修，聘金节仪，学宫的春秋祭祀，以及供生童膏火和县学、书院的日常维修等费用，若有剩余，则作为生息银两交付运转，扩充经费。即使是收取实物税的，往往也要把实物拿到市场上出售。换成货币，所谓“每年以租易银解赴学院，分给贫士并庠生膏火”。<sup>④</sup>育婴堂、救生会等公共设施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些设施除了需要一定数量的实物租谷之外，同样也需要相当数量的货币来维持日常的事务开支，因此，与其每年收纳实物租要经过斗收仓保管上市出售以及仓储鼠耗等一系列的麻烦，还不如将地租部分折收货币，既保险又适用。这无疑是学田等官田和半官田的地租收纳货币比一般民间私田收纳货币比例更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推而广之，清代东南各地家族共有田的租佃关系，其货币地租所占的比重，也要比一般地主私田高得多，这里试举福建福州侯官林氏家族和闽西长汀（连城）邹氏家族的部分族田租为证。（见表2、表3）

清代东南地区家族共有田的地租形态各地差别很大，货币地租在其中所占的比重亦很不同，侯官林氏家族的祭田共187亩，收取银租达42两余，谷租仅80余石，银租所占的比重近达50%；而长汀邹氏家族共收取钱租九万余文，谷租百余石，钱租约占40%。事实上，有许多家族的共有田，一直到民国时期都始终是收取实物租的。但从整体而言，家族共有田收纳货币租的现象，显然要比一般地主的私田更为普遍。徐天胎在《福建租佃制度》中说：“各地之民族共有田（即所谓祠堂产），亦多以现金缴纳。”这是民国、清代时期福建乃至东南地区的一般情况。可以说货币地租大部分集中在宗族和地方的共有田上，是清代东南地区农村货币地租的一个重要特点。

### 三

清代东南地区货币地租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山地、园地、旱地、沙地、洲地、杂粮地等土

质比较差的土地，其货币折租率反而比一般的良田为高。清代福建福州塔山康氏家族的祭田，一般的水田大多收取实物租，唯有祭园数十亩，全部收纳钱租。<sup>⑤</sup>武平李氏家族于乾隆五十三年清理族田，水田共纳租谷四百余石（石），而园地也是以铜钱交纳地租的，如“馆前湾园地，乾隆五十三年再批定租，左右园地批与李庭兰，每年额纳铜钱共二千五百文。……东园谢屋井下塘边空地一块，承租人谢兴德，近纳租钱七十文。……”<sup>⑥</sup>闽北光泽杭北黄氏家族，共有祠田租谷216石余，其余八处山地则征收租钱30余千文。<sup>⑦</sup>台湾的情景也是如此，乾隆四十八年，佃农林恋“向林舍租了园地二分，栽种芝麻，讲定租价番银六分，先交一圆，余下的俟芝麻成熟，卖钱交清。”<sup>⑧</sup>安徽阜阳，佃农张八于乾隆四十六年租种“陈六一亩多园地，说明每年课钱一千二百文，两次交付。”<sup>⑨</sup>江西崇义县，何乾州垦植刘佐廷山场一处，“许给刘佐廷租钱二百八十文。”<sup>⑩</sup>江苏海门厅，蔡天章租种倪桂林荡地“四千余步，每年租钱二百八十文。”<sup>⑪</sup>通州李大有，佃种僧忝彻沙田七百步，“每年还租钱二千文。”<sup>⑫</sup>

章有义先生曾经对清代徽州地区的农村租佃关系做了一些很细致的个案分析，从这些个案分析中，他得出的结论是：“在我们所见到的大量明清时代徽州地区租簿中，……当时货币租多半仅见于菜园、杂粮地或山场。”<sup>⑬</sup>

清代东南地区的货币地租之所以比较多地出现在山地、园地、旱地、沙洲荡地，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山地租佃一般不是为了生产粮食，或是为了建造先茔风水，或是为了开畲种植林木茶果，特别是种植林木茶果，与市场的联系较为密切。对于货币地租的发展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笔者曾在福建省龙溪县二十五都发见一本《陈氏追远堂合约集》，其中粮田的租佃约中，均交纳实物租，而从明代万历年间至清代后期的一系列租山契约中，都是以货币交纳山租的，并且这种山地租佃的货币地租形态已经比较成熟，不是实物租的简单折纳，试举康熙二年的一纸租山契约为例：

承佃人感化里竹口陈进衷，今在陈仁丰众边佃出租山一所，坐址……为界，是衷前来佃出砍伐做香菰插菁栽等事，递年约纳山租系银二两正，约冬至之日一足备送至公用。其山内有墓荫木不敢砍伐，其墓外山场许衷栽种。其山税逐年纳完不敢拖欠，如拖

欠许众坐取。今欲有凭立承佃为照。

其山如不栽种栽砍不得取税，再照，其  
顶天平照。康熙二年十一月 日 承佃

陈进衷

中见人

陈秉素④

可见这里的山场租佃交纳货币地租，正是因为承佃人为了砍伐做香梳插膏等，而不是为了栽种粮食。同样地，一部分园地、旱地栽种经济作物，其地租也就自然用货币交纳了。如上举的台湾凤山县林恋租种林舍的园地，是为了栽种芝麻，租钱也是约定俟芝麻成熟出售后交清。再如福建南靖县邱双佃种戴状的园地，种蔗出售，“年纳租银二两四钱。”⑤显然，清代东南地区山场、园地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与扩展，与这些土地租佃中交纳货币租的发展，有着互为因果的密切关系。

其二，山地、旱地、沙地等交纳货币地租的另一个原因，是往往这些土地过于荒瘠零碎，每年的生产所获不稳定，田主管理也不便，难以计租，不如折钱省事。如惠安县张坂的骆氏家族，其族田中亦有一部分园地交纳银租，“一地一所，在东园祖墓左右，地段不等，于顺治八年抽租八十斤，今各年纳银七钱六分。……一地坐祖墓边长厢厝等边，地段不等，难以计租，每年纳租银七钱。”三明的正顺王庙田，“一佃耕东西边等田，一十四亩八分二厘，租谷六千斤，鸾远难运，以每百斤折纳钱六百四十文。”⑥徽州的一些园、旱地也是如此，如黟县佚名地主的21宗田地，有3宗是钱租，都是园地，坐落在深山之中，其中1宗仅收实物白熟米30升，另折交钱24文，另1宗仅收纳钱租60文，可知这些园地是十分零碎的。另有1宗山地，每年粟租折钱100文，是野兽经常出没的地方，“粟因兽伤人未种”，一度抛荒。⑦在这种场合下的山地、旱地收取货币租，是十分消极的，地租形态的改变与生产的关系毫不相干。

清代东南地区的货币地租，除了出现在官田、地方共有田、乡族共有田和山地、园旱地、沙荡地之外，一般民间良田的租佃就很少实行货币租了，特别是生产粮食的稻田，其交纳货币租的情况相当少见。福建省历史学会从解放以来搜集了不少清代福建地区的土地契约，笔者曾经对其中土地租佃文书作了一些粗略的统计，在700多件民田租佃文书中，交纳实物租的契约达584件，占82.6%；以货币交纳地租的有107件，仅占15%；另外还有劳役租占2.3%。而这107件货币纳租中，有90件是属于山地租佃，交纳货币租

而又是生产粮食的仅有17张，约占0.24%，并且其中有8张是贫瘠旱地、园地的租佃契。如果扣除这八张旱、园地的例子，则清代福建地区一般水稻田交纳货币租的情况就更加稀少了。徽州的情况也是如此，章有义先生通过对徽州地主租簿的分析，多次指出：清代徽州农村“十之九是实物定额租，货币租不过十之一，稻田几乎没有一宗实行钱租的”，“除某些官公田外，一般稻田很少实行货币租”，“参考其他租簿，这种情况可以说颇有代表性”。⑧

近年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合编《乾隆刑科题本租佃关系史料》，其中有关货币租的刑科题本共有48件，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六省共有12件，这12件刑科题本中反映出来的货币地租特点，同样证实了上述的论题。（见表4）⑨

#### 四

了解了清代东南地区货币地租的基本事实与特点之后，那么，我们对于这一时期货币地租的地位和作用，应当有一个新的认识。

首先，学田等官田半官田性质的土地租佃中出现货币地租，是为封建政治服务的，也是封建赋税演变的一种表现形式，显然，这种货币地租与所谓经济发展和促进生产关系甚微，它是不可能成为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前提的。至于官田和半官田之外，货币租收取率较高的就是地方共有田和家族共有田。通过前述分析可知，这种共有田的货币纳租，是为着维护乡族组织而存在的，也是由乡族组织的管理特点使然。我们不可否认清代东南地区农村货币地租的出现与当时社会生产、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联系，特别是在山地租佃和栽种经济作物的场合，货币纳租率比较高，形态也比较成熟。许多租种山地的佃农、种植竹木茶果等，与市场发生比较密切的联系，这对繁荣山地商品经济，无疑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已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相去不远。不用说象学田这样的官田租折纳货币在中国古已有之，即使是人们最为关注的栽种经济作物而又交纳货币租的现象，至少在六世纪已经出现。从目前看到的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中分析，六世纪末以降，麹氏高昌与西州、沙州地区的租佃关系，种植经济作物而又交纳货币地租的现象已经相当流行。近人杨际平先生指出：“麹氏高昌与唐



代西州的七十三件租佃契约中，货币地租占二十七件，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七。……出租种植经济作物的土地，绝大多数收取货币地租。……种植经济作物的田地多数收取货币地租，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这类田土的产品本身就是商品；种植粮食作物的租地则以收取实物地租居多，但也有收取货币地租的。这种情况可能受种植经济作物的租地多收取货币地租的影响，且与当地商品货币关系比较发达有关。”<sup>②</sup>韩国磐先生亦指出：“高昌时夏价（栽种经济作物的地租）交银钱者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还要多，交银钱与交粮的比数为三：四。”<sup>③</sup>这里所描述的货币纳租，其比重甚至比清代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东南地区的货币纳租率还要大，但是我们自然不能因此就得出六七世纪之际高昌、西州一带即将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结论。同样地，我们对于清代的货币地租，也不宜估价太高。傅衣凌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既早熟而又不成熟的社会，有其自己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国货币地租的实际情况显然与马克思所描述的中世纪末西欧的情景有所不同，相差甚远。

最后我们还应当看到，清代东南地区的货币地租是与许多落后的经济因素纠缠在一起的。在交纳货币地租的地方，不仅有占绝大多数的实物租存在，同时亦往往与最原始的劳役租并存共处。如福建、徽州、广东各地的墓佃，是一种为田主守墓执役的佃户，但他们交纳的地租，往往是货币折纳。有的在交纳货币租的同时，还要交

纳冬牲等附租，如三明正顺庙田租，“一段……逐年冬收租纹银二两四钱正，冬牲四只外，冬旦一筵。”<sup>④</sup>尤溪开山书院田租，“土名水梗隔旱田载租三百斤，折纳租钱一千三百二十文，冬牲钱五十文。”<sup>⑤</sup>在租种经济作物的田地里，虽然有以货币纳租的，但货币租的交纳有不少是沿袭实物分成制的，如福建永安的租山契，“其山租去开别，栽种杉松茶桐生理……俟培养长大之日，以作主佃平分，主得五分，佃得五分，卖价银亦照主佃均分。”<sup>⑥</sup>江西崇义县的租山栽杉，“照乡例二八抽分之数，许给刘佐廷（山主）租钱二百八十文。”<sup>⑦</sup>各种地租形态交织在一起，不能不妨碍了清代货币地租的健康发展。

清代东南地区货币地租大多与劳役租、附租和分成制等搅合在一起，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清代佃农经济地位的低下，采取不同地租形态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地主，特别是乡族地主的手里，当哪种地租形态对地主有利时，地主就实行那种地租形态。因此，虽然清代东南地区农村的货币地租时而可见，但是主佃双方的经济关系是很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的经济关系，使货币地租不能有效地刺激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再加上清代货币地租在地租总体中所占的比重很小，货币地租又大多为落后的乡族制度服务。笔者认为：清代货币地租的发展水平，远不足以承担起作为新的生产方式萌芽的历史前提的重任，对于清代货币地租的过高估价，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① 《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三卷，第932页。

②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第七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③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卷十二，田赋考。

④ 同治《万年县志》卷四，学校。

⑤ 福州塔山《康氏族谱》祭产。

⑥ 武平城北《李氏家谱》卷末，产业类。

⑦ 光泽杭北《黄氏族谱》卷九。

⑧⑨⑩ 刑科题本，转引自周远廉、谢肇华《清代租佃制研究》第230页。

⑪ 刑科题本，转引自《清史论丛》第五辑，第34页。

⑫⑬ 《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上册，第320页、326页。

⑭⑮⑯ 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第59页，第254页。

⑰ 影印件藏厦门大学历史所。

⑱⑲ 《历西正顺庙志》卷三。

⑳ 前12例引自《清代地租剥削形态》，后2例根据《清代前期的实物分租制》增补，该文献载《清史论丛》第五辑，中华书局1984年。

㉑㉒ 韩国磐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第211页、250页。

- ⑳ 乾隆《尤溪县志》卷四，田赋。  
 ㉑ 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第34页。  
 ㉒ 《清史论丛》第五辑，第34页。

表 1:

| 时 间    | 地 区 | 田地所属 | 亩租或总租       | 土地种  | 资 料 出 处           |
|--------|-----|------|-------------|------|-------------------|
| 清 初    | 兴安  | 县 学  | 1.14两       | 2.5亩 | 同治《兴安县志》卷七《学制》。   |
| 清 初    | 半城  | 县 学  | 21000文      | 114亩 | 道光《丰城县志》卷五《学校》。   |
| 雍正八年   | 昭萍  | 县 学  | 23挂(吊)      |      | 民国《昭萍县志》卷六，《学校》。  |
| 雍正一同治  | 萍乡  | 县 学  | 45挂(吊?)     |      | 同治《萍乡县志》卷四，《学校》。  |
| 乾隆间    | 万载  | 县 学  | 9200文       |      | 民国《万载县志》卷六，《学校》。  |
| 乾隆间    | 清江  | 县 学  | 34.25两      | 93亩  | 同治《清江县志》卷三，《学校》。  |
| 乾隆二十四年 | 定南  | 义 学  | 21788文      | 54亩  | 道光《定南厅志》卷五，《学校》。  |
| 乾隆五十六年 | 万年  | 县 学  | 12000文      | 18亩  | 同治《万年县志》卷四。       |
| 乾嘉间    | 德化  | 濂溪书院 | 1038593文    |      | 同治《德化县志》卷二二，《学校》。 |
| 道 光    | 宜黄  | 县 学  | 每石以<br>二钱折银 |      | 道光《宜黄县志》卷七，《学校》。  |

表 2: 乾隆间侯官《林氏家乘》中的祭田租:

| 地 名    | 亩 数  | 租 银    | 租 谷         | 备 注            |
|--------|------|--------|-------------|----------------|
| 过洋阵坂   | 16亩  | 6.4两   |             |                |
| 阵坂塘下   | 30亩  | 3.7两   | 1630觔       | 以上二项为高祖、曾祖的墓田。 |
| 阵坂塘下   | 116亩 | 32.04两 | 2230觔       |                |
| 白沙菜字二区 | 25亩  |        | 52.6石       | 以上二项为闾族蒸尝田。    |
| 合 计    | 187亩 | 42.14两 | 3860觔又52.6石 |                |

表 3：清代后期长汀（连城）《邹氏族谱》中的蒸尝田租：

| 蒸 尝 田      | 钱 租    | 谷 租    | 其 他   |
|------------|--------|--------|-------|
| 希孟公蒸尝田     | 22150文 |        |       |
| 妣人蒸尝田      | 11025文 | 4石     |       |
| 士俊公蒸尝田     | 14000文 | 21.3石  |       |
| 士衡公蒸尝田     | 26800文 | 25.6石  | 有冬牲等。 |
| 妣人蒸尝田      | 7700文  | 19.4石  | 有冬牲。  |
| 大亨公蒸尝田     |        | 20.7石  | 有冬牲。  |
| 永受公蒸尝田     |        | 3.3石   |       |
| 必功公捐三世祖蒸尝田 | 13000文 |        |       |
| 崇公祀田       |        | 42石    |       |
| 神公庵田       | 3350文  |        |       |
| 合 计        | 98925文 | 141.3石 |       |

表 4：

| 地 区  | 土地类别  | 用 途  | 年租 额     |
|------|-------|------|----------|
| 浙江东阳 | 公地（园） | 种 麦  | ？        |
| 广东东莞 | 尝 田   | 稻 禾  | 80两（银）   |
| 福建永福 | 山 场   | 栽种桐茶 | 1440文（钱） |
| 福建南靖 | 园 地   | 种 蔗  | 2.4两     |
| 福建安溪 | 公 山   | 栽种茶杉 | 0.8两     |
| 江苏宜兴 | 田     | ？    | 2.4两     |
| 广东番禺 | 族会田   | 稻 禾  | ？        |
| 江苏海门 | 荡 地   | 樵 采  | 280文     |
| 安徽阜阳 | 园 地   | ？    | 1200文    |
| 福建凤山 | 园 地   | 栽种芝麻 | 6元（番银）   |
| 江苏通州 | 沙 田   | ？    | 2000文    |
| 江西安远 | 田（园）  | 栽种番薯 | 700文     |
| 江西崇义 | 山 场   | 栽种杉木 | 280文     |
| 广东惠州 | 尝 田   | 稻 谷  | 照时价折钱交纳  |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历史所 责任编辑：凌峰

继今年第一期刊发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首次学术讨论会的一组论文后，我们现在再次从讨论会的论文中选取一组文章，以摘萃的形式发表，目的在于引起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并展开热烈的讨论。我们期望“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这一个新的专栏，以其富有建设性的、新的研究视角，而获得广大读者的赞赏与支持。

——编者

## 大一统思想与中华民族的凝聚

关履权

大一统思想是我国传统的民族文化，为儒家所倡导。明确提出“大一统”这个概念是儒家的《春秋公羊传》。《公羊传》“隐公元年”记载：“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羊传》在这里以周文王为一统的象征，也就是荀子说的“文王载百里地，而天下一”的进一步阐发。

西汉董仲舒把“大一统”的学说提到哲理上作解释。“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把“大一统”理解为“天人合一”。《汉书·董仲舒传》师古注：“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万物归于一统，也就是大一统。司马迁也充分肯定大一统的重要意义。他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指出，秦的统一改变了战国时期“兵革不休，士民罢敝”的现象，从此“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

两宋处于“积贫积弱”的局势。辽、夏、金几个少数民族政权与宋先后对峙，未能出现汉唐时的大一统。这时候，儒家特别重视《春秋》学，如北宋的刘原父，著有《春秋权衡》、《春秋传》、《春秋意林》、《春秋说例》等书。刘原父对《春秋公羊传》的义理作了解释，认为夷狄与中国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尊重礼仪。他在《春秋权衡》卷十三中说：“夷狄之所以为夷狄者，正以狡诈无义尔。中国所以为中国者，亦正以礼义尊尊尔。”这实际是《公羊传》进退中国夷狄之义，中国有恶则退为夷狄，夷狄有善则进为中国；中国与夷狄可以互相变换、进退，互易进退的标准是“礼乐文明”。提高礼乐文明是促进大一统的关键。以礼乐文明统一天下，这是一种文化统一的观点，比孔孟的夷夏说进了一步。

由于两宋时期国力衰弱，未能达到全国的大统一，宋代的学者除了强调春秋大义之外，还提倡政治的革新，例如范仲淹、王安石等的改革，特别是王安石的改革，目的在

于富国强兵，也是为了要摆脱“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上皇帝万言书”，《王文公文集》卷一）的困境。以政治革新来达到大统一，这是大一统思想在宋代的发展。

清代，中国进入了“天崩地解”的封建社会晚期，社会矛盾更加深重尖锐。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社会制度变革的重要，例如清中期的龚自珍和魏源的变革思想就很著名；至于清末康有为托孔子改制，以“大同世界”为变法维新的理解，更是清代儒家大一统思想的一种变化。

通过以上材料，证明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并不是停滞不变的，是随着时代的步伐而示出不同的变异。

## 二

大一统思想随着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而不断发展，对中华民族的形成、融合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中华民族的内聚力、凝聚力。说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内聚力，是因为：第一，大一统思想不是狭隘的民族观念，不含有排他性。华夏与夷狄的区分标准是“华夏文明”，这是文化的分野，不是人种、民族的界限。文明的开发有先有后，互相影响、渗透。我国少数民族曾经“汉化”，受汉族文化的影响，提高了文明水平。汉化和“夷化”往往是双向交叉进行的，汉族也吸取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经过长时期的接触交流、融合，夷夏观念逐渐淡薄了，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因此，我国传统的文化，实际是中华民族长期共同创造的财富，是多民族多种文化成份的综合体。文化可以变化发展。大一统以华夏文明为准则，不狭隘、不排斥、兼容并包，是中华民族团结发展的精神力量。

第二，儒家提倡的大一统是文化的一统，而不是武力的征服。文化的一统，是和谐的、宽容的，不是暴力的压迫。我国历史上，民族矛盾尖锐时，曾经发生过民族之间的战争。即使是民族之间的武力冲突，经过武装战争之后，长期起作用的始终是文化的力量，例如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满族建立的清朝，这些王朝由始至终都受到汉族高度发展的封建文明的影响。文明程度较高的一方战胜或取代较低的一方，这是文明发展史的规律。传统的大一统思想的实质是文化的统一和融合。强大的军事、理想的政治或发达的经济都要依靠高度发展的文化作支持。从秦汉开始形成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经过长时期的文化融合，以文化统一为关键，直到清初，我国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才得到巩固和发展。

第三，儒家鼓吹的大一统同施仁政以及政治的革新相联系。对这个问题，孟子反复讲过多次，认为施仁政，不嗜杀人者才能统一天下。他说人民渴望仁政，“若大旱之望雨”显“（《孟子·滕文公下》）“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孟子·离娄上》）又说：“今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沛然谁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还说：“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儒家反对统一于虐政，他们所提倡的统一是以天下之乐为乐、天下之忧为忧，实



施仁政的统一，这样的统一才是人民所渴望的。

第四，大同世界是大一统思想的理想。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运》描绘的是一个“天下为公”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大同世界，没有阶级区分，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的，团结友爱。大同理想是我国古代思想的优良传统，是几千年来，许多思想家、政治家以及被压迫者所追求的远景和愿望。近代的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和孙中山无不受其深刻的影响。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大一统的最高理想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其影响是深远的，是中华民族的奋斗目标，团结、凝聚的中心。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

## “兼爱互利”思想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李锦全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怎样处理好人际关系，从而促进社会上的安定团结，构成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我认为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兼爱互利思想。

“兼爱”是先秦墨家思想的核心。墨子是生活在动乱的战国时代，他认为乱之所自起，是由于不相爱，所以才出现强劫弱、众暴寡、富侮贫、贵敖贱等一系列问题。他提出补救的办法是“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他说：

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贱。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墨子·兼爱中》）

墨子认为“仁人之事”，要“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要兴利除害，实行“兼相爱，交相利”则是最好的办法，所以为“仁者”所赞誉。对墨家讲的兼爱，儒家孟子曾提出强烈批评。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并斥之为“禽兽”（《滕文公下》）。对这种恶意攻击，如果不是出于误解，就只能说由于学派的偏见，其实孔子也讲“泛爱众”。在回答樊迟问“仁”时，就说“爱人”（《颜渊》）。孟子自己也说“仁者爱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离娄下》）。这里所讲的“众”与“人”均是全称，不会因此变

成无父的禽兽。儒家讲“爱有差等”，墨家提出“兼以易别”，两者似有分歧；但我认为推爱与兼爱只是程序上的不同，而作为人与人之间应该相爱，在思想实质上并无大的区别。

对传统文化中的兼爱思想如果用阶级观点加以衡量，可以认为是不现实的，甚至会被说成是统治阶层思想家们制造的幻想。但如承认中国历史上家国同构这个事实，并且从促进民族融合这个角度来看问题，那么应该承认兼爱思想是有助于增强家国内部和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如在一个家庭中，父子、兄弟、夫妇之间能做到互爱互利，那就会有助于彼此和睦相处，更不致于反目成仇。至于邻里、乡党之间，就像孟子说的，如做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滕文公上》）”。这当然会有助于社会秩序的安定和人民之间的团结，如能搞好各个基层，从整体上自然会对增强国力有利。

由于兼爱的内容包含有互助互利，并且这也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具有对等性的回应。所以墨子既讲“为贤之道”，要“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如能做到这样，“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尚贤下》）。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兼爱中》）。即无论爱利还是恶害他人，都会得到对等的回报。因而他主张采取主动，“即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兼爱下》）。按照这条思想理路，墨子赞扬“兼士”的言行，“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兼爱下》）。这就与《礼运》篇所称道的，“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精神相通，这也是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实质，如果人人都能这样做，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自是可以进入大同世界。

兼爱思想具体到处理国与国的关系时，墨子提出“非攻”的主张。他认为窃取人家的桃李，夺取人家的牛羊，剥取人家的衣裳，是属不义。而现在一些诸侯，却调动“坚甲利兵，以往攻伐无罪之国。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非攻下》）像这样的侵略战争，严重损害人民的生命财产，故招来墨子的反对。他不但发表言论，并且还见于行动。如楚国将出兵攻宋，他知道消息后就赶往楚国，亲自与公输般和楚王进行辩论，并与公输大演攻守战术。公输虽“九设攻城之机变”，而墨子“九距之”。最后公输之“攻械尽”，而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公输理屈智穷，墨子猜测他可能想杀死自己，以为宋国就无人守御。于是墨子就告诉楚王：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经带了我的守城器械，“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即使杀了我也无济于事，于是楚王只好说：“善哉，吾请无攻宋矣”。（同上）由于墨子的机智勇敢，终于制止了一场侵略战争。

墨子对国与国之间是主张和睦相处，反对损害人民生命财产的不义战争。但他之所以能止楚攻宋，并不是乞求对方，而是倚靠自身的力量，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墨家反对命定论，主张强力而为。（参考《非命下》）这与《周易》提倡“自强不息”的精神相表里。作为优秀的思想传统，这导致人们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怀。宋代范仲淹写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的名句，这种高尚的情操就隐含忧时爱国之心。明末东林党人，也写下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警联，顾炎武更明确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华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经历过不少坎坷，但即使在存亡继绝之秋，各阶层的人民群众在保家卫国的战斗中，所以能构成巨大的凝聚力，特别在近现代时期所发扬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要追溯其思想渊源，在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当可以给我们以启迪。

兼爱和互助互利思想，还有助于民族融合和人民内部之间的友好相处。如子夏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就是提倡民族融洽的形象描述。宋代张载在《西铭》中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命题，说“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凡天下疲癯残疾，茕独嫠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这就是所谓民胞物与思想，也就是先秦儒家仁民爱物思想的发挥。上文列举的《礼运》篇，就说到要“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并归属为大同世界的理想。张载在《西铭》中也是向往这种精神的。到今天“同胞”一词已被广泛使用，海内外的同胞兄弟，都是本着团结友爱的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努力。对传统文化中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思想源泉，应该作为珍贵遗产而需要我们去发掘和研究。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 提高民族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

孔庆榕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民族，这是中华民族有着较强的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原因。

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有如下几个相互联系的特点：

第一，民族的自识性强。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二千多年间，中华民族内部虽然有过纷争，汉族和非汉族的统治阶级分别掌握过政权，但是每一个民族始终把自己视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都把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作为自己的主体文化。文化上的认同是民族自识性一致的根基。生活在异国的华侨、华人，始终眷恋着养育自己的故乡故土，崇尚民族文化，把许多传统生活习俗完整地保存下来，这是别的国家、别的民族难

以比拟的。

第二，大一统的观念强。所谓大一统观念，实际上是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思想，即统一的思想。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历代统治者都极尽其力追求一统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唐太宗即位后，提出了“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这种大一统的思想不仅表现在政治上，而且突出地表现在文化上，《中庸》中说：“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反映了发展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和社会稳定、民族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三，家族观念根基很深。中华民族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逐步形成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即为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国是家的扩大，忠是孝的延伸。它对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是有一定作用的。

第四，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华各族人民，在长期实践中深深地认识到，各民族需要祖国，离不开祖国，祖国需要各族，离不开各族。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这个“体”就是整体，就是统一的祖国。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不仅表现为各族人民对祖国的山川风物爱恋，不仅表现为对祖先以辛勤的劳动创造的文化的热爱和自豪，而且还表现在对国家的利益和命运的强烈关注和对祖国美好未来执着追求和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尊严勇于献身的精神。

如何提高我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呢？

首先，要坚持改革开放，用当代世界的文明来丰富自己。任何一个民族，能够生存至今，都因为有自己的长处。然而每一个民族，又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局限性。因此，民族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民族的交流。可以断言，在当代，离开了世界文明，民族就得不到发展，民族意识就落伍。因为它不可能认识世界，也就不能够真正认识自己，不可能从人类文明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养分，也不可能去掉历史带来的民族意识上的局限性。这样的民族就很难有强大的凝聚力。

其次，要正确地对待传统民族文化。要采取历史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把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不能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如果完全否定它，最终只能是否定我们这个民族，也不能采取肯定一切的态度，把它顶礼膜拜，应采取科学的即“扬弃”的态度。

第三，大力弘扬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民族意识中的核心部分，是民族的精神支柱。毛泽东同志曾经作过这样的概括：“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我认为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一民族精神，过去支持着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度过各种艰难险阻，今天，将激励中华民族克服新的困难，实现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大业。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

#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条件

李权时 李明华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不是构成民族诸要素的简单叠加，也不是靠外部力量促成的区域和行政的结合，它发源于民族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内部，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以上诸因素有机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向心力、集聚力和粘合力，这种凝聚力使整个民族在历经种种历史变迁之后仍然保持着统一、保持着本民族的独特风格以及顽强的生命力。

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产生如此强大的凝聚力呢？我们认为，应该沿着历史的线索，从自然地理环境、社会血缘关系、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文化心理背景诸方面探索其根源。

首先，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在一种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中产生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是人类社会活动的物质基础。列宁指出：“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的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8卷，第459页）中华民族凝聚力滥觞于遥远的氏族社会末期，在那个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地理环境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人们的精神状况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中国地处亚洲大陆东部，西北面横亘着浩瀚的戈壁沙漠以及一望无涯的干旱草原，西南面矗立着地球上最险峻的青藏高原，而东面是一汪沧海。这种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使中华各民族比较固定地生息于一片土地上，同时也为中华文化的形成造就了相对独立的地域条件。同时，中国初民们主要生活在黄河、长江沿岸，这里气候适宜，土地肥沃，自然资源丰富，为农耕定居提供了有利条件，因而生活比较稳定，民族的繁衍就取得了相对的持续性优势。这种自然环境，易于产生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而爱国主义是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支柱。可以看到，中国的封闭的大河大陆型地理环境，是中华民族凝聚力产生的有利自然背景。

第二，血缘纽带和伦理中心原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产生的重要条件。血缘纽带和宗法制度的长期延续，使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成为家族式的政治政体，社会意识形态和伦理原则主张“亲亲为大”、“仁义”、“孝悌”、“兼爱”。诚然，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搞家长制，规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是为了集权和更好地控制国家，但是也应看到，统治者之所以能够这样规范，却是由中国血亲宗法制度的特点所决定的。而且从客观后果来看，以血缘纽带维系统治，有助于形成一种内聚力，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中华民族的分裂。



中国血亲宗法制度的社会基础，由下而上是经家庭、家族、宗族这个系列构成的血缘体系，因而它要求自上而下地推行注重血缘、服膺长者、膜拜祖先、恪守传统的伦理原则。这样，家庭的原则成为整个国家关系原则的出发点，君臣犹父子，君在国犹如父在家，“君临一切”。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既没有宗教的狂热，也没有法治的支撑，由于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上的伦理观念的强大力量，形成了具有社会意义的民族忠诚感、民族责任感和民族义务感，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社会的和谐。并培育出一大批为本民族利益而效忠的封建时代的民族英雄。

第三，中国古代的生产方式及由此决定的社会结构，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基石。恩格斯指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60页）在中国古代社会，“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国土属君王所有，由生产力状况决定的这种土地所有制关系，又决定了金字塔式的等级制社会结构。这与欧洲的土地所有制情况很不相同。在欧洲封建社会中，教会和世俗封建主把农民的“自由地”据为己有，以后又发展成为终身占有的“采邑”，直至变成世袭领地。欧洲的不断分裂，与这种土地分割制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中国的封建君主虽然也常常将土地分封给诸侯，但土地的所有权却是属于封建国家的。这对于维护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和形成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中华诸民族中，主要的是依赖土地而生存的农耕民族。农耕经济是一种和平自守的经济，耕作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世世代代、周而复始地从事简单再生产，自产自销，自给自足。这种田园经济需要政治稳定平安以及人民团结和谐、刻苦耐劳。“无怠无荒，四夷来王”（《书·大禹谟》），“协和万邦”（《书·尧典》），正是中国古代国政清明、农业繁盛之理想的写照。

第四，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直接培育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国文化传统中对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强调整体的、社会的人格，而不强调个体的、个人的人格。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中国文化传统习惯于从关系中去体认一切，把人看成群体的分子，不是个体，而是角色，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互动个体，每个人都是他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人在生活中应该依赖群体（依赖宗族、依赖社会），只有群体和社会才具有至高无上的力量。《荀子·王制》说：“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这表明了中国先民对“群”（组织、协作、整体）的重要性的认识。

由于中国文化传统把群体、社会以及民族的利益作为高于一切的东西，这种传统因而培育出中华民族的十分突出的特性，其中最主要的是民族责任感、民族气节、忧患意识以及为理想而献身的牺牲精神。作为中国文化主干的儒家思想，则为人们提供了达到这种境界的行为准则。

作者单位：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文化根源

阮纪正

## 一、中华民族凝聚力是种文化凝聚力

中华民族的这种凝聚力，并不是简单的经济利益聚合，更不是表层的意识形态信念力，甚至也不是单纯的种族血缘认同力。它的核心，当是长期历史积淀下来的对本民族文化的价值认同。

我们知道，世间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无法摆脱经济利益的驱动。但这民族的凝聚力并不就是简单的经济利益聚合。当今世界上，不同的经济制度和不同的经济地位所造成的人们那种阶级的分野和冲突，已经深深地渗入了每一个民族的内部。虽然，当代华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但这一切，在当前并未能真正消除经济关系上不同阶级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因此，这简单的经济聚合并不能构成我们民族凝聚力的核心。

我们也知道，任何凝聚力的形成不能离开共同的目标和信念。但这民族的凝聚力并不是表层的意识形态信念力。当今世界上不同的华人社会，基于阶级的分野和利益的冲突，其政治信念和意识形态是很不一样的。因此，这表层意识形态信念也不能构成我们民族凝聚力的核心。

我们还知道，人的存在是个生物学事实，而其本质则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它决定了人永远不可能摆脱人种血缘关系，并在这基础上发展出一系列纷纭复杂的社会关系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特别地指出：东方“人同自然界的直接地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地就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中国文化长期未能在观念上割断种族血缘关系；因而中国人所称的“人伦”，只是从父子血缘的生物学事实“推己及人”地推广出来的“天伦”。中国人以血缘家庭作为构成自己社会的细胞，在“国家天下观”中讲究“华夷之辨”。但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却不是这种狭隘的种族意识。所谓“华夷之别”的区分标准，只是文化的分途而不是种族的分野。所以，中国这种以礼义为标志的文化传统并不受政权更替的影响，也未因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政权而中断。只要礼乐不堕，何族之君入承大统无关紧要。这说明了它是一种超越于种族血统关系之上的稳定的文化传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同化力。

## 二、中国文化传统具有很强凝聚力的基因

首先，中国文化那万物一体、天人合一、恋土归根、天下大同的价值指向，为我们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提供了客观可能。中国文化的源于“对生命的感受”（这就明显地区别于西方文化的那种基于“对自然的惊愕”）。人在自然中的观物态度，使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人对他周围的客观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在这里，依存关系是双向而不是单向的。因此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方面人固然要依赖和顺应他周围的环境；但另一方面又相信天不大、人不小，天地万物之中人为贵，这种价值参照系统，使人可以在大千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产生很强的归属感、认同感、满足感和自豪感。

其次，中国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崇实尚礼、厚生利用的立世精神，则为我们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提供了基本动力。这种立世精神，是直接从上基本价值取向来的。中国古代哲人认为，人生在天地之间，是天地的精华，应该“与天地合其德”，体现天地的德性和特点。“天”的德性是健运不已，日月星辰有规律的运行，从不歇止；人也应该仿效它，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地”的德性是顺育万物，天地以博大的胸怀包孕万物，以丰富的养料哺育万物；人也应该仿效它，兼容并包，“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就是永远努力向上，绝不暴自弃，这表明了我们民族顽强奋斗，不向任何恶劣环境屈服的强大生命力。“厚德载物”则表现我们民族那深厚的德性，能够包容万物，是一种不排异己的兼容并蓄精神。这些都内在地包含着人“自由、自主活动”的本质。其特征则是在平凡的生活的生命律动中，成就自己强大的凝聚力。

最后，中国文化中取象比类、反求诸己、直观体悟、知行合一的致思途径，一物两体、对待互根、阴阳相济、生生不已的思维方式，同合真善、情景交融、宁静致远、中和空妙的审美情趣，则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民族凝聚力形成提供条件。任何文化都有其时空特性，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两个方面。就时代性而言，文化确有自身进化系列上的先进和落后之别；但就民族性而言，作为一个民族存在方式的民族文化是无所谓什么优劣的。中国人的致思途径，是内向意象型的。它那自我调控、双向建构、模糊灵活、讲求实践的方式，就当代认识论来说，也有很大的合理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互补相济型的。它强调事物不可分割的联系，提倡“求同存异”式的共存共荣，在谦恭退让中求得自身的发展。至于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则是中庸和谐型的。它强调主客体的互助融合，讲究真善美三者的内在统一，突出协调和谐的适度原则。从现代观点来看，这几方面的原则也完全是站得住脚的。中国文化认知和操作系统中的这些东西，从不同的方面去破除人们思想上的各种偏执，确实有利于社会群体的形成和团聚，在“后工业社会”背景中显示出极大的魅力。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本专栏责任编辑：凌峰

## 论《文心雕龙》的逻辑体系

劳承万

任何人文科学的研究，按照恩格斯的观点，都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历史研究方式，一是逻辑研究方式。所谓历史方式，则是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过程进行研究的方式，“这种形式看来有好处，就是比较明确，因为这正是跟随着现实的发展，但是实际上这种形式至多只是比较通俗而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这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研究的一种原始形态、基础形态，尚不是概念——范畴形态，即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形态。它虽有上面所说的“通俗”的优点，但也有明显的缺陷：“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同上书）。因此，要获得科学形态，就必须进展到逻辑的研究方式。所谓逻辑的研究方式，“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同上书）

综观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心雕龙》研究，也无非是以上所述的两种研究方式，但却可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

1. 弄通原文原意。通过考证、注释、串解等手段，弄清字、词、句、篇的内涵和条贯性。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历史研究方式。

2. 体系性研究。全面透视《文心雕龙》各篇间的内部联系，以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如“文

之枢纽”（1—5），“论文叙笔”（6—25），“剖情析采”（创作论与批评论，26—49）等等。这是由历史研究方式到逻辑研究方式的过渡，但仍偏重于历史方面，为逻辑研究方式打下基础。

3. 以现代美学——文艺学范畴为参照系，对《文心雕龙》体系加以逻辑提炼，揭示其思维模式和理论框架。这是一种逻辑研究方式。

从目前的研究情况看，第一层次的研究以范文澜注释本为标志，取得了很大成绩；第二层次以陆侃如、牟世金译注本、周振甫、郭晋稀译注本为标志，也有不少收获；第三层次王元化作了勇敢的先导。以上只就侧重点而言，其实不管哪一位有成就的研究者，都没有（也无法）离开第一层次的工作，问题的关键只是最后的导向。

当务之急，我以为是在前人成绩基础上，也即历史研究方式基础上，加强第三层次的研究，做到以“成熟形态”反照原始形态，从新的视角对第一、二层次尚未弄清的问题（或已弄清的问题），进行新的阐释。

千百年来，人们对《梁书·刘勰传》都十分重视，它告诉人们关于刘勰的理论修养：“长于佛理”，“深得文理”。中国的魏晋时代，不但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而且也是哲学的自觉时代，一代思辨哲学（玄学）干脆利落地抛开了先秦两汉哲学囿于具体形态的沉重纠缠，高昂玄思的威力，契入了广阔的玄理世界。这种玄理“契入”也必然使《文心雕龙》体系具有特殊的理论风格。今天许多研究者，把自己的视点凝聚在这两个“理”（佛理与文理）上，虽欠全面，但也不无卓见。因为任何一个科学体系，都不能离开“理”，“理”是体系意识的本质特征，是范畴体系的演绎基础。因而

章学诚曰：《文心》“体大而虑周”。章氏一言，万人转引，真可视之为“绝对真理”了。但不管怎样，章氏确是准确地揭示了《文心雕龙》是一个庞大的逻辑体系。

在现代研究者中，范文澜更是一语中的：“彦和精湛佛理，《文心》之作，科条分明，往古所无”。范氏评论，把《梁书·刘勰传》中的“佛理”与“文理”沟通起来了。朱光潜在抗日战争期间写的《谈文学》一书中也说：“我颇怀疑刘彦和如果不精通佛理，能否写出那样颇有科学系统组织的《文心雕龙》”（《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第331）。现代《文心雕龙》研究者，不管他们对《文心雕龙》的世界观——创作观持何等相左的观点，但从否认《文心雕龙》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并有“虑周”的结构系统和范畴概念。

《文心雕龙》作为一个庞大体系，自身有巨大的矛盾。这表现为：一方面是体系严密性、纲目分明的推演性，使我们在总体上获得比较分明的体系意识，具有“骨骼”感；另一方面，直观——对偶的表达方式（这是一种传统的表达方式），又在具体论述上，使我们感到模糊，缺乏“血肉”感。对偶的常态二极性与非常态的多极性，常常混淆在一起（中国文字中单字词的同义词很多，对偶性可在常态——非常态的语义关联域中作灵活的往返运动。由此出发，笔者以为：对《文心雕龙》体系对偶句式作规律性的研究，探索对偶语义二极运动方式及其分布规律，这对揭示《文心雕龙》体系有很大作用，也是一种哲学——美学式的语义“训诂”。过去的研究，对《文心雕龙》中的这种矛盾性，没有充分注意，也没有充分地揭示出来，因此，往往把两者夹杂在一起研究，以致把许多东西混淆了，陷于无边际的考证、训诂中，以及一定程度的猜测中。

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指出：“中国传统哲学思考及其所含范畴并无逻辑的指引，也未受逻辑的批判，而仅为辩证思想的发挥了”（《中国哲学范畴集》人民出版社第67页）。此话有点片面，范畴本身即是一种元逻辑的蕴含，不过它不是一种已成的运演系统，一种逻辑构架。然而此话也有相当的真理。以这话去审视《文心雕龙》，我以为是有启示的。在《文心雕龙》中，理论范畴被强行移入对偶性的限定领域中，因此，就不可避免地会牺牲“逻辑”，造成矛盾，但也不能无视其“辩证思想的发挥”。就《文心雕龙》来说，其“辩

证思想的发挥”是异常明确的，既有纲目——范畴概念，也有“物—情—文”的中国文论的传统范畴及逻辑框架。因此，对成中英所说的两个方面同时注意到了，才不致于片面（成中英所指的是中国哲学，但引申到美学——文艺学中来，也是一致的）。

王元化先生对突破方法论有深刻的自觉意识，他提倡对《文心雕龙》的研究，要有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更提倡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亦即人体解剖对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方法。综观王氏研究《文心雕龙》的知识结构，大约由三大系统构成：一、中国古文化系统；二、十九世纪俄罗斯患难意识的现实主义批判系统；三、西方哲学的逻辑系统、以及以黑格尔美学为象征的审美系统。这是一个“古今——中外——文史哲”相结合的多维系统，它能沟通《文心雕龙》研究中的三大层次。因此，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则显示了他的灵验的知识结构的优越性，使这部理论著作成为《文心雕龙》研究中至今尚未被超越的巅峰。

王氏《文心雕龙创作论》的篇幅、条款并不多，就审美范畴而言，只不过是八个（对）审美范畴而已。请看下表：

| 提炼审美范畴                                    | 篇名     | 简称    |
|---|--------|-------|
| ①审美主体——审美客<br>体关系                         | （《物色》） | 心物交融说 |
| ②思想——感情关系                                 | （《情采》） | 情志说   |
| ③表象——概念关系                                 | （《比兴》） | 拟容取心说 |
| ④艺术材料——艺术<br>想象关系                         | （《神思》） | 杼轴献功说 |
| ⑤艺术整体——艺术<br>部分关系                         | （《附会》） | 杂而不越说 |
| ⑥自觉（理性）——非<br>自觉（非理性）关系                   | （《养气》） | 率志委和说 |
| ⑦创作过程三步骤<br>（设情——酌事<br>——撮辞）（思<br>——意——言） | （《熔裁》） | 三串说   |
| ⑧风格——个性关系                                 | （《体性》） | 才性说   |

王氏所提炼的以上8组审美范畴，是建筑在他对《文心雕龙》的全面、深入的研究基础上，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他的范畴提炼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步骤：一、鉴别、选择、提取那些对美



学——文艺学有普遍意义的范畴；二、与西方审美理论对照，沟通东西方文化联系；三、以最高阶段的成熟形态反思于低级阶段的萌芽形态、未成熟形态，促使《文心雕龙》系统加入普遍性的审美学——文艺学的大科学系统中，从而具有世界性。

王元化的突破性尝试，其深刻意义，是在沉闷的古典文学理论研究中，向人们启示了宏观——多维度的研究路向。由于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束缚，研究者在中华文化圈内作以古证古式的角逐，已经把人们窒息得差不多了，所以每当方法论涌入、兴起，都能引起热烈反响。就《文心雕龙》的研究领域来说，王元化方法论的突破，则直接启示了范畴体系、纲目条贯、逻辑框架等方面的研究方向。

中国哲学一开始便有所谓“意——言”关系：“言不尽意，书不尽言”（《周易·系辞》），庄子一派，则引申到“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中国诗学一开始则有“诗言志”说。“意——言”关系、“志——言”关系，这是认识论二项式，后来《左传》出现了认识论原始型的三项式，“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左传·襄公25年》），提炼出“志——言——文”的认识论三一式结构（本质上仍是二项式：志——言（文））。魏晋时代，演化为“言不尽意”（王弼）与“言尽意”（欧阳建）之争：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名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王弼《周易略例·明象》），“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同上书）。

这是如下的三一式结构：

意（圣人制象之意）——象（卦象）——言（对卦象的说明）

这个三一式结构比“志——言——文”结构扩展、充实了一层。并提出了认识工具与认识对象的关系。以“无”为本（以“无”为道）的哲学最后要得出只有废弃有限的认识工具（语言），才能把握那无限神秘的本体（无）。其实，这仍是一种“以无为本”的存在论（不仅仅是认识论了），不过是否否定认识论的程序表现出来。我们虽不必卷入这种“言不尽意”与“言尽意”之争，但是，却万万不可忽视二者之争形成的一股强大思辨潮流，塑造与陶冶了人们的思维模式，即认识结构三分之（意——象——言）。这种认识结构（或

文学发生的三分结构），就成为当时人们审美认识的一种通俗框架。作为“长于佛理”，“深得文理”的刘勰，他的审美认识能离开当时那普遍性的哲学——美学认识结构吗？因此，在《文心雕龙》中，从宏观文化——文学发生论（道——圣——文），到微观文学发生论（物——情——文），或个体创作过程论（思——意——言），和欣赏批评论（文→情→物（貌）），等等，都贯穿了这种审美认识（或审美反映）的三一式结构。

在现代几十年来的研究者中，有功力的学者，都企图总结《文心雕龙》体系的某些规律，超越“本文”的低层次水平，打破以古证古的沉闷气氛。他们首先注意到的是如何提炼审美认识论中的主客体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凝定形式，也就是本文所说的三一式结构（“道——圣——文”三一式结构是古已有之的东西，几乎是所有研究者认同的，因为这在荀子、杨雄那里早已说得分明）。视线的聚焦点是刘勰的创作论。

1. 陆侃如、牟世金所提炼的审美认识论三一式框架：

物——情——言（文）

“《神思》篇提出的情与物、言与情和言与物三种关系，是刘勰创作论的总纲”（陆、牟《文心雕龙·译注》上册第66页）“‘衔华佩实’为总论，又以此观点用于‘论文叙笔’，更以‘割情析采’为纲来建立创作论和批评论”（同上书第45页）。

在后来的研究中牟氏说得更为果断、分明：

“在物、情、言三大关系中，情与言的关系是《文心雕龙》全书理论体系的主干”（牟世金《雕龙集》第189页）。

“刘勰的文学理论体系以研究情和言的关系为主，而由探索物、情、言三者的相互关系构成，这三种关系又是文学理论所研究的基本问题，这就为我们研究古代文学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线索”，“其后数千年的文论诗话，则抒情言志，咏物写景，情景交融之类，就成为论者的家常便饭，物、情、言三事，几乎是无书不写，无人不谈。……因此，对物、情、言关系的研究，在我国古代文论中，是具有较大普遍性的”（同上书第190页）。

陆、牟之论是精辟而中肯的，是积几十年潜心研究的一种升华。要从《文心雕龙》浩繁纷呈的网络中，提炼出作者审美认识论的基本结构、理论框架，决不是功夫浅陋之辈所能达到的，尤其



静态的、孤立的环节去考察，它的合理性、现实性，只存在于客观化的过程中，而不存在于孤立、静态的“无”中。邱世友先生曾指出，应以道的此岸性或彼岸性来划分大界限，这颇有益于讨论。

“道沿圣而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种“道——圣——文”的三一式互逆结构式，实际上是中国哲学——伦理学——美学的一种普泛性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框架，它有母结构和逻辑起点的作用。天道、人道、文道都统一在这个三一式框架中。中国人的“天道”，很难离得开“圣道”和“文道”，中国人的“文道”，更难离得开“天道”与“圣道”。看来，“圣”的中介环节的确是个关键，由此（圣）出发，可以“亦此亦彼”，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失重与倾斜，也许就在中介环节的“圣”上——即伦理上。这是一种思维方式上的束缚。刘勰在宏观文化——文学发生论上，完全遵循这种观点，但在“物——情——文”、“思——意——言”等结构中，则从实际出发以“情”为中介，突破了“圣”（中介环节）的束缚，使以上三一式结构得到自身的完善。

“道——圣——文”互逆结构，不管是作为哲学——伦理价值指向，或审美价值指向，都以自身强有力的手段，塑造和陶冶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给中华文化形态打上深深的烙印。这种本体论与认识论合一的三一式结构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思维框架，影响了中华文化圈内的一切系统，当然文学系统也不能例外。

“道——圣——文”三一式结构与“意——象——言”三一式结构的关系，虽不可同一而言，但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这里的所谓“意”，即圣人制象（卦象）之意，“象”是圣人制象意识的结构化与物化，“言”是对卦象的说明、解释。三者作为统一体，乃是圣人悟道作文的内在运转机制。于是，《文心雕龙》的基本范畴概念以及逻辑框架，则可从这两个系统演化出来。

2. 微观文学发生论与个体创作过程论（审美主客体关系及其物化形式的三一式结构）。〔注〕

“道——圣——文”是宏观文化——文学发生论，凡属“文”者都包括在内故曰“文化”。深入下去，进一步的分化，便是文学发生论。（“文以载道”）刘勰对这一番千思万虑、搜索枯肠的研究，但仍蕴含于类似的思维框架内。

按照多数研究者的意见，从《神思》篇至《物

色》篇，属于创作论，其余两篇则是欣赏、批评论。在这部分中，包括文学作为本体（或主体）的自我发生过程，以及文学作为客体的被创造过程，两者都存在着审美的主客体关系，前者是文学作为主体的历史发生和演化过程，这就是陆侃如、牟世金所反复强调的“物——情——文”三一式结构。

物——情——文（言）…… ①式  
（主体）（客体） （简称①式）

在个体创作过程中，“情（心）——物（景）”的主客体关系，则恰好发生了颠倒，从反映过程颠倒为创作过程。《熔裁》篇说：“草创鸿笔，先标主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振辞以举要。”成为下面的三联结构：履端（始）——举正（中）归余（终）。也即成为“设情——酌事——撮文”（或“思——意——言”）：

情——事——文  
（心）（物） ……②式  
（主体）（客体） （简称②式）

上面①式与②式中的这种交错性审美主客体关系，正好从不同方向说明了两个三一式结构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文学本体——历史发生论（①式）蕴含着个体创作过程论（②式），而文学本体——历史发生论（①式），又蕴含于宏观文化——文学发生论（道——圣——文）中。

〔注〕按照哲学规定，主体是活动的主动者，行为的发出者；客体是活动的对象。因而“主体”的涵义，就不只是人，还可以包括唯心创造观的“灵”与“神”，以及马克思说的“社会”。《文心雕龙》中的“道”就是一个绝对的主体，它创造一切（圣与文），这种主客关系是颠倒了的主客关系。

从《明诗》篇到《书记》篇，是“论文叙笔”，人们称作“文体论”。文体论其实是文学创作论的一般文化基础。陆侃如、牟世金甚至认为：“《文心雕龙》的精华部分，虽然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创作论和批评论中，但‘论文叙笔’的21篇，是刘勰全部文学理论的基石”（陆、牟《文心雕龙译注》上册第64页）。

不管是文体论还是创作论，主要的理论框架关系式，仍是审美的主客体关系问题，亦即心——物关系。这在中国古代传统文论中，又叫作“情——景”关系。按照汤一介的观点，“情——

景”关系(“情——景”合一)是中国人审美观念的逻辑起点,它解决创作中的主客体关系,探索创作与欣赏的问题(与此相对应,“真”的逻辑起点,是“天人合一”,解决人与宇宙的关系,探索世界统一性问题;“善”的逻辑起点,是“知行合一”,解决人与人的关系,探索道德标准问题)(见《中国哲学范畴集》第427页至428页)。

因此,“情——景”(或心——物)的审美主客体关系,则成为“文学发生——创作过程”两类不同程序系统的基本关系。如果在“情——景”关系基础上,再加上其物化的符号形式(文、辞),即成为一种审美认识三项式,也可并入②式中去。

不难看出,文体论——文学发生论——创作过程(含欣赏批评论),三者中最根本的问题仍是审美的主客体关系问题。这种关系一旦得到厘定,随之而来的便是其符号形式(物化形式)的凝定。因此,又可把这种关系抽象为如下的审美认识论三一式结构:

{ 审美主体——审美客体——物化形式  
 { 审美客体——审美主体——物化形式  
 ..... ③式  
 (简称③式)

这种③式关系,从根本上说,又可蕴含于“意——象——言”的古老哲学框架中,在宏观方面上溯一个层次,便是“道——圣——文”关系。“道——圣——文”关系,用主客体关系加以阐释,也大致一样:

道——圣——文  
 (主体)(客体)(物化符号)  
 (“道”作为绝对主体的客观化过程)

一个简单的审美认识论三项式就能解决《文心雕龙》庞大体系的复杂问题吗?不,三项式框架只启示理论模式——给人一种“条贯”感、骨骼感,例如“物——情——文”三项式,其各个环节还可作横截面的放射性展开,使之具备“经纬”结构,发生“卫星效应”。“物”的领域可经纬交织为“景——物”、“事——义”、“形——貌”;“情”的世界可经纬交织为“情——意”、“神——理”、“心——志”;“文”的范围可经纬交织为“文——辞”、“采——华”、“言——说”。

每个环节都是一个系统,都有六个以上的要素,三环节间组合成的三一式结构(范畴系统的对应性串联),如果打破词性的对应性(对偶性)

组合,其组合式子可达到相当可观的数字:

$$6^2 \times 6 = 216$$

“物——情——文”的展开式是一个“标准式”,《文心雕龙》中许多对偶句式的非对应性,可由“标准式”判别、校正,从而审视、考察其“物——情——文”关系,否则,就真的如郭晋稀先生所说:“目迷五色,不知所云”了。

### 3. 文本本体论三一式结构

所谓“文本本体论结构”,就是“物——情——文”系统中的第三环节(“文”),一般称为“内容——形式”一体性结构。整个“论文叙笔”(文体论)部分,都包含在这个领域中,“文本本体论结构”以“文本”(或曰“本文”)为中心,考察“内容——形式”要素,必要时则“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在逆向运动中涉及第二、第一环节。但不管怎样,视点总在“本文”结构上(所以许多人不无理地说《文心雕龙》不是文学理论,而是“文章学”理论,这当然是片面之论)。

如果把“本文”结构展开,郭晋稀提炼的“四体关系”(事义——情志——辞采——宫商)也许有较大的参考价值。把“事义——情志”两体合并,即为内容性环节,形式性环节二分为辞采、宫商。如下图所示:

1                      2                      3  
 事义 / 情志 —— 辞采 —— 宫商  
 内容                      形式

由于音律、宫商在汉语中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所以把形式方面界分为“辞采”和“宫商”两大类,是非常必要的。宫商是汉语文体结构中的神韵领域,“声含宫商,肇自血气”(《声律》),是文本结构最后定型、完善的关键。

### 4. 文本风格二极性结构

作为对文本结构的重要补充(或者可说是文本的互补结构),则是文本的风格。刘勰把这种风格表述为正向与反向的二极性关系。

“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体性》)。

“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体性》)。

风格只有倾斜为二极性对偶系统,才有高度的类型抽象性,也才能与中国人的审美类型,阳刚美—阴柔美(发端于《易经》哲学,完成于姚鼐

的概括)相对应。如下式所示:

|   |               |   |      |
|---|---------------|---|------|
| { | 雅 奥 繁 壮 (阳刚美) | } | 辐辏相成 |
|   | ∴ ∴ ∴ ∴       |   |      |
|   | 奇 显 约 轻 (阴柔美) |   |      |
|   |               |   |      |

风格总是无限多样的,它可以在二极性对应中,产生“卫星”式的放射系统,展开无穷层次,但是作为理论框架和核心的把握来说,应具有“风格就是人”的协合性,也即“三千之辐,共成一轂”(《总术》)的系统整合性。当然,二极性是系统整合性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它是艺术辩证法的一种自然显现,一种“美的结构”(现代自然科学家对“对称美”充满无限的爱恋)。

归纳本文所述,只要我们把握上面指出的“纲”与“目”的几个三一式结构(主客体关系

及其物化的符号形式),以及风格论的二极性对偶结构,那么,《文心雕龙》的范畴体系、逻辑框架,基本上便可勾勒出来了。用这样的逻辑抽象(逻辑研究方式)去研究《文心雕龙》体系,不无难以接受之处,但是作为逻辑研究方式,它比历史研究方式要强有力得多。正如恩格斯所说,逻辑研究方式“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它既避开了“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也避开了“常常打断思想进程”的随机性描述。作为《文心雕龙》研究方法的一种探索,本文仅是一种肤浅的尝试,企望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作者单位:雷州师专中文系  
责任编辑:刘斯翰

(上接第103页)

revitalization programe(语言复兴计划)则是旁涉关系,分别反映出需要进行“语言保持”的环境——多语现象、在这种环境中可能同时导致的另一种结果——语言转移、以及对此可能采取的不同策略——语言复兴计划。“多语现象”条后所记“参见”的bilingualizm(双语现象、双语制)、multilingualizm(多语现象、多语制)和code election(语码选择),前二条旨在辨析近义词语;后者涉及多语体现象中的个人语言策略——语码选择。按照“参见”的提示顺藤摸瓜,读者便可以逐层扩大和深化对“语言的社会学研究”的认识和理解。

如果说,“见”和“参见”的体例,在一部词典所收的术语构成的系统中,通过术语条目的相互阐释补充,充分发掘出了词典自身的系统自足性的释义效能,那么,排在“参见”之后的“参考”(某作者某年的论著)这一体例,则体现着系统的开放性的观念,它与书后的书刊索引相配合,为进一步研究相应的条目以及与条目相关的问题提供了词典以外反映与条目有关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的主要信息。

• 王宗炎主编的《英汉应用语言学词典》是国家教委七五计划重点项目,1988年12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0年6月出修订本时改名为《英汉教学语言学词典》。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联  
责任编辑:刘斯翰



# 元好问诗论新探

刘明今

## 一 金贞祐南渡后的复古风尚

论及金代文学或文化不得不面临的事实是宋、金政权的南北对峙，地域的隔绝导致并加深了南北思想文化的差异。翁方纲《书元遗山集后》诗称：“程学盛南苏学北。”程学指二程，苏学则指苏轼。要而言之，金人的诗歌创作既上承北宋，又不受北宋的局限，甚至始终存在着一种要摆脱宋人的倾向。王世贞《艺苑卮言》称：“元裕之好问有《中州集》，皆金人诗也，如党承旨怀英，其大旨不出苏、黄之外。”王世贞此语并不确切，就诗歌创作而言，金人并不为苏黄所囿。即以党怀英而论，《中州集》小传称其“诗似陶谢，奄有魏晋”。其他金代重要诗人，郝侯诗“殊有古意”，周昂“作诗喜简淡，乐府尤温丽”，赵秉文“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古诗，则沉郁顿挫学阮嗣宗，真淳简淡学陶渊明”（以上引自《中州集》小传），王庭筠“暮年深于诗律，七言长篇，尤以险韵为工”（元好问《王黄华墓碑》），完颜璘诗“甚有唐人远意”，麻九畴“为文精密巧健，诗尤奇峭，妙处似唐人”（以上引自《归潜志》）。当然，金代文人中学苏、黄者亦不乏其人。但，学苏黄，尤其是学黄山谷，始终未成为如像南宋的江西派那样一股巨大的潮流。不仅如此，金人对黄庭坚的批评却由来已久，在王若虚之前有周昂、李纯甫、尹无忌等（见钱钟书《谈艺录》第四十五）。以故元好问在《中州集题词》中有“北人不拾江西唾”之句。撇开那少部分专师苏黄的作家不谈，金人对苏与黄，师承的是其抽象的创造精神，扬弃的是其具体的创作风格。大致说来，苏轼给予金人以自由奔放，不拘一格的文学思想，黄庭坚则以其出奇制胜，务求自成一体的追求影响于金代文坛。金人一方面承受了苏黄创作

精神的沾溉，一方面又要扬弃宋诗，把目光转向唐人，以至魏晋。这样便酿成了金代后期复古思潮的复杂化与多元化。

金代复古风尚的盛行在贞祐南渡之后。《归潜志》云：“南渡后，文风一变，文多学奇古，诗多学风雅，由赵闲闲、李屏山倡之。”促成这一变化的直接原因是对金代律赋之敝及浮艳文风的批判。先是“金朝取士，止以词赋、经义学，士大夫往往局于此，不能多读书”，“南渡后，赵（秉文）、杨（云翼）诸公为有司，方于策论中取人，故士风稍变，颇加意策论，又于诗赋中辨别读书人才，以是文风稍振”，“士人多为古学，以著文作诗相高”（见《归潜志》卷七卷八）。此外，随着金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上层贵族及士大夫的生活渐趋奢靡，文学上争妍斗巧之风亦渐炽。《归潜志》云：“明昌、承安间，作诗尚尖新，故张翥仲扬由布衣有名，召用。其诗大抵皆浮艳语。”一些文人对此不满，欲加矫正，自然地也转而提倡师法古人。当时师古之风的倡导者是赵秉文与李纯甫。

赵秉文论文主张“徧学古人”。在《答李天英书》中说：“为文当师六经、左丘明、庄周、太史公、贾谊、刘向、杨雄、韩愈；为诗当师三百篇、《离骚》、《文选》、《古诗十九首》，下及李杜。……尽得诸人所长，然后卓然自成一家。非有意于专师古人也，亦非有意于专摭古人也。”李纯甫论文主张师奉古人“各言其志”的精神，他强调“人心不同如其面”，故“诗无定体”，“大小长短，险易轻重，惟意所适”。本此他批评齐梁的诗“病以声律，类俳优然”；西崑体“用僻事，下奇字”，“无典雅浑厚之气”；江西派诗“高者雕镂尖刻，下者模影剽窃”（《西岩集序》）。对于批判浮艳轻靡的诗风以及学山谷而流于雕镂模影者，赵秉文与李纯甫的态度是一致的。但在如何师古的问题上，

二人的观点明显地不同，以致相互指责。李批评赵：“才甚高，气象甚雄，然不免失支堕节处，盖学东坡而不成者。”赵则批评李：“文字无太硬，之纯文字最硬，可伤！”（见《归潜志》）赵与李相互间的批评反映了二人不同的创作风格，更反映了复古思潮内部的分歧以及理论上的薄弱与混乱。赵、李二人并未取得一致的意见，当时文坛上其他人也颇茫然，归趋不一。刘祁折衷二家，于赵取其论诗，于李取其论文，然所重乃在律法体制；王若虚则极力反对律法体制，主张一本自然。对此元好问批评道：“南渡以来，诗学为盛。后生辈一弄笔墨，岸然以风雅自名，高自标置，转相贩卖，少遭指撻，终死为敌。一时主文盟者，又皆泛爱多可，坐受愚弄，不为裁抑，且以激昂张大之语从谀之，至比为曹、刘、沈、谢者，肩摩而踵接，李杜而下不论也。”（《中州集·溪南诗老辛愿》）元好问称“南渡以来，诗学为盛”，则他对贞祐以后文坛上的复古之风基本上是肯定的，然亦有许多不满。一、初学者口中高喊师古，却不懂得古人风雅的精义。二、文人中意气相尚，不能虚心向学，寻求师古之正途。三、主盟者泛爱多可，养成文坛上狂傲轻薄的习气，李杜以下便不屑一顾。对这些陋风流弊，元好问与其好友辛愿的态度是一致的。他称赞辛愿“敢以是非白黑自任”，历评当时诸家诗，不掩其善、不隐其恶，“文峻网密，丝毫不相贷”；他自己则着意去探本求源，辨明师古之正途。

## 二 《论诗》三十首的复古旨趣

《论诗》三十首除首末二首外，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其二至九论魏晋南北朝诗，其十至二十（包括二十五）论唐诗，其二十一至二十九论宋诗。对这三个时期，作者的态度有明显的不同，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作者以颂扬为主，意在指出师古的典范。

其二称：“曹刘坐啸虎生风。”元好问论诗首从建安开始，标举曹植、刘桢二家为代表。建安为我国古代文人五言诗的创始时期，其诗“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文心雕龙·时序》）。唐以后诗坛倡导师古，遂多以之为范的。对魏晋间诗歌，除以曹、刘为代表的建安风骨外，元好问还拈出阮籍、陶渊明二人加以称颂。阮籍诗旨意渊逸，兴寄无端。比之建安时代的诗歌，风格由慷慨转为苍凉，其个人的“磊磊”不平之气更浓郁、更深沉。陶渊明在晋末又另趋一途，于高古

浑厚中别创冲淡一境，以“天然”出之，以“真淳”为归。至此元好问标举了古诗的三种风格或境界，即曹刘之慷慨，阮籍之沉郁、陶潜之真淳。此数人为历来诗论家所称道，除此之外元好问特地标出《敕勒歌》一首。解律金此诗以豪放浑朴称，元好问是北方人，又仕于金，故倡导北方雄奇之格，乃所当然。然《敕勒歌》的豪放浑朴确也在曹、刘、阮、陶的慷慨、沉郁、真淳外别树一帜。凡此四类都被元好问目为古诗中的正体。对此时期诗坛中的不良倾向，他批评了潘岳之伪，其诗文不能真实地表露其心声；陆机之靡，其诗“斗靡夸多”，渐渐地酿成了齐梁的绮靡之风。

以上论魏晋南北朝古诗，正者四，伪者二，清浊俨然。对正体作者充满了赞美与崇敬。接下论唐诗便稍有不同，在金人的心目中唐不为古，乃为近古，唐人作诗之妙乃在于善学古人。元好问于《杜诗学引》称，“窃尝谓子美之妙，释氏所谓‘学至于无学’者耳。今观其诗，……则九经百氏古人之精华所以膏润其笔端者，犹可仿佛其余韵也。”故《论诗》评论唐人诗歌往往着眼于其创作的途径、方法，以及创作中的甘苦，所评亦较少作颂扬式的赞语，而是实事求是地分析其成败优劣。如论杜甫之长不在“排比铺张”，而在“眼处心生句自神”；李白之长在气势豪放，不同于世人的“东抹西涂”；元结之长在不效齐梁，不斤斤于“切响浮声”，而能探求古意，发之自然；柳宗元之长在幽微杳渺，深得谢灵运的精髓。此外对李商隐、卢仝、李贺、孟郊、陆龟蒙均作了比较严厉的批评。元好问对唐人诗歌的评论，总的说来有褒有贬，且褒多于贬，但是对唐代诗歌艺术的总体评价显然不及魏晋。对杜、李、元、柳的肯定主要突出了他们在艺术境界与创作方法上对古人的学习与继承，如不东抹西涂，不斤斤于浮声切响，重视真情实感，抒发豪放昂扬的情志等，这些都可以说是魏晋间正体精神的发扬。而另一方面，对杜甫、李白在诗歌格律上的创新、境界上的开拓则缺乏足够的认识。此外对李贺、李商隐等亦批评过甚，对白居易只字未提，对韩愈只肯定其诗的豪放而不及其奇崛生新。显然对唐诗，特别是中晚唐诗的新变，元好问的态度是相当保守的。

宋诗可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论宋诗的关键在对苏、黄地位与影响的评价。元好问诗称：“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元好问认为宋诗之病

在务求“出奇”，不与古人同，虽苏黄二家犹不能不受世风影响，甚或推波助澜，以至形成“沧海横流”的局面。元好问对苏黄本人尚多所肯定，但对他们过求新变的影响却持批评态度，“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又作《东坡诗雅》说：“五言以来，六朝之谢、陶，唐之陈子昂、韦应物、柳子厚，最为近风雅。……近世苏子瞻绝爱陶、柳二家，极其诗之所止，诚亦陶柳之亚，然评者尚以其能似陶、柳，而不能不为风俗所移，为可恨耳。夫诗至于子瞻，而且有不能近古之恨，后人无所望矣。”可见元好问对苏诗的肯定仍在其似陶、柳，即似古处，而其不足乃在不近古。要之，元好问始终悬了一个“近古”的标准来品评苏黄，品评宋诗，因此批评便往往多于肯定了。他接下批评宋人“曲学虚荒”，不得古学之正途；“俳谐怒骂”的诗风也与古人的“雅言”不合；秦观诗柔弱，格调不高，陈师道闭门觅句，失去了谢灵运真切自然的诗意。

统观《论诗》三十首，元好问评论诗歌的原则是相当清楚的。针对金贞祐南渡以来文坛上师古而不得其正的现象，他提出要师法古之正体，并以之来评判古今诗歌。这一原则从总体上看不免保守，对文学的不断发展与新变缺乏认识。表现在品评中，即是对唐诗的价值认识不足，对宋诗贬抑过甚。但另一方面，在品评什么是古诗的正体时，他拈出曹刘之慷慨、阮籍之沉郁、陶潜之真淳以及斛律金之豪放为诗家楷模，眼光敏锐，议论通达。此外在品评唐人诗歌时，虽然也从师古立论，但不局限于风格的近似，而强调创作方法的师承，如务实历、求真意、不雕琢、本自然等，因而既以师古为准则，却又不泥于古。这两方面可说是《论诗》三十首的精华所在。

### 三 正与真的矛盾

《论诗》绝句作于元好问二十八岁时，其标举的是古诗之正体，所谈主要是诗歌艺术的格调、境界。到晚年作《杨叔能小亨集引》，又进而标举一“诚”字，这涉及到诗歌创作的指导思想。文曰：“唐诗所以绝出于三百篇之后者，知本焉尔矣。何谓本？诚是也。”诚包括真与正两重含义。他指出“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故作诗不诚则“无物”，“言无所主，心口别为二物，物我邈其千里”。这样的诗别人听了，如春风过马耳，决不会受到感动。此为以真释诚。然同时元好问又说：“古圣贤道德言语布在方册多矣”，“唐

人诗其知本乎，何温柔敦厚藹然仁义之言之多也”。则所谓诚又不外乎厚人伦、敦教化的温柔敦厚之言。这样便给真加上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使真从属于正。

“正”为元好问一生所服膺的原则，它包含两重内容，一为思想道德之正，一为文字风格之正。杨云翼曾作诗赠元好问称：“彼美元夫子，学道如观澜。孔孟泽有余，曾颜膏未残。向来种德深，直与山根蟠。……舞雩咏春风，期若曾点冠。五言造平淡，许上苏州坛。我尝读子诗，一倡而三叹。……晴云意自高，渊水声无湍。”这首诗前半部称许其儒学道德，后半部称许其诗风淳雅。贞祐南渡后，元好问曾游于杨云翼、赵秉文门下，杨、赵对他期许颇深。后赵秉文去世，元好问作墓铭，称有金一代能“以道德仁义性命祸福之学自任”，“经为通儒，文为名家”者，“惟我闲闲公一人”，作了极高的评价。元好问与赵秉文在文学观念上确实有许多接近的地方。他们都以儒者自任，有意识地以儒家传统诗教去指导文学批评，赵倡师古，元亦倡师古；赵将师古与儒学精神结合，主中和之音，元也同样如此。他说：“文章天地中和之气，大过为荒唐，不及为灭裂。”（《张仲经诗集序》）还特为写诗定下数十条戒律，如“无怨怼，无谑浪，无鸷狠，无崖异”，“无为市倡怨，无为琵琶娘人魂韵词”，“无为天地一我、今古一我，无为薄恶所移，无为端人正士所不道”等等。（见《杨叔能小亨集引》）此数十条戒律可说是儒家中和一说的极大发挥，从思想意识到文字风格对诗歌创作作了重重限制。

元好问将真从属于正，而用诚加以概括。但是一涉及具体的批评，往往便产生矛盾。譬如对阮籍的评价，元好问《论诗》云：“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磊砢平。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这样的评论显然与以温柔敦厚为诚、为正的观点不合。再如所评李商隐之“望帝春心托杜鹃”、李贺之“切切秋虫万古情”、孟郊之“东野穷愁死不休”等，不可谓不真，却也不见得合于正。元好问对他们虽有所批评，也不完全否定。由此可见，在元好问的文学批评观念中，真并没有完全从属于正，还是有其独立的价值的。其文学批评是如此，其创作实践也可说明。郝经论其创作云：“杂弄金碧，糅饰丹素，奇芬异秀，洞荡心魄，看花把酒，歌谣跌宕，挟幽并之气，高视一世。以五言雅为正，出奇于长句、杂言，至五千五百余篇。为古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

意以写恩怨者又百余篇，用今题为乐府输扬新声者又数百篇，皆近古所未有也。”（《遗山先生墓铭》）可见元好问以诚、正为本的创作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五言古诗中，至其长句、杂言、乐府便不免“出奇”、“出新意”，甚而“以写恩怨”。元好问曾说过五言“最为近风雅”，“杂体愈变，则去风雅愈远”（《东坡诗雅引》），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写那么多杂体诗、长短句，甚至当时的俗曲呢？由此可见，元好问的文学思想是并不纯一的。其理论认识与具体的批评、具体的创作二者时有矛盾，却又同为元氏文学思想的重要方面。他自己对此亦有所觉察，晚年在《新轩乐府引》中，写到新轩张胜予滑稽玩世，所作多喜谑之词，当金末离乱之际，“又多愤而吐之之辞”。自己对此十分欣赏，谓读其词可使“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屋梁子闻之，深感不解，责问道：“《离骚》之《悲回风》、《惜往日》，评者且以露才扬己，怨怼沉江少之。若《孤愤》、《四愁》、《七哀》、《九悼》绝命之辞，《穷愁志》、《自怜赋》，使乐天知命者见之，又当置之何地耶？……世方以此病子，子又以及新轩，其何以自解？”屋梁子不知为何许人，或即为元好问行文所假托者。屋梁子的责问正反映了元好问内心深处的惶惑与矛盾。当性情之正与感情之真发生冲突时，他不能从理论上正面加以解决，只得以设问的方式自嘲自慰了。

#### 四 学至于无学

元好问细辨泾渭，指出了师古的正途；以诚为本，道出了师古的精神；其论师古的具体方法则在“学至于无学”（见《杜诗学引》）。

“学至于无学”的提出与师古论有密切的关系。师古必须学，然古人作诗又往往是不学而能的。如何看待这一矛盾的现象呢？金末杨飞卿作诗讲究“雕琢功夫”，元好问为之辩解道：“盖秦以前民俗醇厚，去先王之泽未远，质胜则野，故肆口成文，不害为合理。使今世小夫贱妇精心而发，肆口成文，适足以污简牍，尚可辱采诗官之求耶。故文字以来，诗为难；魏晋以来，复古为难；唐以来，合规矩准绳尤难。”（《陶然集序》）这里厚古薄今的偏见十分强烈，与同时刘祁、王郁对“俗间俚曲”的赞赏大不相同。然而元好问由此得出“复古为难”的结论，且进一步引申了三点颇有意义的见解。其一，因为“复古为难”，故必须以诗为专门之学，求合于规矩准绳。其二，诗

的最高境界当在“不烦绳削而自合”、“不离文字”又“不在文字”。

兹先述其一。元好问素来重视诗歌的格律锻炼之学。二十八岁时所作《翰机引》即称：“文章天下之难事，其法度杂见于百家之书，学者不遍考之，则无以知古人之渊源。”这是说，师古必由法度得之。他把法度比作“锦机”，世之巧女，尽管文绣妙一世，“设欲织锦，必得锦机，乃能成锦”。故他对历来的诗评、诗品、诗说、诗式等著述都颇为重视，汇而采之，编为一集。体现在具体的作家作品的批评中，他也不废工巧。在《中州集》各家小传中，评祝简：“廉夫诗甚工，如《赋雪》云：‘云屋无寒梦，油灯有细香。’”评师拓：“作诗有气象，而工于炼句。”评李经：“作诗极刻苦，如欲绝去翰墨蹊径间者。李、赵诸人颇称道之。”评麻九畴：“大率知几于学也专，故所得者深。……少时犹失持择，近诗精深峭刻。”评辛愿：“作文有纲目，不乱，诗律深严，而有自得之趣。”评语中对讲究诗律、工于炼句的现象都加以肯定。其中对辛愿评价尤高，称其“佳句极多”。辛愿论诗亦重视诗律，擅于“解络脉、审音节、辨清浊、权轻重”，元好问对此大加称赞，认为“有公鑒而无姑息者，必以敬之为称首”。不但如此，元好问谈论自己的诗学也大致同调。他于《答聪上人书》中自述少即以诗为“专门之业”，积四十年之久，“挥毫落笔，自铸伟词，以惊动海内则未能。至于量体裁、审音节、权利病、证真贗、考古今诗人之变，有慧直而无姑息，虽古人复生，未敢多让。”足见其对诗歌体裁格律之学的重视。因此在《陶然集序》中，他不但称赞杜甫“老去渐于诗律细”，还肯定了李贺“必欲呕出心肝乃已”的刻苦求工的精神。

其二，元好问虽重视诗歌的格律锻炼之学，但并不斤斤于此，而求更上一层。如“子美夔州之后，乐天香山之后，东坡南海之后”，达到“不烦绳削而自合”的“无学”境界（《陶然集序》）。他既说：“坎井鸣蛙自一天，江山放眼更超然。情知春草池塘句，不到柴烟粪火边。”（《论诗三首》其一）指出诗歌的风格、境界与个人的性情、经历、地位有关，不单是苦学可就。但同时又指出另一种情况，即在长期涵泳古人作品以后，性情自然地受到陶冶，于是“元气淋漓”，肆口而出，皆是妙作，仿佛有古人之“余韵”，如杜甫、白居易、苏轼晚年都达到了这一境界。这一境界单纯依靠体裁格律之学是无法达到的，然而也不是抛



弃格律锻炼的工夫所可成就。这其中的奥妙何在呢？很难用逻辑推理的文字加以说明，于是元好问也不得不如南宋人那样在诗论里大谈禅学与悟境了：“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心地待渠明白了，百篇吾不惜眉毛。”（《答俊书记学诗》）“诗笔看君有悟门，春风过水略无痕。庵名未便遮藏得，拙里元来大巧存。”（《周才卿拙庵》）以禅论诗只是取其比喻之义，其中真义毕竟只可意会，而难以用明白的言语表达。所以元好问最终不禁感叹道：“诗家关捩知多少，一钥拈来便有余。”（《感兴四首》之三）

## 五 元好问诗论与严羽 《沧浪诗话》之比较

元好问与严羽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同为文学批评大家，一处南一处北。他们的诗论有不少相近的地方，譬如都推宗汉、魏、唐代的诗歌，贬抑宋代，尊奉李杜而批评孟郊、贾岛，又都重视诗歌中的悟境等。然另一方面，他们的差异似乎更大。这是因为他们文学批评的背景有所不同，因而批评的指向也就大异其趣。

严羽作《沧浪诗话》所针对的是当时“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倾向。具体而言，即江西诗派专务使事用字、讲究来历出处的习气，以及理学家们把理学引入诗歌所创造的击壤体。因而他提出“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以“别趣”来衡量古今诗歌，指出“盛唐诸人惟在兴趣”，而对当时人的诗“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提倡师法古人、严羽与元好问是一致的，但元好问的出发点与严羽异。当时北方也受黄庭坚诗风的影响，然先表现为尖新，后表现为奇峭，与南方之使事用典、驰骋才学者不同。此外，南方理学盛行，影响大，北方则理学初初传入。整个金代前中期。乃至金末元初，面临的是汉化与非汉化的主题。汉化的一个主要内容即是儒学的推广，因此整个思想文化领域还不存在批判理学流弊的问题。元好问诗称：“学道有通蔽，今人乃其尤。温柔与敦厚，扫灭不复留。……我观唐已还，斯文有伊周。开云揭日月，不独程张俦。圣途同一归，论功果谁优。户牖徒自开，胶漆本易投。九原如可作，吾欲起韩欧。”（《赠答刘御史云卿》）其意不专主程、张，然亦绝无批评之意，而是认为不必另张旗帜，当以传统儒学为归。这样的观点显然与金、元的

社会文化背景有关。元初壬子年，元好问还亲入和林，朝觐蒙古可汗，并奉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论诗，其指归自然与严羽不同了。严羽主张“别趣”，倡“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元好问则主张辨别正伪，发扬传统儒学，以风雅为归。因而他既沿袭了儒家传统诗教温柔敦厚的保守论调，又发挥了其重视言情叙事的积极的现实精神。相比之下，严羽的别趣说更重视诗歌自身的审美特征，为诗歌艺术理论的探求开拓了新的境界。而元好问辨别正伪之说则缺乏新的理论意义，特别是元以后，随着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其正伪之辨的消极意义也越来越明显。

元好问与严羽都提倡悟，好以禅论诗。然二人悟入的途径不同，归趣也就有异。严羽论诗重体制，认为“今人作诗差入门户者，正是体制莫辨也”（《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所谓体制，有“以时而论”与“以人而论”的区别，总之是指各时代、各作家不同的艺术风格。其所谓悟即是指通过辨别体制而认识到诗歌应有的艺术特征，如兴趣、格力、气象等。元好问从辨别诗之正伪论诗，标举曹、刘、阮、陶以及斛律金的作品为诗家楷模。其所谓正，既包含他们诗作的艺术特征，如悲壮、沉郁、豪放、自然等，也包含他们人品人格与创作方法，如曹、刘慷慨的抒发，阮籍磊落之深孕，陶潜真淳的流露以及斛律金诗中的“万古英雄气”等。他把作品的艺术风格与作者的人格、学力等结合起来看，甚至进一步联系作者所处的时代的社会环境。《鸿水集引》称：“文章虽出于真积之力，然非父兄渊源，师友讲习，国家教养，能卓然自立者鲜矣。”以故他评《敕勒歌》乃是中州万古英雄气凝聚而成，离开了北朝那样的社会环境，就不可能产生《敕勒歌》这样的诗作。《陶然集序》称“魏晋以来，复古为难；唐以来，合规矩准绳尤难”，所论正是此意。由此出发，元好问提出“学至于无学”的观点，一方面要学习古人的艺术风格，不妨讲究体制格律，以诗为专门之学；然又要体会古人的创作态度，“诗家圣处，不离文字，不在文字”。这就是元好问所主张的悟境，通过悟，最后达到“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这样的悟境便与严羽所倡有别。严羽从体制出发论悟，悟而求合于古人的体制，故他认为创作的最高境界是“试以己诗置之古人诗中”而识者莫能辨。元好问则看到“真积力久而有不能复古者”，

（下转第51页）



# 悲壮的史诗：论左联作家的乡土小说

杨剑龙

滥觞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小说至三十年代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题材、背景和性格刻划来看，中国现代小说的进展清楚地显示了从二十年代早期以城市为背景的自传体裁转变到三十年代以后描写农村范围的乡土文学”<sup>①</sup>。描写乡村社会农人生活逐渐成为三十年代小说创作的主要题材，以至于当时甚至有人惊呼“几乎所有的作家全写农村去了”<sup>②</sup>。其中左联作家的乡土小说创作获得了突出的成就。

—

中国的三十年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三十年代的中国乡村是一个灾难的骚动着的世界。1935年任白戈在《农民文学底再提起》中说：“目前中国底农村，不得说是正在一天一天愈加破产下去。除了原来受着的封建势力底剥削和压迫愈加剧烈以外，一般的农民还得受国际资本主义及其买办等底种种榨取……连年不断的内战，人为造成的灾害，早已使一般的农民流离失所了，再加上叠出不穷的苛捐勒索，杂税预征，结果只有一般的农民咆哮起来为他们底生存而战。”左联作家的乡土小说，真实展现了中国乡村这一历史画卷，不啻是现代中国的悲壮史诗。

二十年代末的“普罗小说”，有一些描写乡村生活的作品，如华汉的《暗夜》、洪灵菲的《大海》、刘一梦的《雪朝》等，他们的创作或缘于对童年乡村生活的依稀记忆，或萌于对当时农村现状浮光掠影的了解，为了强调文学的革命鼓动宣传作用，他们往往在描写农村的反抗暴动时将现实斗争理想化，因而创作带有概念化、模式化的倾向。而创作乡土小说的左联作家，大多出生于农村，较深入了解故乡的生活，他们常将对过去乡村生活的记忆和对现时乡村境况的了解融为一体，从而能真实展现中国乡村的衰败与骚动。茅盾、王任叔、柔石、王西彦、魏金枝等描画了浙江乡村的颓败凋敝，丁玲、叶紫、蒋牧良、张天翼、彭家煌等展现了湖南湘乡的社会风貌，沙汀、艾芜、周文的笔下剖露着四川山乡的时代痼疾，肖军、肖红、李辉英的眼底摄下了东北山野的历史烟云……，对于乡村生活的深刻了解和真切感受，对于时代风云的客观摄取和朴实描写，使左联作家的乡土小说比“普罗”作品更具感人魅力和史诗意义。左联作家以清醒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责任感，自觉地将反映时代最迫切问题和新兴阶级解放的历史重任担在肩上，他们认为“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期，尤其是中国”，“希望此后能够抓住变动的中心，写出

一点比较切实的文章”<sup>③</sup>，他们努力“冲到时代的核心的核心中去”，在时代的核心中把握伟大的题材<sup>④</sup>，“都企图要把自己的作品极力与时代融洽”<sup>⑤</sup>，并努力“探求着更适合于时代节奏的新的表现方法”<sup>⑥</sup>。因而，在某一时期，有的事件成为许多作家热衷摄取的创作题材，甚至出现了同样题材、相同篇名的作品。如蒋牧良的《旱》和徐盈的《旱》都透露了三十年代初西南六省的旱情。前者描写在苦旱煎熬下农民金阿哥的家破人亡、走投无路，意在剖析老一代中国儿女传统的文化心理；后者叙述在大旱威胁中十六个村的农民一起开展抗租运动，旨在展现淳朴乡民们的觉醒和抗争。叶紫的《懒捐》和蒋牧良的《懒捐》以相似的构思揭露了反动政府横征暴敛苛捐杂税给农民带来的灾难。叶紫揭示了老一代农民的恋土观念和新一代农民的反抗意识，蒋牧良剖露了在猛于虎的苛政压迫下老一代农民绝望的抗争。

在左联作家的乡土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急剧变动的三十年代中种种重大的社会事件：丁玲的《水》、欧阳山的《崩决》叙写了农村特大水灾酿成的惨状和灾民们在绝境中的自发抗争，可以说是三十年代初全国十一省遭受水灾的缩影。茅盾的《春蚕》、《秋收》，叶紫的《丰收》、《火》以相似的人物设置、结构布局展现了三十年代初中国农村“丰收成灾”的畸形社会现象和新一代农民的觉醒反抗。茅盾意在揭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及国内政治的混乱造成了那时的农村的破产”<sup>⑦</sup>，叶紫力图揭露“‘谷贱伤农’以及地主的剥削、苛捐杂税的压迫”<sup>⑧</sup>。丁玲的《奔》、谢冰莹的《一个乡下女人》叙写了衰败乡村中破产的农人去都市谋生的落魄遭遇，再现了三十年代中国城乡的严重经济危机和农民的悲惨命运。肖军的《八月的乡村》、肖红的《生死场》展示了日伪统治下东北沦陷区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肖军笔下描写东北人民革命军和日本侵略者的浴血奋战，充满了抗日的英雄气概，肖红的眼底摄入东北沦陷区人民的痛苦呻吟和反抗的呼号，凝聚着不屈的民族精神。

由于左联作家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历史责任感，他们常常在作品中迅速反映时代的重大事件。李辉英完稿于1932年的长篇小说《万宝山》，取材于1931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挑拨中朝关系、屠杀中国农民的“万宝山惨案”；耶林发表于1931年的《村中》通过飞机炸死无辜村民的一场小景的描写，揭露了同一年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的血腥罪行。王任叔写于1934年的《乡长先生》通过抓壮丁事件抨击了国民党政府“先安内后攘外”的卖国政策；彭柏山发表于1934年的《崖边》描写了国民党军队围剿时苏区人民有组织的斗争，是最早反映苏区人民斗争生活的作品之一。

左联作家的乡土小说描写最多的是在重重压迫、剥削下的农民的觉醒和抗争及农村革命不断深入的历史现实。沙汀的《野火》、《战后》、《夫卒》以白描的手法勾画了川北农人们在赋税、拉夫等逼迫下“忍耐和苟安绞成的纤绳挣断了”的愤怒反抗。马子华的《沉重的脚》、《他的子民们》以曲折的情节叙写了失掉土地的农民们，在南中国僻地当盐脚夫、淘金工，同压迫者作殊死的反抗斗争。丘东平的《通讯员》、《沉郁的梅冷城》、《红花地之防御》再现了广东地区农民运动壮阔的斗争生活，“用着质朴而道劲的风格单刀直入地写

出了在激烈的土地革命战争中的农民意识变化和悲剧”<sup>⑩</sup>。夏征农的《禾场上》、《萧姑庄》、《春天的故事》以朴素的文笔“揭露出当时农村阶级斗争的实质：一方面是地主豪绅对农民的欺侮、剥削和压迫，一方面是农民们在地主豪绅的压榨下的呻吟、反抗和斗争”<sup>⑪</sup>。左联作家自觉地全力分担民族和时代的忧虑，在他们笔下帝国主义的经济侵入、反动政府的横征暴敛、封建地主的残酷盘剥、水旱灾害的肆虐袭扰、古老乡村的日益颓败、土地革命的不断深入、贫苦农民的不幸遭遇、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抗日斗争的蓬勃兴起、红色苏区的反围剿斗争等等，都得到了生动的反映，展现了极其广阔的社会生活。

三十年代左联作家的乡土小说，有着与二十年代乡土文学不同的内蕴。如果说二十年代乡土文学具有浓郁的伦理批判色彩，使其呈现以反封建为内容的基本主题的话，那么左联作家的乡土小说则融入了鲜明的政治参与意识和阶级意识，展现了反帝和反封建相交融的深刻内涵。左联作家们不再一味批判农民身上因几千年封建文化浸淫而积淀的落后民族心理，而是努力展示在帝国主义、反动政府和封建势力重重压迫下乡村的衰败与骚动。

## 二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左翼作家曾大力反对文学创作以个人生活为圈囿，极力提倡描写群众生活、塑造人物群象的作品，并将其提到作家的思想意识、阶级立场的高度。丁玲的《水》是当时倍受推崇的群象小说的代表，被称为新小说，三十年代初成了创作的范本。丁玲的《奔》、沙汀的《野火》、张天翼的《仇恨》、夏征农的《萧姑庄》等作品，都致力于场面的描写、氛围的创造、集体行动的开展，而忽视了人物性格的刻划和典型形象的塑造。

左联作家的乡土小说刻划了众多的乡村人物形象，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人物形象系列，以迥异于二十年代乡土文学人物的风韵出现于中国现代小说的人物画廊。1985年任白戈在《农民文学底再提起》中说：“最近十年，一种历史转动底轮机课到了中国农民底身上。农民再不是以往那样不识不知的了，他必得张开自己底眼睛用自己底手腕和头脑来创造一个新世界。”这使自觉担负起新兴阶级解放的历史使命、努力揭示历史的行进和社会发展真相的左联作家笔下的人物别具风采，形成了属于三十年代的老一辈农民、新一代农民、乡绅阶级等人物形象系列。

倘若说，二十年代乡土文学着力揭示的是国民性的愚昧麻木的话，那么左联作家努力展示的是农民的逐渐觉醒、走上反抗道路的心理历程，这突出体现在茅盾笔下的老通宝，叶紫笔下的云普叔等老一辈农人身上。在他们身上勤劳、善良、忠厚、俭朴的优良品质和懦弱、保守、固执、落后的小农意识并存，他们难以摆脱根深蒂固的传统的价值观念、人生态度和思维模式，他们总企望以辛勤的劳作去获得自我的翻身，以容忍的态度去维持奴隶的地位。但他们已非鲁迅笔下的闰土、阿Q。在动荡的时代里，在激烈斗争

的现实面前，在走投无路的处境中，他们或愧于过去的作为，趋于朦胧的觉醒；或终于忍无可忍，走向愤懑的反抗。茅盾的《春蚕》、《秋收》中的老通宝经历了春蚕和秋收两场灾难后，似乎已感到儿子多多头是对的。叶紫的《丰收》、《火》中的云普叔在丰收的谷子被抢劫一空后，隐约地了解儿子立秋不常在家的原因了。沙汀的《老人》中罗嗦顽固的老人，在田里的谷场尽数给官兵抢走后，“第一次亲切地想起了他的儿子和他儿子干的事体。”戴平万的《村中的早晨》里省吃俭用的老魏，在看到当了××党的儿子率队伍打败了侦缉队后，“他似乎对儿子了解了些了。”在左联作家的笔下，三十年代的中国儿女不再似闰土、七斤那样逆来顺受了，在地主劣绅贪官污吏的残酷剥削压榨下，他们奋然自发抗争，他们身上可见出时代的投影，如蒋牧良《高定祥》中的高定祥、夏征农《禾场上》的秦生、叶紫《向导》中的刘媪妈、吴奚如《公道》中的叶伯，他们或忍无可忍当面怒斥剥削者，或铤而走险拼死反抗压迫者。由于许多作家从小在乡村里生活，对耕耘于土地上的老一辈农人分外熟悉，因而老一辈农人成了左联作家乡土小说中最为血肉丰满、真切生动的形象。

左联作家乡土小说的突出成就之一是塑造了前所未有的新一代农民的形象系列，在老一辈农人形象的烘托映照下，这一类形象显得更光彩照人，他们身上既有勤劳善良、忠厚俭朴等优良品质，又有思想敏锐，性格开朗的特点，集中于他们身上与父辈迥异的秉性是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和反抗精神。他们与父辈的冲突体现了进步与保守的矛盾，他们与剥削者、压迫者的斗争表现了不甘于被侮辱被损害的中国农民正在走向觉醒，他们对黑暗社会的抗争已不似父辈们那种自发的孤立的抗争，而是趋于自觉的有组织的斗争了。茅盾农村三部曲中的多多头参加了组织饥饿的农民“抢米囤”的风潮，并夺下了“三甲联合队”的枪。叶紫《火》中的立秋和癞大哥联络了九个村的农民一起抗租，最后捣毁地主的庄园逃往雪峰山。夏征农《春天的故事》中的老二组织各村的农民们与前来清乡的保卫团拼一拼。徐盈《旱》中的勃朗宁在刘永智的启迪下组织十八个村一起抗租，并拿起武器和收租的官兵抗争。然而，在左联作家的笔下，与老一辈农民形象的塑造相比，新一代农民形象的刻画显得比较单薄，缺少生活的厚度。

左联作家有较明确的阶级意识，在乡土小说中描画了众多贪婪残忍的地主形象：有私吞修坝捐款作开矿股本而酿成旱情的财主赵太爷（蒋牧良《旱》）；有为钱财砍倒山林，引起暴雨后山岩倒塌活埋全村人的地主玉喜先生（王任叔《灾》）；有为一条马腿杀死两条人命的张地主（肖红《王阿嫂的死》）；有威逼丈夫被关进监狱的发新嫂出卖贞操的恶霸九爷（张天翼《笑》）。乡绅阶级大多与地方政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有恃无恐地欺压百姓、鱼肉乡民。但在乡村日益颓败、农人逐渐觉醒的时候，乡绅阶级往往以更加狡诈险毒的面目出现。左联作家的笔下，还有以谦卑的笑容对付造反的农民，却请来军队将造反首领活埋的地主三太爷（张天翼《三太爷和桂生》）；有一向以慈善家面目出现，却纵火烧死灾民的陈浩然（东平《火灾》）；有设计破坏佃农的抗租运动失败后请来团丁硬收租谷的何八爷（叶紫《火》）等等。与不能完全割断和封建旧家庭情感联系的二十年代

乡土作家不同，左联作家是将乡绅阶级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来描写的，乡绅阶级的形象塑造体现了作家坚定、鲜明的阶级立场。

左联作家的乡土小说还勾勒了不少革命者的形象，他们启迪民众，组织斗争，是革命的火种。如徐盈《旱》中从“自己种的自己吃，谁也不挨饿”的地方回来的刘永智，沙汀《西孝》里启发农民大闹“得推翻一切”的小学教师，李辉英《万宝山》里从城里来的、向乡民们揭露日本人租用万宝山的真相的大学生李亮平，叶紫的《丰收》中组织农民抗租的癞大哥……对这类人物，作家们不够熟悉，缺少真切的感受，因而都显得苍白无力，有的甚至只是影子而已，就如茅盾批评的“飞将军似的从天而降，到这农村来说教”而已<sup>①</sup>。这类人物的描写成功的不多。

### 三

1932年郑振铎在《新文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中指出，“总括起来说：五四改变了文学的形式，五卅使我们走上应去的道路，九一八则开始了文学的新使命。体裁、内容，均将大有变化。……一个人，假如不是麻木不仁，大约可以感到现在不是伤感的时代了。不是我们追求时代，时代已逼到我们头上来。”左联作家的创作，已不再如五四时期的创作以自叙传的体式描写个人的悲欢离合，他们也逐渐摆脱了“普罗小说”过于理想化的“革命的浪漫谛克”的影响，将眼光投入时代投入社会，以较客观的写实笔调录写历史风云，勾画民众。其中许多创作显示了独特的审美风格：丁玲的炽热粗豪；叶紫的悲愤粗犷；张天翼的泼辣豪放；沙汀的深沉苦涩；肖军的豪爽浑厚；肖红的清逸雄迈……。在土地革命不断深入发展的三十年代，由于左联作家共同的反映革命斗争中最迫切问题的文学观念、历史使命感以及“前卫眼光”与客观精神相结合的新写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倡导，他们的创作已没有五四时期自我小说浓郁的伤感色彩，也没有二十年代乡土文学的悲凉情韵。刘西渭这样评叶紫的小说：“这里什么也不见，只见苦难，和苦难之余的向上的意志，我们不妨借用悲壮两个字形容”<sup>②</sup>，悲壮已成为左联作家乡土小说的主色，在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画、重大事件的场面叙写、“脊梁式”人物性格的刻画诸方面都呈现出以悲壮为主色的总体审美风格。

“左联”作家的乡土小说中较多“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茅盾语）。沙汀笔下沉滞的川北风光；叶紫眼底悲愤的湖南洞庭山水；马子华记忆里的南国僻地山林；周文眼中雄浑的川康边地风雪；萧军小说里有沦陷区荒甸野林中的强悍气息；萧红笔下哈尔滨乡村田野中的“雄迈的胸境”。这些特殊风土的描绘，给作品染上了各具地域特征的乡土色彩。乡土小说中对一些具有古老民族文化色彩的风俗、场景的描绘，更增添了作品的悲壮气氛，如蒋牧良的《旱》、叶紫的《丰收》等作品中对声势浩大的求雨风俗的细节描写，沙汀的《端午节》对失去土地的农民携刀枪“赶韩林”、“游百病”习俗的描画，无不使作品呈现出和这块土地的历史相契合的阳刚之美。

左联作家的乡土小说在着力描写农人们共同对于命运的挣扎时，还常常择取一些重



大事件，以恢宏的场面描写来揭示古老乡村的衰败与骚动、不幸农人的觉醒与反抗。一些着力塑造农民群象的作品，在惊心动魄、气势恢宏的场面描写中，或摄下农人们抗洪抗旱的壮观场景，或再现水旱灾害对乡村的肆虐摧残，或展示陷于绝境的乡民们愤怒的抗争，创造出种种悲壮的氛围（如丁玲的《水》、沙汀的《野火》、夏征农的《萧姑庄》、天虚的《懊伤》）。在他们的笔下，中国沉睡了几千年的乡村苏醒了，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有志气的中国儿女纷纷走上了反抗黑暗社会的道路。种种疾风暴雨式的农民运动场景，怒涛汹涌式的土地革命斗争事件本身就具有悲壮色彩。茅盾的《秋收》和《残冬》、叶紫的《火》、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李辉英的《万宝山》等都再现了一幕幕悲壮的农民运动，而有些作品对农民反抗运动最终失败的结局的描写，更使作品具有悲壮情韵（如马子华《他的子民们》、张天翼《三太爷和桂生》、蒋牧良《高定祥》）。

五四时期，鲁迅曾孜孜于剖析国民性的弱点，塑造了阿Q、闰土等老式中国儿女的形象，三十年代鲁迅小说中出现了大禹、墨子这些中国脊梁式的人物，体现了鲁迅思想的发展。左联作家的乡土小说也刻划了众多的民族脊梁式的人物，他们具有坚毅刚强的性格，或与压迫者、剥削者作殊死的抗争，或为新兴阶级的解放而斗争，这类人物的不幸结局的描写，亦增添了作品的悲壮色彩。如叶紫《向导》中的刘媪妈在子女被屠杀的悲愤中舍身取义，向反动军队复仇；聂绀弩《两条路》中的参加革命工作的桂英遭丈夫出卖而被害；丘东平《通讯员》里沉毅而热情的革命战士林吉因工作失职而自责，饮弹自尽；马子华《沉重的脚》中的彪悍豪侠的老海为盐脚伙们与剥削者斗争的胜利而勇于献身，都回荡着同样悲壮的主旋律。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左联作家的乡土小说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有的作家在强调阶级意识和时代色彩的时候，对笔下的人物有时只注重于阶级性、时代性这共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人物个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然而，正如列宁所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需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sup>⑩</sup>在中国现代小说发展中，“左联”的乡土小说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它不似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注重社会问题、人生哲理的探索而缺少文学形象的描画，也不似浪漫抒情的身边小说注重身边琐事、自我内心的抒写而无意于广阔生活的摄取，左联作家的乡土小说以切近时代的艺术自觉努力关注和反映“全般的社会现象”，以广阔的艺术视野、生动的文学形象、恢宏的社会画面、真实的时代风貌，展现出深广的社会生活和多变的历史风云，不啻是中国三十年代的壮阔史诗。在左联的乡土小说塑造的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中，新一代农民形象的出现丰富了中国现代小说的人物画廊，对四十年代解放区小说创作中小二黑、赵玉林等新型农民典型的塑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五四以来，中国文坛上一直多阴柔之风，少阳刚之气。尽管鲁迅、郭沫若等人一再呼唤“力”的文学，但力的文学的创作始终未成为时代风范。普罗小说追求狂风暴雨般的粗犷力度，但对艺术美的忽略和概念化、标语口号化的倾向，使普罗作品呈现出一种空泛的激情，缺少内在的力度和阳刚之气。而左联作家的乡土小说，

以其悲壮、崇高的美学风范凝结成了三十年代小说的阳刚美。由于左联将文艺的大众化提到了一个突出的地位，左联作家在乡土小说的创作中有意识地朝大众化的方向努力，土语俗语的运用，民风民俗的描写，传统形式的借鉴，浓郁的地方色彩，鲜明的民族特点等等，使在欧风美雨滋润下成长起来的中国现代小说朝民族化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三十年代，除了左联作家以外，王鲁彦、许杰、许钦文、蹇先艾、沈从文、废名等蜚声二十年代的乡土作家继续在乡土的沃野里耕耘，创作出许多颇有影响的乡土佳作；叶圣陶、罗淑、王统照、李劫人、吴组缃等受左翼文学影响的作家也创作了不少引人注目的农村小说，它们与左联作家的乡土小说一起汇成三十年代乡土文学的创作大潮。

① 李欧梵：《论中国现代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3期。

② 转引自《农民文学底再提起》，《质文》1935年第4号。

③ 何家槐：《竹布衫·后记》。

④ 叶紫：《从这庞杂的文坛说到我们这刊物》，《无名文艺旬刊》创刊号。

⑤ 张天翼：《天翼的信·二》，1939年3月《人世间》第1期。

⑥ 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

⑦ 茅盾：《我怎样写〈春蚕〉》。

⑧ 茅盾：《几种纯文艺的刊物》，1933年9月《文学》第1卷第3期。

⑨ 胡风：《忆东平》，《希望》第2卷第3期。

⑩⑪ 《征农文艺创作集·序》。

⑫ 刘西渭：《咀华二集·叶紫的小说》。

⑬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 林贤治《人间鲁迅》漫评

张 华

林贤治的《人间鲁迅》是由三部组成的鲁迅传记巨著。第一部《探索者》出版于1986年9月，第二部《爱与复仇》出版于1989年1月，最后一部《横站的士兵》出版于1990年5月。此书共77万字，是迄今为止最长的鲁迅传记。

关于写这部传记的动机，作者在全书的引言作了这样的表白：

“对于这样一个毕生以文字从事搏战的人，他的形象，其实早由文字本身表达无遗了。世间的纪念物，丝毫也不能为他增添或减损些什么，无非是后人的一种感念而已。如果它所激发的，不是对真理的渴求，不是奔赴生活的勇气和变革现实的热情，而是宗教式膜拜，那么毋宁说：我们什么都不需要！”

“历史人物之所以伟大，正在于我们可以因他而深刻地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在存在方式的选择中间，我们根本不愿拒绝他的灵魂的参与。鲁迅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没有把黄金世界轻易预约给人类，却以燃烧般的生命，成了千千万万追求者的精神的火光。”

这段话异常警辟地阐明了鲁迅在今天的价值所在，这里包含着林贤治对鲁迅的认识和理解，它决定了这部传记的特点。

鲁迅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伟大人物，他的生平业绩早已在群众中广泛传颂，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完整的传记却并不多见。解放前除日人小田岳夫的一本外，似乎只有新知书店（三联书店前身）王士菁的《鲁迅传》问世。五十年代中期，又有朱正的《鲁迅传略》和王士菁经过修改压缩的《鲁迅传》出版。这以后二十多年间，大陆再没有鲁迅传记出现。六十年代有陈白尘等人的电影文学剧本《鲁迅》，但不是严格意义的传记；七十年代又有署名石一歌的《鲁迅传》上册，这是一本为“四人帮”政治需要服务的读物，普遍认为并无学术价值。这时香港出版了两本鲁迅传记，即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和一丁的《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到了八十年代，在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前后，出版了7本鲁迅传，这些传记总结了几十年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鲁迅研究的成果，力图真实而深刻地再现鲁迅光辉伟大的一生。关于这一批传记的综合评述，张梦阳1984年曾撰有专文（题为《论七种新版鲁迅传的新进展》，载《学习与研究》杂志1984年11期），我这里不再赘述。

八十年代中期以来，鲁迅研究的势头逐渐低落，虽然也还不断有新的成果出现，但总的说来没有大的突破性的进展。在这不太景气的年头，竟出现了《人间鲁迅》这一巨著，

它给我们带来什么新的有特色的东西呢？

首先，这本书以翔实丰富的材料忠实地反映出传主的本来面目，又显示出作者对传主的认识和理解，甚至还透露出作者对历史和人生的领悟。作者对传主的生平、经历的事件、接触的人物、思想的变化等等的介绍，大抵都能做到言必有据，确凿可靠；对浩瀚的材料运用和安排，做到结构严谨、段落分明，并且颇具匠心。他不仅对鲁迅的不少作品、生活经历中的一些事件，有自己独到的分析和崭新的看法；而且对鲁迅的全人、传主的思想气质和人格，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领会。《人间鲁迅》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林贤治心目中的鲁迅，是由他敏锐深邃的眼力发掘出来的鲁迅。但这并不是同鲁研界已有定论的基本观点唱反调。我们看到的还是那个我们熟悉的鲁迅，只是他更真实，具有更生动的内心世界，使我们看到了一些以前遗漏的东西，看清了一些以前模糊的东西。

《人间鲁迅》既是文学性传记，又是学术性传记。在介绍鲁迅生平事迹和心灵历程时，作者采取的是文学的描写手法，有铺叙，有形象，文采斐然，有强烈的艺术魅力。但对鲁迅的生平和作品，又有中肯和独到的分析，显示了作者深湛的学力。例如，他对小说《离婚》的分析，认为它带有某种对女师大事件的影射意味，这是前人没说过的话。他又认为这篇小说的影射因素，开了新型讽刺小说《故事新编》的先河，也是令人信服的论断。又如，关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往的研究说，杨杏佛被暗杀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坚持战斗下去。但作者却说：“杨铨死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便告中止。……可见，铁腕政策也不是没有效力的。”作者既肯定了“同盟”的功绩，颂扬了宋庆龄、鲁迅的坚定与无畏，但也采用了宋庆龄的说法，指出同盟确实自此没有活动，说明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也能暂时得逞一时。

《人间鲁迅》既洋溢着诗意，又寄寓着哲理，有极强的感染力。书中随处可见富有哲理的警句，它既是对鲁迅事迹和作品的评价和总结，又往往是作者对历史和人生的思索和领悟。我们不必全部同意他的见解，但它确能发人深省，引导读者到更深更广的领域去思考。如我们上文援引的引言中的一段话，就是一个例子。再譬如冠于每一章之前的题词，都是精心撰写的佳作，既概括了传主这一段生活，又以抒情诗的语言揭示着生活的哲理。例如青少年时代一章的题词：

“他才来到这个世界不久，便被猝然摔落到社会的底层。不幸是一种财富。假如不是太多的屈辱和痛苦构成了坚实的底座，那么，我们很难想像，凭什么可以支承一具伟大而沉郁的天才？”

唐代刘知几认为治史的人必须兼具史识、史学、史才三长。写人物传记也需要这三长。但三者之中我觉得史识尤其难得。司马迁作《史记》，藉史事以舒愤懑，寄托着作者的感慨；罗曼罗兰撰三大英雄传，我们也从中深深感受到他自己的精神风貌和人格力量。林贤治以这些大师为榜样，沿着他们的足迹，在《人间鲁迅》中作出了自己新的尝试。

## 二

鲁迅生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至抗日战争前夕，这是一个充满动荡、发展和变革的时代，是一个民族由旧向新蜕变的大时代。无数的仁人志士、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他们在为民族的现代化摇旗呐喊，推波助澜；也有一些人到了晚年又企图阻挡这一历史进程。《人间鲁迅》将传主置于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上加以考察，把鲁迅放在与各种类型知识分子的复杂关系中比较研究；从而使读者认识到鲁迅伟大的历史意义，认识到鲁迅方向和道路的正确。

要是在承平时代，如果机遇好，鲁迅可以步乃祖的后尘，科举联捷，去作一个或大或小的官；如果机遇不好，他也可能落到新旧台门、周家潦倒子弟们的境地。是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时代抚育了鲁迅。家道的迅速中落，促使他“憎恶这熟悉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传记的第一部，详细地描述了传主在当时有进步意义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感召下，成长为一名思想界战士的历程。第二部和第三部，写鲁迅站在时代的前列，成为影响时代、引导历史前进的人物。传记详尽地介绍了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以及在上海领导左翼文艺运动的卓越功绩。《人间鲁迅》也揭示了传主自我心灵搏斗的艰苦历程，以及自己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步前进的轨迹，同时又着重强调了他思想的一贯性和独特性，以及独立的个性和独立的人格。

传记将鲁迅置于与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从中不仅可以窥见鲁迅道路的独特性和方向的正确性，而且鸟瞰了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鲁迅留学日本时的师友章太炎、许寿裳、钱玄同；新文化运动时的战友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以及两个时期中都有密切关系的二弟周作人，语丝、未名、莽原、狂飙诸社文学青年，创造社、现代评论派；上海时期有瞿秋白，左翼文学青年中的两派：雪峰、柔石、胡风、黄源、周文、萧军、萧红、绉弩与周扬、田汉、夏衍、林默涵；以及林语堂、施蛰存、傅东华、杨邨人等，我们从这众多的代表者中可以认识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全貌，也因而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鲁迅的价值所在。即使是章士钊，林贤治也将他作为知识阶级的一种代表来分析，作者在介绍了他辛亥前的革命经历后说道：“由于权力的无所不至，中国的知识阶级总是试图染指政治。而一旦当政以后，他们的手段，是决不下于纯粹的政客者流的。”这话讲得很有概括性，也发人深思。

## 三

《人间鲁迅》对鲁迅和党及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论述很有特色，引人瞩目。

比起其他的传记来，这本传记关于这方面谈得并不算多，例如鲁迅和茅盾为庆贺长征胜利给党中央的信都没有提及；但我们应该允许每本传记侧重不同的方面。在谈到鲁迅与党和马克思主义关系时，作者一方面强调了鲁迅一贯与党的亲密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诚信仰，另一方面又强调了他作为伟大思想家的独立性。独立思考、独立判断正是马克思主义所需要的，是党所提倡的。



《人间鲁迅》实事求是地指出：共产党刚成立时，对鲁迅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传记谈到，1925年传主作《〈苏俄的文艺论战〉前记》时，已经产生了研究苏联和马克思学说的强烈兴趣（表明这一兴趣的还有1926年所作《〈十二个〉后记》和《〈争自由的波浪〉小引》等），接着林贤治说：鲁迅“思想中固有的阶级论成分，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获得了理性的凝聚和升华，从而更加坚定了斗争的立场和信仰。原来的人道主义，因此而增加了战斗的光辉。对于马克思主义，他主要学习和吸收的是历史唯物论”。然后他又说：“马克思主义决不是融化鲁迅，抹煞鲁迅，只能丰富鲁迅。作为现代中国的一个伟大而独特的思想者，他是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正是在争取劳苦大众的彻底解放这一政治信仰上面，他接受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并使自己原有的整个思想结构得以进行新的调整和改造。”“他完全是以他个人的方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作者强调，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他前期原有思想合理的符合逻辑的发展，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全部抛弃原有思想，而是使自己原有的一些精辟见解在共产主义的光辉照耀下获得新的意义和升华。作者还强调，鲁迅后期思想是他自己从社会实践中探索思考而形成的，不能说是马克思或列宁思想的简单重复，而只能说后期的思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我觉得，作者强调鲁迅思想的一贯性和独特性是很正确的，但作者对鲁迅前后期思想的根本区别却强调不够。

林贤治强调了鲁迅与党的亲密关系。他与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都是《新青年》时代同一阵营的战友，鲁迅在北京时期的不少学生都是共产党员（例如《苏俄的文艺论战》一书的译者任国桢，既是鲁迅的北大学生，又是共产党员）。作者也介绍了鲁迅与瞿秋白、柔石、冯雪峰等人真诚和深挚的友谊，介绍了他与党的领导人李立三的会见，参加了党所领导和影响的一些团体和社会活动。

但是，另一方面，林贤治也以大量的篇幅揭示了鲁迅与左联的部分成员和领导人存在的严重分歧；作者把传记的第三部题为《横站的士兵》，显然是为了突出这一分歧的地位。我想这也形成了这部传记引人注目的一大特点。我觉得，这种分歧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必有意回避。这一问题在当事人之间和研究者中间意见很不相同，还有尖锐的对立。但是，应该允许各种不同意见发表。林贤治是发一家之言，可以引起大家进一步思考和讨论。但林贤治的这一看法，我认为是对的：革命队伍里不良的思想作风，归根到底是旧思想的影响和腐蚀，如鲁迅所说：“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用到新的场合，这些不但于革命毫不相干，相反是可以将革命扼杀的。因此，鲁迅反对这些不良的思想作风，虽然当事人中不少是共产党员，不过这毕竟不是如某些别有用心者所云是和共产党的分歧，甚至反对共产党，而是出于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爱护和拥戴。

#### 四

林贤治的这部传记，同八十年代的几部鲁迅传记一样，对鲁迅的私生活，给予相当的重视；并且在编写时把这些问题处理得比较妥帖，比较客观，接近历史的真实。这也

是该书名为《人间鲁迅》的旨意所在之一罢！

研究者对鲁迅与原配夫人朱安的关系，有相当长一个时期曾讳莫如深。北京鲁迅故居朱安的居室曾标明为鲁迅藏书室。孙伏园的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曾谈到鲁迅的母亲叫朱安为鲁迅做一条棉裤，但被鲁迅扔出来了。但在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的《忆鲁迅》一书中，孙伏园文中的“老太太……叫周太太做了一条棉裤”一句，竟把“叫周太太”四字删掉了，意思变成了鲁迅把他母亲为他做的棉裤扔出来了。现在回想起当年荒诞的行为实在令人不敢置信。近十多年来，鲁迅和朱安的婚姻在所有鲁迅传记中都得到披露。但人们在说到这一不幸婚姻时，大多说是时代使然，甚至归罪于媒人的欺骗等。可是，林贤治在这问题上对鲁迅有所责备：“谁叫你这般的优柔寡断？平时，总是诅咒中国人的忍耐与顺从，而你自己呢？……你是一个十分脆弱的人！”这责备是有些道理的。诚然，20世纪初的中国人，婚姻几乎都是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当时已开始有先觉者（例如秋瑾）走出封建的家庭。而且，鲁迅是在国外留学四年、已经备受天赋人权个性解放等新思想熏陶之后，被母命召回家乡完成旧式婚姻的；那么他对自己性格中的妥协和软弱的一面自有一定的责任。比他大约晚十年到日本留学的郭沫若，则是在故乡老家生活时，无可奈何地缔结封建婚姻的；而一到国外，条件改变了，就背叛了封建婚姻，另结良缘。鲁、郭二人虽然受了包办婚姻之苦，但结婚时的客观条件却是不同的。

鲁迅和二弟作人不和，也是他私生活中的一大事件。对这事过去多用思想不同、立场迥异等说法来解释。他们弟兄二人后来是走上了相反的道路，但在当时思想上并没有严重的分歧，而只是一场家庭纠纷。林贤治对这一事件的评判是很巧妙的，他称这是“一个奇异的谜。”双方至死都没有把谜底揭示出来；但作者以3页的篇幅抒写了事后鲁迅内心的创痛和悲愤：一方面是对戛然而止的兄弟之谊的伤悼；一方面是对那“奢华的女人、虚荣的女人，居心叵测的女人”（羽太信子）的责备。但由于作者用了文学的手法刻画鲁迅的心理，我们无法确定作者在多大程度上把这事归咎于信子。1990年钱理群出版的《周作人传》，关于兄弟失和一事，不同意把一切都归罪于女人，认为这是中国的旧传统，“这里毫无是非曲直可分，只能说是同样美好的人性，同样强大的个性彼此冲突，而不可解脱的悲剧。”我想，通过不同看法的讨论和交锋，将会使人们对这一事件认识得更深刻些。

鲁迅和许广平的婚后生活，是《人间鲁迅》中写得最为精采、最有新意的篇章之一。作者认为，他们婚后的生活是有矛盾和不足的。但作者说得很隐约。1927年末，他们在上海安家后，就面临着许广平是否参加社会工作的问题。作者模拟传主的口气写道：“一个年轻女性，理应出去做事的。……可是果真如此，自己的生活岂不是又要回到从前一个人干的孤境中去？”事实是许广平在鲁迅的请求下牺牲了自己，留在家庭里。接着林贤治问鲁迅：“让她呆在家里不出来，你不觉得太自私了吗？”最后作者自己做结论：这是“人生的怪圈。”一句话不了了之。但这就种下了他们婚后生活矛盾的根。后来作者说到了鲁

许二人婚后的某种隔膜，又谈到许广平作为女性柔弱部分也许太少，使鲁迅在意识和潜意识里得不到满足，并且以鲁迅卧室妆台上放的三幅木刻作论证。（关于这三幅木刻，鲁迅逝世五十周年北京学术讨论会上，美国学者李欧梵曾提及这问题，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但他认为，两人隔膜的最重要原因在于，许广平脱离社会，沉湎于家务，成为爱人和孩子的附庸。作者的结论：“全人类共同的家庭悲剧。”

作者的这些意见，是在肯定鲁许十年家庭生活总的说来是“以沫相濡”后说的，但这些话仍然说得十分大胆而有新意，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不少鲁迅研究的同行们在一起常谈到这个问题，但形诸笔墨似乎还是第一次。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开拓了鲁迅研究的新领域，把人们感兴趣的这一问题提到了日程上来了。

关于本书可讨论的问题还很多，如鲁迅的寂寞和孤独感，也是很值得谈的。至于本书的不足，我觉得个别地方疏于剪裁。例如关于杨树达君的袭来一事，似乎不值得费那么大的篇幅。个别资料，缺乏校正，如施蛰存任国民党书报检查官一事，曾经有过误传，但施先生从未任过这职务，施先生自己和别的研究者都已有辨正。但总的说来，《人间鲁迅》是近几年鲁迅研究的重大收获，它成功地总结了以往的研究成果，又为今后的研究开辟着新的道路和领域。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上接第57页）

- ⑪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壬戌五月。
- ⑫⑬ 《曾文正公奏稿》第12卷第58页、第32卷。
- ⑭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
- ⑮ 《吴佩孚先生集》上册，台湾版，第98页。
- ⑯ 《曾文正公全集·家书》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 ⑰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13—19页。
- ⑱ 《北洋公牍类纂》第16卷第6页。
- ⑲ 北京《晨报》1924年12月12日。
- ⑳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9页。
- ㉑ 王德亮：《曾国藩之民族思想》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73页。
- ㉒ 《曾文正公全集·诗文》第72页。
- ㉓ 罗尔纲：《淮军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页。
- ㉔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4卷。
- ㉕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二）第9509页。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林有能

# 现代专科(翻译)词典的释义系统

——谈王宗炎主编的《英汉应用语言学词典》

陶原珂

一门知识就是一个系统；但是，一部专科词典往往要把知识系统中的一个术语概念作为个体分解出来处理，按其语音或笔划的顺序来排列和解释。术语个体与原知识系统的这一脱节现象，是词典学理应解决的矛盾。

考察国内已出版的12种语言学专科词典可知，有意解决这一矛盾的词典是极少的。其中，《俄汉、汉俄对照语言学名词（初稿）》、《英汉语言学词汇》、《日汉语言学常用词汇手册》、《多词对照语言学词汇》这四种，都是不同语言间的语言学词汇对译，所选词条的学科覆盖面较广，但未能涉及语言学各分支学科中较精细的知识层面，而且没有释目语，不在术语释义词典之列。

《语言学名词（第一辑）》、《语言学名词解释》、《辞海·语言文字分册》试行本和修订稿、《简明语言学词典》这四种均有释目语，但是这些词典（前二种只收了几百条术语）的释义体例，是把每一条术语作为孤立的项目来处理的。例如，《辞海·语言文字分册》所释的“描写句”条：“用来描写人或事物的性质、状态等的句子。谓语部分一般是形容词。如：‘天安门雄伟壮丽’。”《简明语言学词典》所释的“词干”条：“具有词尾屈折变化的词，除去词尾剩下的部分叫做词干。词干部分包括前缀、词根和构词后缀，如俄语‘ученица’（女学生），‘учениц’是词干，‘а’是词尾。词干中‘уче’是词根，‘ниц’是构词后缀。再如英语的‘workers’（工人们）‘worker’是词干，‘-s’是词尾。词干中‘work’是词根，‘-er’是构词后缀。”（注：该词典无“构词后缀”条。）至于“描写句”与“判断句”、“叙述句”等概念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词干”与“派生构词法”（derivation）、“词形屈折”（inflection）等相关概念的联系等等，词典中均无专门的体例提示，从词典的释义系统中难以看清相关的术语之间、以及术语与其所属的知识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虽然，《辞海·语言文字分册》和《简明语言学词典》已考虑到按术语所属的分支学科分为若干大类来编排，如义类词典一样，以检索的体例体现出术语与知识类别的大致归属，但这并不是释义系统的革新。

《实用汉语语法大辞典》和《传统语言学辞典》，都明显有资料汇总、学科概览的特点。其术语部分，并不仅仅是定义和阐释术语，而且还训释术语的出处和含义、排比各

家对术语的解释和用法、统一异名于一称。《实用汉语大词典》反映了上百年来汉语语法研究体系繁多、难以定于一见的现实，使汉语语法研究中各个具体问题的研究进展情况得到了总的检讨。但词典中分设“理论篇”和“术语篇”，名实难符，似无必要。《传统语言学辞典》则尊重汉语传统语言学虽研究日久却向无系统的理论的事实，并不刻意将传统语言学按现代学科的标准加以系统化。虽然这两部词典已考虑到在释目语后提示与所释术语相关的术语条目，以便读者通过参照相关的术语释文，加强对术语的理解和辨析，但其体例的设计并非出于要维系知识系统性的目的。

《语言与语言学词典》和本文要专门介绍的《英汉应用语言学词典》<sup>①</sup>都是语言学专科翻译词典。两相比较，前者比后者多收三分之一词条，覆盖的学科范围稍广一些，倾向于收“各分支学科的主要术语”，而后者则以语言教学方面的术语为主，涉及普通语言学、英语语音学、语法学、词汇学、语义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和语段分析、心理语言学及语言测试等方面，较为精专。虽然这两部词典都设置了“参见”某条和“参考”某人论著的体例，以求打通术语间的联系，为理解术语提供较广的知识背景。但实际上，《语言与语言学词典》贯彻这种编纂意图的体例比较混乱，例如，“GRAMMATICALITY合乎语法性——如果一句话和标准语(Standard language)的惯例相符，就可以说是合乎语法(GRAMMATICAL)的。按照传统的提法，这意味着对什么可认为是恰当的(参看Correctness〔正确性〕)作出判断，但最近才设计出一些检验方法来推导实际用法的规则模式和变异模式。一些语言学家将合乎语法这个概念仅限为指那些语言惯例，即通过语法的规则(Rule)‘生成的’、即说明其特点的语言的惯例。这样，象Colou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无色的、绿色的思想狂暴地睡着)这样的句子从语法上说可以认为是结构完善的，尽管从语义内容的观点看很难说它有什么意义。参看Acceptability(可接受性)。可替换术语：grammaticalness(合乎语法)”。又如，“DOUBLET双式词——一种语言中，在词源、词形或词义上相似的一对词项。词源双式词(ETYMOLOGICAL DOUBLETS)系由同一个词最后派生出来的，如wine(酒)/vine(葡萄树)或warden(看守人)/guard(警卫)。选用形态双式词(MORPHOLOGICAL DOUBLET)还是句法双式词(SYNTACTICAL DOUBLET)，则取决于语言环境或词在句子中的功能，如a/an或shall/will。(4.1, 5.1, 6.1)”从前一例可以看到，“参看”这一标记既用来提示与该条目相关的另一术语，也用来提示与释目语中出现的某一词语相关的另一条目，这样，当释目语中需要提示的某一词语位于整段释目语的末尾时，这一标记究竟是提示这一词语还是整个条目，就不太明确。释目语中出现的全大写英文词和以大写字母开头的小写英文词，这两种标记分工不明。释目语提及一些知识背景时亦含糊其辞，如说“传统的提法”而不是“传统语法的提法”，说“一些语言学家”而不确指为“转换生成语法学家”等等。从后一例可以看到，后两个大写英文词标记的术语“形态双式词”和“句法双式词”被用来解释释目语，但是这两个术语本身在该词典中却有条目而无释目语，按体例(如“MORPHO-



LOGICAL DOUBLET形态双式词——见Doublet双式词”)它们是属于在“更全面的词条”解释之列的。象这样一些具体术语在《语言与语言学词典》往往得不到必要的解释或解释过简。再者,后一例末尾的数字提示书后所录关于音系学的一般性入门书、教科书,词汇学和语义学的一般性入门书、教科书,历史语言学与比较语言学的一般性入门书、教科书共18种,却并不指出从哪种文献可查到关于该词条的代表性意见。其提示因所指过于宽泛而形同虚设。相比之下,《英汉应用语言学词典》具有较完善的释义系统和较精深的学术价值。

要释义,首先要立名。专科词典收集和解释的主要对象是专业术语,翻译术语的目的则在于引进概念,绝不是机械地对译词语可以了事的。王宗炎先生在《关于译名的三个问题》一文(载《外语教学与研究》1987年第4期)曾提出词典译名的6条标准:通用、准确、明白、简洁、有系统性、有区别性。这也是《英汉应用语言学词典》译名的准则。这六条标准与引进概念的要求相适应,使整部词典的译名呈现出三个较明显的特点。一、以汉语的语义结构规律为准绳,消除通用译名中的歧义结构。例如,interpretive semantics译为“解释派语义学”,而不是“解释语义学”,以免误解为“动+名”的结构;error analysis译为“误差分析”而不是“错误分析”,以免误解为“形+名”的结构。二、以原文术语所指的概念内涵为移译的对象,不拘泥于词语的对译,使译名的词义与概念义更为切近。例如,field theory译作“语义场论”,而不是“场论”,以明确术语所属的概念系统;interactive process译作“人机对话过程”,而不是“相互作用过程”,以明了概念的实际所指;alliteration译作“双声”而不是“头韵”,使之能与已有的概念系统相参照,等等,人们根据术语译文的语素组合即能大体明白术语所指的概念内容。三、概念的译名仍维系着术语移译的方寸,并不单纯根据概念设名,亦兼顾翻译词典中术语的系统性与区别性的关系。如communicative interference、communicative approach和communicative testing分别设名为“语言交际干扰”、“交际派教学法”和“交际能力测验”,使术语词组的构成词的词义(communicative交际)在聚合系统中有统一的交待,在组合成具体术语所指的概念义上又显出区别性(“语言交际”、“交际派”、“交际能力”等)。而对于实为同一概念的enabling skills、micro-skills和parts skills,虽然分别译作“实现技能”、“微技能”和“局部技能”,以便照顾到词义在聚合上的系统性,其释义却只见于一条术语(微技能)之下,以明确主要引进和解释的是概念而非术语这一宗旨。对于概念相同、原文语素义相近或相同的不同术语,则以相同的译名译出,如false cognate和faux amis同译为“假同源词”,indignization与nativization同译作“当地化、土语化”,等等。《英汉应用语言学词典》在处理不同语言之间术语的语义结构和概念间的移译关系方面做了很有意义的尝试。

一个概念的诸异名统一在一个术语下释义的体例,是理顺异名之间的概念关系的有效方式,其中亦体现着专科翻译词典引进概念(而非术语)的宗旨。虽然《语言与语言学词典》和《英汉应用语言学词典》都有这种体例,但前者的疏误较多。例如,lexeme和

lexical item这两个术语在《语言与语言学词典》和《英汉应用语言学词典》都分别译作“词位”和“词项”，但在《语言与语言学词典》这两条术语下都有释义：“Lexeme词汇单位、词位——一些语言学家给语言词汇的基本单位起的名称。词位和词素这样的语法单位和义素这样的语义单位相对”；“Lexical item词项——指语言词汇的单位，如词典中列出的词、短语或词项。它们通常具有可以读出或文字的形式，在句子中起一种语法作用，并具有语义”。两条定义相近（但并未明示两条术语所指概念相同），解释部分却各执一端，因而都没能解释清楚。《英汉应用语言学词典》则明确指出“Lexical item词项”是“Lexeme的另一种说法”，只在“Lexeme词位”条下加定义：“指语言意义系统中有区别性的最小单位。词位是一种抽象单位，在实际口语或书面语句子中，它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即使有几个不同的屈折形式或包括几个单词，也仍然只构成一个词位（见INFLECTION）。例如，在英语中，go, goes, went, gone, going这些屈折形式都属于同一个词位——go。又如，象break in, make up, the stick and the carrot, fish in trouble waters, paper cut这些短语，虽包含几个单词，然而每一个短语都只是一个单独的词位。在词典中，每一个词位都得作为一个单独的词条或次词条来处理。”这里以概念统辖异名，澄清了术语的混乱，其释目语综合了《语言与语言学词典》那两条释目语各执一端的意见，又附有实例，释义十分明了。术语异名的产生，往往是因为对概念所指的描述角度不同引起的，依概念所指来确定释目语的设立的这种体例，还可以因其所指相同而把“低元音”看作“开元音”的另一说法，把“高元音”看作“闭元音”的另一说法，并指出它们两两的区别只在于对元音划分法的不同，使术语与其概念的概括性和区别性有机地联系起来。

词典定义和解释术语概念的方式，是由读者的文化背景和知识需求决定的。在国外语言学的发展日新月异，不少术语连词典编纂者那样的学者乍一看都觉得“说不懂好象懂一点，说懂却又闹不清”的情形下，《英汉应用语言学词典》本着“为中国读者服务”的第一编写原则，有意用浅白的汉语讲解“外国学者所讲的理论”，避免用术语解释术语，举例基本选自英、汉语言，对原著的大部分释例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并加插了不少图示。对原著释目语的补充修订，也使词典具有了更精深的学术品位，例如，“information structure●信息结构——〔这是布拉格学派的术语，〕指运用词序、语调、重音和其他手段来表明一句话所传达的信息内容应该如何理解。方式如下：（a）要表明在整个信息中，哪些部分说话者假定对方已知，哪些部分是新信息，〔即区分主位（THEME）和述位（RHEME）〕；（b）用对比方法来显示重要性。如果重读哪个词，那个词就显得重要。例如……”其中，方括号（笔者所加）内的两句话就是编者补充的。前一句点明该术语的出处，意味着这是一种学术观点，以下的定义和解释亦体现着“词典的任务是提供资料，不是宣读判词”，而是客观介绍的词典编纂思想；后一句则发掘了原文释目未尽明了之义，读者如对“主位”和“述位”之说了解尚少，可以循着这两个术语的提示标记“THEME”和“RHEME”，在词典中找到 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功能句法观），进一

步深入了解“信息结构”的语言构成。编者对原著的修订以至改写之功，此例可见一斑。为了使读者能顺利、深入和系统地理解词典中的术语概念，编者沿用并进一步完善了原著的释义体例，有意贯彻一种系统的观念，沟通术语概念上下左右之间的联系，引导、甚至“强迫”读者在相关的知识和概念的系统中去理解一个术语。这种体例具体体现为释目语中无标记的大写英文术语和以“见”、“参见”等为标记的条目提示方式。其中，前者是为了便于直接检索释目语中出现、并已收入该词典的术语而设的，这是许多专科词典都采用的方式；后两者的用意则较复杂。

以“见”为标记的条目提示方式用于两种情况：一、提示对释目语中出现的某句话或某个术语有进一步阐释发微意义的另一条术语，例如，“Prague school 布拉格学派”条的释目语提到导源于布拉格学派的一种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语法形式与语音之间的关系”，随即以“见MORPHOPHONEMICS”（形态音位学）提示与此研究思路相关的另一条目，读者循此可查阅到进一步深入理解“布拉格学派”这条释目语所旁涉的知识。这实为一种分层的深度释义体例。二、在一条术语概念下不设释目语的时候，“见”提示该条目的解释见于与此条并列（对立）的或上一级的另一术语概念条下，例如，“semantic memory 语义性记忆”条下记“见EPISODIC MEMORY”（情节性记忆），在对比中解释和辨析两个概念，其释义相得益彰。又如，“Peak (of a syllable) 音节峰”条下记“见SYLLABLE”（音节），而在“音节”条下解释了“开音节”、“闭音节”、“音节头”、“音节峰”（音节核）、“音节尾”、“成音音节”和“非成音音节”等七八个下属概念，在一个术语条下集中解释一束相关的术语概念，这是《英汉应用语言学词典》释义方式的一大特色。

这种维系概念体系性的释义关系，在“参见”的体例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和充分。“参见”这种提示标记设在释目语之后时，为该术语的全部释目语提供释义的补充条目的信息。“参见”所示的条目与原术语之间的概念关系比“见”所提示的更为复杂，不但有并列的或对立的关系，还有同时参见多种关系的；不但提示上一层的概念，也提示下属的概念。例如，“Prefix 前缀”的释目语下记“参见AFFIX”（词缀），“词缀”的释目语后记“参见COMBINING FORM”（结合形式），“结合形式”的释目语后又记“参见WORD FORMATION”（构词法）。这一连串“参见”沟通着上、下层概念间的联系，而且所参见的每条术语的释目语中，均出现并解释同一层级的一束概念，沟通着概念的左右联系。又如，“sociology of language 语言的社会学研究”的释目语后记“参见language Planning（语言规划）、language maintenance（语言保持）、language shift（语言转移）”三个下属概念，三项都是语言的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但“语言保持”与其条后所记“参见”的diglossia（双语现象）、language shift（语言转移）、language

（下转第80页）

## 推理的分类及其标准质疑

王经伦

在国内一些形式逻辑的教科书和通俗读物中，以思维进程为标准，把所有的推理分为演绎、归纳和类比三类，然后分别把直言三段论、假言、选言、联言、关系和模态等推理整体地、不加区别地塞进这三种类别中，造成了“以偏概全”、“子项相容”等错误，在逻辑体系中出现了不合理的怪现象。从形式逻辑的科学性出发，有必要对这种分类及标准提出质疑。

问题要从演绎推理的内涵和外延谈起。何谓演绎推理？“演绎推理是从一般（普遍）到个别（特殊）的推理，即以一般性知识为前提，推出个别性知识为结论的推理”。哪些是演绎推理？“直接推理、直言三段论、假言、选言、联言、关系、模态等推理都属于演绎推理”。在部分形式逻辑的教科书和通俗读物中，是这样规定演绎推理的内涵和外延的。按照这种观点，演绎推理是全称量项，即是指所有的演绎推理，包括直接推理和直言三段论等都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笔者不禁要问：从属于演绎推理的所有推理果真都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吗？通过对它们逐一分析后，可得出否定的答案。

先看直言三段论。直言三段论是依据“凡对一类事物有所肯定，则对该类事物中的任一分子也有所肯定；凡对一类事

物有所否定，则对该类事物中的任一分子也有所否定”的公理建立起来的，它集中体现了演绎推理从一般到个别的含义，可谓是演绎推理的典型形式了。然而，在直言三段论的二十四个正确推理式中，却有五个是从一般到一般的推理式：第一格的AAA式和EAE式、第二格的AEE式和EAE式以及第四格的AEE式；此外还有三个是从个别到个别的推理式：第三格的IAI式和OAO式、第四格的IAI。这就是说，在直言三段论的全部正确推理式中竟有三分之一并非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

然后看直接推理。直接推理分判断变形的和对当关系的两种，在前一种直接推理中，是分别通过改变原判断联项的性质、主谓项的位置、同时改变联项的性质和主谓项的位置而进行的，它所揭示的是作为推理前提的原判断与作为推理结论的新判断之间在性质、主谓项位置和量项上的区别。至于在量项上的区别，除了揭示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外，还同时揭示了一般与一般、个别与个别的关系。因此，在判断变形的直接推理的十个正确推理式中，仅有换位法的SAP $\vdash$ PIS和换质位法的SEP $\vdash$  $\bar{PIS}$ 两式能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一般到个别的含义，而其余五分之四的正确推理式的内涵超出了演绎推理内涵的规定。

对当关系的直接推理是在A、E、I、O四种直言判断之间进行的。其中，反映A与E之间具有的对立关系的直接推理，体现的是从一般到一般的思维进程；反映I与O之间具有的下反对关系的直接推理，表征的是从个别到个别思维进程；即使在反映A与O、E与I之间的矛盾关系以及A与I、E与O之间的从属关系的直接推理中，除了体现从一般到个别的思维进程外，同时还体现了与其相反的从个别到一般的思维进程。在对当关系直接推理的二十四个推理式中，有十六个并非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式，竟占全部推理式的三分之二。

以上列举的情况表明：之所以把直言三段论和直接推理归结为演绎推理，是由于把这两种推理的部分推理式具有从一般到个别的思维进程扩展为所有的推理式都具有该进程所造成的，犯的正是“以偏概全”的错误。换言之，这一归结是逻辑错误的产物。

能否在不改变演绎推理这一概念的前提下消除错误呢？唯一可“尝试”的办法是摒弃直言三段论和直接推理中除一般到个别思维进程之外的推理内容及形式，这可使其内涵与演绎推理的内涵相一致，然而这是削足适履，使人难以接受。

再看假言、选言、联言、关系和模态推理。假言推理是关于原因与结果的推理，它是推论思维对象的一因一果和多因一果等因果联系的；选言推理是关于可能性的推理，它是从思维对象若干可能情况中推知一种乃至多种确实存在情况的；联言推理是有关共存性、相容性的推理，用以推断思维对象中多种同时存在的属性，

或根据多种同时存在的属性，确实地推出某一属性的；关系推理是推知对象的对称性和传递性等关系的推理；而模态推理则是推断对象的必然性和或然性等的推理……可见，这些推理的内涵与“一般到个别”并无直接的联系，硬要用演绎推理概括它们，确实牵强附会。

那么，为什么又有同志用演绎推理概括它们呢？“理由”之一是把这被概括的推理与归纳、类比区别开来，以便对所有的推理分门别类。这种“理由”是建立在所有的推理都与思维进程有联系这一前提下的。问题在于：第一，有的推理跟思维进程没有联系，如上述的假言推理等就是。根据分类（即划分）的基本要求，当分出来的子项同时具有该种属性，并且以其作为分类标准的时候，分类才能成立。显然，以思维进程为标准区分出演绎、归纳和类比的分类过程是违反了分类的这一基本要求的，至于它能否成立这是不言而喻的了。第二，在直言三段论和直接推理中，包含了从一般到个别、从一般到一般、从个别到一般和从个别到个别各种不同思维进程的推理式，而把它们归结为演绎推理，是违反分类规则的。分类的其中一条规则规定：分出来的子项必须相互排斥，即各子项的外延是不相容的并列关系。根据这一规则，从属于演绎推理的全部推理式只能体现从一般到个别的思维进程，而不能夹杂其他思维进程的推理式。只有这样，才能与体现从个别到一般思维进程的归纳推理和体现从个别到个别思维进程的类比推理区别开来。而它恰恰违反了这一规则，犯了“子项相容”的分类错误。这样，即使在思维进程这一范围内，也不



能把各种不同类型的推理真正区分开来，更不可能达到科学的推理分类目的了。

“理由”之二：从一般到个别是直言三段论等推理的本质属性，是归纳和类比推理所没有的，用演绎推理概括直言三段论等，能从本质上区别于归纳和类比。乍听起来，这话似乎符合认识论：具体的推理形式、公式百多种，对于它们之间颇多的相同和相异之点，如果不是从本质上把握，岂能达到认识的目的？可是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前提：人们在把握思维对象的本质或本质属性时，是不能违背逻辑基本常识的，否则不能真正达到认识的目的。上述观点只能引导人们认识直言三段论等推理中带有从一般到个别思维进程的推理的本质，充其量也只是认识了部分的本质，而不能从整体上把握直言三段论等的本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难以断言它全面地、正确地达到了认识的目的。

除了在演绎推理中存在着属概念内涵与种概念、即具体推理的内涵不一致的错误外，在类比推理中同样存在着类似的错误：有些类比推理是从一般到一般的，而并非象其属概念内涵所规定的都是从个别到个别的推理。例如：

凡动物的机体中都有细胞和细胞核；

凡动物的机体中都有细胞；

所以，凡动物的肌体中都有细胞核。

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形式真实内容正确的推理。然而，它从前提到结论都是一般性的判断。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得出结论：演绎推理及与其相对应的归纳和类比推理是以思维进程作为分类标准而区分出来的推理种类，无论是演绎还是类比推理，都不能全

面地、正确地概括从属于它们的所有推理形式。因此，不能以思维进程作为推理的分类标准。我们不妨把推理直接分为直言三段论、假言、选言、联言、关系、模态、归纳和类比推理等种类，尽管这种分类较为零碎，但不违背逻辑常识。同时，有利于哲学和辩证逻辑从方法上概括推理问题。

不以思维进程作为推理分类标准的思想起源于亚里士多德。亚氏在他的逻辑著作《工具论》中指出，推理有“从部分到全体的推理”、“从全体到部分的推理”和“从部分到部分的推理”（参见《李匡武译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4页），并且进一步指出“归纳法是从个别到普遍的一个过程”（同上书，第277页），例证（我们今天称之为类比）是“从部分到部分的推理”。这说明亚氏在创立形式逻辑时就已经充分注意到推理中不同的思维进程问题了。但他并没有由此把推理分为演绎（尽管他已使用该概念）、归纳和例证三大类，而是把所有的推理都纳入三段论的范畴，认为归纳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三段论过程，而例证则是由不完全归纳和三段论构成的。在此基础上，先后从认识论、本体论的角度对三段论进行了分类。虽然后人没有接受亚氏的分类思想，但他不以思维进程作为分类标准的思想却是耐人寻味的。

当代数理逻辑学家对推理分类的处理方法是值得吸取的。由于推理的思维进程问题繁琐，同时又不是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当代数理逻辑学家们干脆回避了它，直接把各种推理化为公式，然后分出永真公式、永假公式和可满足公式。虽然仍有

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之别，但再也不是在思维进程的意义上使用它们了，而是指推理的前提与结论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同时，演绎和归纳逻辑都是以寻求永真公式为目的。尽管形式逻辑不研究推理的永真、永假和可满足公式，但是，数理逻辑学家不纠缠枝节问题，把精力集中在关键问题上，以便更好地揭示推理的逻辑实质的处理方法，却是值得形式逻辑工作者们吸取的。

有必要说明的是，笔者并不反对在逻辑方法的范畴内谈推理的思维进程问题。在哲学的和辩证逻辑的教科书中，往往有“演绎与归纳的方法”或“演绎与归纳相结

合的方法”一说，即使在思维进程的意义上使用它们，无论过去、现在乃至将来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这是因为逻辑方法是对某些逻辑问题在方法上进行概括而形成的，推理中确实存在着从一般到个别和从个别到一般等不同的思维进程，从逻辑方法上概括它们，相应地形成了演绎的方法和归纳的方法，这是无可非议的，它与推理的分类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其区别在于：逻辑方法的形成不受分类规则和要求的约束。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院哲学所  
责任编辑：冯生



## “均露均霜”应作何解

王双怀

在武则天的《石淙》诗中，有“均露均霜”一语。郭沫若先生从肯定均田制的观点出发，认为这是歌颂均田制的，是武则天保护均田制的根据（《我怎样写〈武则天〉？》《光明日报》1962年7月8日）。黄永年先生则从否定均田制的角度说：这均露均霜只是即景成文，与田之均否略无关系（《评郭沫若同志的武则天研究》，《陕西师大学报》1980年第3期）。究竟“均露均霜”是什么意思？惜二位先生未作深论。

我认为“均露均霜”确实没有歌颂均田制的意思。一、据《全唐文》卷97《夏日游石淙诗序》记载，武则天写《石淙》诗，完全是为了赞美石淙一带的自然形胜。二、从当时群臣所写的应制诗来看，也没有歌颂均田制。如果武则天真有歌颂均田制的意思，他们是绝不会回避这个问题的。

“均露均霜”其实是借用了古人描写洛阳一带形胜的词汇。洛阳一带古称为“土中”、“中州”、“中脛”（《尚书·召诰》、《灵宪》、《论衡》），被认为是“天心地胆之中，阴阳风气之会，四通八达之所，声名文物之区”（陈心传《清圃税疏》）。如隋炀帝《建都诏》云：“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水陆通，贡赋等。”唐高宗《改洛阳为东都诏》云：洛阳“心兹宇宙，通赋贡于四方；交乎风雨，均朝宗于万国”。《幸东都诏》亦云：东都为“交风奥壤，测景神州，职贡所均，水陆辐凑”。武则天在《以郑汴等州为王畿制》中也曾经说过：洛阳“五方入贡，兼水陆之骏奔；六气运行，均霜露而调序”。嵩山地近洛阳，亦可说是天下的中心。所谓“嵩维中岳，洛阳下都，三台崛起，五衡相映，风雨交会，实惟天地之中”。故《石淙》诗借以描写嵩山一带的自然特点，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

## 乡镇企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关键

——广东省澄海县发展乡镇企业的思考

邹培基

澄海县乡镇企业在治理整顿中，从县情实际出发，以管理求效益，以效益求发展，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中心来抓。1990年，乡镇工业企业产值6.02亿元，比1989年增长16.01%。他们的成功经验是：

一、弄清县情是制定乡镇企业发展战略的前提。澄海县地处韩江下游，人多地少，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800人，人均耕地为0.2—0.3亩，农村剩余劳力多，过去以农业为主体。但该县发展乡镇企业有如下有利条件：1. 基础设施较好，地处沿海经济开发区，地理位置优越。2. 农业基础好，是“吨谷县”，文化素质高。3. 劳力资源丰富，商品经济意识较浓。4. 传统的加工基础好，抽纱、食品、塑料、小五金加工有一定历史。5. 侨胞众多，全县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54万人，是著名侨乡。同时，也存在制约其发展的因素：1. 能源交通紧张。主要靠水电，每年枯水期常要停电、压电，没有铁路运输，码头吞吐量少。2. 原有工业基础薄弱，技术水平不高，原材料匮乏，设备陈旧。3. 资金短缺，地方经济实力较差。

根据上述县情，澄海县委、县政府提出了“以工业为主体，以农业为依托，建设外向型基地式经济体系”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并把发展乡镇企业提高到是发展农村经济，也是农民共同富裕必由之路的高度，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在制订优惠政策的基础上，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为乡镇企业创造一个适应其生存的环境，充分发挥乡镇企业灵活多变机制，积极发展“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加快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坚持走集体经济和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发展道路。

二、认识县情是乡镇企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关键。在正确认识县情的基础上，用经济建设指导方针来引导乡镇企业，根据国家特定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来调节企业的生产，使乡镇企业保持适度增长，防止大起大落和滑坡现象。澄海县坚持以集体经济为基础，以镇办工业为重点，狠抓骨干企业和拳头产品，加强企业的管理。在国家实行治理整顿，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情况下，采取有效措施，服从宏观调控，及时调整产品结构，走内涵发展为主的道路。他们的做法是：

1. 以管理求效益，重视职工素质的提高。首先，重点抓乡镇企业产品上等级、上水平及推行标准化工作，加强质量管理、财务管理，落实各项责任制。注意智力投资，

1989年—1990年参加各类培训职工达2300人。其次，挖潜节流，开源节流。针对乡镇企业面临原材料涨价、资金短缺、能源不足等问题，完善各项制度。如县五金工具总厂的“总厂（科室）——分厂——车间”分级承包制度，实行定额、定价、定能耗，奖优罚劣，提高了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再次，开展技术改造，推动科技进步。1985—1989年全县通过技术改造创新，新增创汇1000万美元，新增税利1100万元。

2. 以效益求发展，抓骨干企业和重点产品，形成六大门类企业。澄海县注意选择规模较大，竞争力强的企业，发展前景好的项目，适销对路，效益好的产品为重点，集中人财物和技术力量重点扶持。1990年上半年，乡镇局重点扶持的十家重点企业产值5589万元，净增产值2257万元，占上半年全县乡镇企业净增产值的80%。根据原材料、能源紧缺的县情，从行业、产品结构对乡镇企业进行调整，向“外向型”、“基地式”发展，初步形成以五金工具、食品、塑料化工、纺织服装、工艺抽纱、南金六大门类为主体的工业体系。

3. 发挥四大优势，引导乡镇企业向外向型发展。一是农副产品资源优势，发展外向型食品加工业。东民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加工凉果出口，1989年创汇300多万美元，凉果出口量为汕头市一半。二是发挥侨乡优势，发展以毛织服装加工为主体的“三来一补”企业。三是产品优势，有主有次发展外贸出口产品，以小五金、南金、抽纱、凉果为主，日用品、工艺品为辅。至1989年底，全县有84家乡镇企业产品出口，创汇2000多万美元。四是人力资源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乡镇企业。

4. 从“小”入手，以质取胜，提高产品适应能力。从小商品、小配件入手，当大企业配角。如许多乡镇企业瞄准国内摩托车发展趋势，发展摩托车配件生产，现有这类企业50多家，年产值3060万元，成为全国摩托车配件生产基地。

5. 集中力量抓集体经济，保持四轮齐驱格局，以镇办工业为重点的集体经济得到健康发展，1990年，镇办工业产值达21774.23万元，比上年增长12.05%。

由于从县情实际出发，澄海县乡镇企业得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在县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促进“以工业为主体，以农业为依托”发展战略的实现，解决了剩余劳力出路，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也为农业县发展乡镇企业提供了借鉴。

三、从县情出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在发挥地方优势同时，还必须抓住机遇，抓住发展机会。80年代初，澄海的录音机磁头已为不少厂家产品配套，但未能抓住机遇发展，这些产品终被淘汰。教训是深刻的。治理整顿是乡镇企业发展的机遇，抓住机遇，及时调整产品、产业结构，才能有更大发展，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从澄海县情况看，发展乡镇企业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1. 县情实际与战略眼光的关系。资源固然是制约乡镇企业发展因素，但不是绝对的。资源匮乏的日本战后经济腾飞，在于瞄准市场需求，推动科技进步。因此，发展乡镇企业必须跳出地方圈子，制订中长期发展战略，贯彻效率、效益和量力而行原则，引导乡镇企业向“市场型”过渡，以满足市场需求为中心和出发点，“以需定产”、“以销定

产”，根据市场需求，开发适销对路的新产品，才能扬长避短，取得较大效益。如澄海东民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根据市场需求新开发“康康”系列产品，1990年新增产值350万元。

2. 管理、效益、发展的关系。必须以管理求效益，以效益求发展。管理就是效益。尤其要调整生产结构（包括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经济组织结构），加强人财物、技术、质量管理，严格财经纪律、劳动纪律，健全监督制度，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抓好“三上两创一提高”，即上质量、上技术、上管理，创优创汇，提高经济效益。积极采用“四新”：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包装。首先，努力形成有生产、经营、科研、设计等部门参加的企业集团，以县属企业牵头，形成以集团为中心的辐射网络，以提高竞争力，适应乡镇企业向外向型发展。其次，在保持传统优势产品的同时，逐步减少中低档产品生产，以市场为导向，向开发新产品要效益。第三，与科研部门合作，利用技术、信息，把科技进步作为发展乡镇企业重要途径来抓，建立乡镇企业科技进步指标考核体系。（包括：技术装备水平指标、产品水平指标、职工队伍素质水平指标、企业管理科学化指标、技术改造指标。）

3. 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是企业的中心，而只有保持适度增长才有利于效益的提高。乡镇企业的发展必须形成规模经营，又必须防止出现“一窝蜂”的情况，追求攀比速度必会导致经济过热，最终导致效益的降低。因此，必须加强调控，以市场为导向，以用户需求为出发点，以县情为依据，适度增长，适时发展，防止“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才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促使乡镇企业持续、稳定、协调、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广东省委党校经济专业89级  
责任编辑：林有能

（上接第115页）

厂为了生产发展的需要，本拟进口十台风扇定子自动双头绕线机，经过对日本、台湾、省内三地产品比较，发现省内改制的产品的性能、质量和效率等方面，均达到进口同类产品的70%至80%以上，而其售价仅是进口的十几分之一。于是，我们取消了原来准备进口的打算，采用了国内替

代设备，节约了外汇15万美元。1990年，我们还自己动手，完成了总装配车间的技改，改革了关键生产线的布局，使生产能力翻了一番，比引进国外的同类设备节省150多万元。

作者单位：顺德北滘南方电器厂  
责任编辑：林有能



# 对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思考

周耀文

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武装职工，教育、引导他们认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根本利益，并团结起来为完成和实现这些历史责任和根本利益而奋斗。然而，由于在前些年一手硬、一手软的氛围中，严重忽视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一度给干部、职工造成思想上混乱。不少政工干部对新形势下如何搞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颇感迷惑和苦恼。职工思想政治素质下降，影响了积极性的发挥和企业的生产和效益。这种状况已引起各级党政部门的关注。1990年5月18日李瑞环同志在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第六次年会上作了《关于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的重要讲话。他高度评价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为企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方向。他说：“所有企业的领导者和政工干部，在分析经济形势、解决经济问题时，都要从政治上看问题，从人的积极性上看问题，而不能就经济谈经济，见物不见人。只有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把协调关系、理顺情绪的工作放在应有的位置上，把职工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并合理地发挥出去，我们才能较好地解决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实现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当前，由于党中央的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宏观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这不但是对广大政工干部的鼓舞和鞭策，而且也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认为，要加强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关键的是做好以下几件工作。

## 一、从思想上提高对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

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一个企业的兴衰成败，不仅要看企业经营者营销策略和决策水平，看企业有没有生命力和竞争力，而更重要的是，看企业内部职工的积极性是否充分调动起来。这是因为，社会主义企业的职工是生产资料的生产者，是企业的主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通过启发职工的这种意识，使其认识自身利益与企业利益的依存关系，促使职工想方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经济效益和职工个人的收入。调动企业职工的生产积极性的方法很多，而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重视精神鼓励，不断提高广大职工的思想觉悟，是调动职工积极性的生动而有效的方法，也是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传家宝。对这点，我们的理解尤为深刻。我们肇庆啤酒厂，是省级先进企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我厂生产不断发展，效益不断提高，职工的收入也较可观，在当地是中等以上的水平。但是，1989年“六四风波”后，啤酒

市场疲软、产品积压、资金紧缺，工厂开工很不正常，停停打打，效益下降，职工的经济收入明显减少，不少职工的思想颇为混乱，情绪低落。在这严峻的形势下，厂党委和厂部经认真研究，一致认为，要渡过难关，首先要动员群众、依靠群众，提高广大职工的认识，增强职工的信心。我们通过职工代表会、车间、班组骨干会、全厂职工大会等渠道，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全体职工进行了形势教育、国情教育，引导大家加深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客观看待企业出现的暂时困难，号召大家集思广益，为企业走出困境献计献策。经全体职工讨论，我们制定了“认清形势、统一思想、拓展市场、搞活流通、狠抓管理、降耗保质、夺取效益、共渡难关”的三十二字方针和具体落实措施。通过这些认真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全厂职工思想稳定、情绪饱满，生产很快就扭转了被动局面。

## 二、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建立一个全方位的综合管理体系。

企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培养一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工人阶级队伍，确保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要实现这一目的，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应建立一个以经济工作为中心，以培养造就“四有”人才为宗旨，坚持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同时并举，以党委为核心、行政干部为主体、专职政工干部为骨干、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为基础的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体系的新格局。近年来，我厂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在党委的领导下，行政、工会、共青团各组织互相配合，把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的生产、经营结合起来，同时部署、检查、落实的。党委、工会、共青团的领导坚持参加生产经营会议，行政领导坚持参加思想政治工作分析会，他们还经常下到生产第一线，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和职工思想动态的反映，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及时性和灵活性，收到较好的效果。1990年7月份是生产的旺季，瓶装啤酒销售量超历史水平，产品供不应求。为了满足客户的需要，厂领导决定将包装车间的二班作业改为三班作业。党委、工会、共青团组织主动配合做职工的动员工作，还采取了各种措施，解决了职工的实际困难，免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保证了生产的顺利进行，增加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 三、从组织上落实一支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

要真正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功能和引导功能，建立一支专业政工队伍和业余骨干队伍是很有必要的。应该结合企业的实际，建立具体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办事机构，落实专职政工人员，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同时，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支业余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骨干队伍。思想政治工作，光靠少数专职的干部是远远不够的。从企业来讲，管理范围广，部门层次多，车间是核算单位，班组是生产管理的基础。日常的各种思想都是由下面反映上来的，大量的思想工作都要在下面解决。有了一支业余的骨干队伍，就能更好地做好这方面工作。我们厂就是以各车间党支部为核心，以班组为基础，建立起以班组长、党小组长、工会、团小组长组成的班组核心小组，这样一支业余的思想政治工作骨干队伍，去开展工作，取得了很好效果。由于这支队伍长期工作在生产

第一线，生活在群众之中，最熟悉职工情况，了解他们的思想。由他们去做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准确地掌握职工的思想脉搏，迅速、准确地解决职工的思想问题。

当然，这支骨干队伍水平高低直接影响思想政治工作的质量。因此，我们要在落实队伍的同时，着眼提高他们的素质，培养一支过硬的有战斗力、说服力、吸引力的骨干队伍。近一年来，我们举办了四期骨干培训班，有100多人参加，我们组织他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管理技术知识。通过学习，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不断提高。可以预料，一支既有分工，又有协作；既能发挥各自特点，又有共同工作目标的有战斗力的思想政治工作骨干队伍将在企业的生产和发展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作者单位：广东肇庆啤酒厂

责任编辑：周 华



## 释“肥而不腩”

谭步云

《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上有一语：“……肥而不腩。”

“腩”，字书不载（只有《集韵》把它作为“喉”的异体字收入；《康熙字典》补遗部分有引），学者无考；因此，两千多年来，这句话的诠释便成了悬而未决的难题。

《吕氏春秋》上的这段文字，相传是伊尹说的。参照其他典籍的引文，将有助于理解“腩”的意义。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七“酒食”篇作“肥而不腩”。

《集韵》作“肥而不饒”。

《说文》云：“腩，腹下肥也。”这是腩字的本义；由此，腩字又引申为“肥腩”之腩。

至于“饒”，《玉篇》云：“无味也。”

就《吕氏春秋》的上下文推敲之，《集韵》的引文显然错了（定之为“喉”的异体字，更是大谬）。知道“腩”有“腩”义，接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它的读音了。

在这个问题上，广州方言的存在真值得庆幸。我们几乎不需要论证，就可推定“腩”读作“漏”。“肥而不腩（音漏）”一语不是经常挂在“讲饮讲食”的广州人嘴边吗？

不过，我们应当尊重科学。

腩，从字形分析，当是从肉侯声。“侯”与“漏”属同一韵部（侯韵）。根据音韵的通转规律，“腩”读如“漏”可以成立。

有学者以为“腩”才是粤方言中表示肥腻之义的正字，却是一个误会。首先，“腩”并无“肥腻”之义；《广韵·宥韵》：“腩，嘉膳。”其次，“腩”与“漏”并不隶属同一韵部；前者属宥韵，后者属候韵。因此，应以“腩”为正字。

最后，我们还得花点笔墨演绎一下“肥而不腩”的意义，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肥美而不油腻”。这样解释，恐怕比较接近作者的原意。

# 管好用活资金，使企业经济持续增长

——广东顺德北滘南方电器厂的实践与思考

苏 林

企业的资金，是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其中流动资金的周转速度快慢，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命运，对这一点，我厂是深有体会的。在银根抽紧、资金紧缺的1989年，我厂全年资金贷款额只有1000多万元，远远不能满足企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如何加强资金管理，加速流动资金的周转，继续发展生产，使企业“适变求存”，成为我厂面临的一大课题。为此，我们在抓好企业深化改革、健全企业基础管理工作的同时，着重加强了资金的管理，较好地解决了资金不足的矛盾，保证了生产的正常需要，实现了供、产、销良性循环，获得了较为理想的经济效益。1989年，我厂的定额流动资金周转天数比上年减少7天，相对节约了流动资金147万元，资金利润率比上年提高了12.84%；销售总额比1988年增加了2600多万元，增长55%，实现不变价总产值1.13亿元，创利税1100多万元，比上年增长73%；出口创汇额600多万元。经省有关部门审批通过，被批准为“省级先进企业”、“省最佳创汇企业”。1990年，我厂实现不变价总产值1.366亿元，创利税1376万元，出口创汇600多万元，销售额和职工人均收入分别比1989年增长20%和17%，被农业部评为全国先进乡镇企业，并通过了国家二级企业验收。在今年第一季度，企业的产量、产值、销售额比1990年同期分别增长52%、51%、47%。企业在困难的年头，连续两年多实现了经济的稳步增长。

回顾两年多所走过的路程，我们在管好用活资金、提高经济效益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 一、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实行以销促产，加速成品资金的周转。

首先，我们根据市场的变化，采取应变策略，实行多渠道营销，进一步开拓国内外市场，努力做到“货如轮转”。我厂属外向型企业，1987—1988年出口量占生产量的60%以上，而且出口渠道单一，从属性极大，由于各种原因，1989年出口订单大幅度减少（仅为上年度的40%），直接影响了我厂的生产，企业曾处于“半饥不饱”状态，成品资金的周转遇到了严重的困难。面对突然变化了的情况，我们及时采取应变策略，实行“全方位、多渠道、广招天下客户”的措施，分别以收购出口、来料加工、进料加工、代理出口等多种形式，与多间公司合作经营，稳住企业以外销为主的阵脚，适应了经济形势和市场的变化，使企业顺利地渡过了难关，并为扩大国外市场打下了一个较坚实的基础。1990年，我厂出口势头很好，合作贸易的伙伴越来越多，遍及五大洲。同时，我们还拓展国内市场，销售额比上年增长30%。

其次，选择股实可靠的合作伙伴，适当让利，采取灵活多样的结算方式，加速回收销售货款。例如：在购货单位以“即期汇票”结算的时候，我们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适当让利；当购货单位以“承兑期汇票”结算时，我厂的产品价格则适当提高。另外，为了加速成品资金的回笼，减少仓库的产成品储量，我厂还采用“争取资金、抵押产品、到期续回”的应变措施，以解决最关键时的特需资金，例如：我厂曾向股实可靠的合作伙伴，抵押风扇，争取资金，以解燃眉之急，保证了我

厂生产资金的需要。

## 二、确保生产需要，一切原材料、物料要保质、保用，合理储备，努力做到多增产，少增资。

第一，对主要原材料做到合理储备，灵活使用资金。我厂每年耗用大批薄板钢材，占用的资金数额最大，我们把它视为主要管理对象，一般储备3个月左右。1989年原材料价格波动甚大，对此，我厂采取了价廉时筹措资金多购入，资金不足时赊购（即“借米落锅”）等办法。例如：在经济紧缩最困难时期，我厂仍千方百计搞原材料的合理储备，先后赊入一批薄板钢材，定期3个月付款，加上利息算起来比当时的价格节约了50多万元资金。

第二，对其它原材料就近采购，减少资金的占用。近年来，原材料市场货源充足。于是，我们对部分原材料就近采购，并在互利互惠基础上，与十多个商业部门建立友好协作关系，使老客户都乐意送货上门，并做到验货后才付款，确保外来材料的质量。两年多来，我厂与协作的商业部门彼此信任，恪守信誉，长期合作，稳定了供应渠道，缩短了其他材料的储备期，加快了储备资金的周转。

第三，加强仓库管理，定期清仓查库，及时处理超储积压物资。1989年，为了加速资金的周转，我厂对历年来转产等遗留下来的积压物资进行清仓处理，收回资金50多万元。同时，将仓库积存的呆滞物资，交供销部门推销，将死物变活钱。此外还加强了对仓库的管理，实行定期清仓查库，防止了物资超储积压。

## 三、抓紧资金的回笼，确保生产正常运作。

首先，我厂进一步落实供销人员的岗位经济责任制，努力做到销售货款无拖欠，同时积极清理历年应收欠款。近年来，我厂进一步健全了供销人员的岗位经济责任制，使供销人员在工作上既有分工，又通力合作。

我们对供销人员，实行按销售额和生产额计提浮动工资的制度。同时，为了增强供销人员的工作责任感和资金回笼的紧迫感，对供销员推销产品的浮动工资和业务费，实行货款回厂后才全部发放的办法，并根据货款回收期长短定出发放

比例。这样，既增强了供销人员的责任感，又调动了供销人员的积极性。1989—1990年，我厂除了实现销售收入无拖欠外，还清理追收了历年欠款共70多万元。

其次，收旧利废，增加收入渠道。我厂历来对生产过程中的边角碎料回收工作十分重视，设两人专管，负责处理回收全厂生产过程中的边角废碎料，此项收入，每年可达140多万元。

## 四、内涵挖潜，勤俭办厂，努力降低产品成本，减少生产资金的占用。

第一，我们发动职工“技改”、“技革”，降低产品成本。近年，我厂不断优化产品设计，在绝对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降低了原材料消耗和产品成本，主导产品还连续获省优和全国轻工业博览会银质奖。例如：经技改后，豪华型装饰吊扇每台耗料比原来下降30%；出口的56寸工业吊扇耗料比原来下降2.5%，共节约成本600多万元。此外，工业用、家用排气扇的矽钢片、漆包线等耗用量也大幅度下降。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强了产品的竞争能力。

第二，实行车间定额消耗及经济指标承包责任制，降低物耗，减少资金的占用。两年多来，我厂制定了各车间的定额物耗指标，实行车间、班组、个人物耗指标承包责任制，降低了物耗，收到较好的经济效益。例如：冲压车间的原材料使用是个老大难问题，个别职工片面追求产量，所以不时出现浪费现象。针对这个问题，厂部首先从冲压车间入手，实施物耗定额经济责任承包制，按各类工件核定消耗定额，责任承包到班组、个人，实行“节约有奖，超耗受罚”，并做到月月兑现，现在该车间的废次品率大幅度下降，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第三是严格控制非生产费用开支，保证生产资金的投入。我们对各项非生产性费用开支抓得比较紧，在管理上实行“一支笔审批制度”，把有限的资金用到最需要的环节上。

第四，立足于勤俭办企业的宗旨，提高企业资金的使用效果。我厂曾先后引进了一些较先进的生产设备。但在更新企业设备时，则根据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和承受能力，做到量力而行，不盲目追求国内可替代的进口设备。如：1989年我

（下转第110页）



## 《社会主义辩证法新探》的进展

李恒瑞

由张江明主编、高齐云等副主编的《社会主义辩证法新探》(以下简称《新探》)一书,最近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从理论体系上比较全面地阐述和研究社会主义辩证法问题的学术专著,是我国社会主义辩证法研究的又一新成果。

社会主义辩证法是一门新兴的哲学学科,对它的研究,需要而且已经开始从“搜集材料”的阶段进入“整理材料”的阶段,从分门别类的具体探索阶段进入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的阶段。这是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主义辩证法自身理论探索的必然趋势。《新探》适应了社会主义辩证法理论发展的这种要求,在广泛总结、吸收近几年来这一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新探》认为:社会主义辩证法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发展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应用和发展;它以非对抗的社会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为立足点和逻辑起点,对社会主义社会有机体的辩证运动进行哲学的概括和说明。这门新兴学科的主要任务,是分析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有机体的组成要素、矛盾、结构、功能和运动规律,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和客体、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及其辩证关系;在中国建设和发展这门科学,其出发点和归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探》明确肯定社会主义辩证法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哲学分支学科,并就它的性质、对象、任务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新探》认为,深化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逐步使这门学科具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要建立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理论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基本规律和基本方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学说与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作出自己的理论性的创造,包括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般规律、范畴具体化,以及提出符合社会主义实际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规律等。同时,社会主义辩证法是一门新兴学科,建立其理论体系的过程是一个探索过程,可以而且必然有多种多样的构想,形成不同的学派。据此,《新探》提出了对这门学科理论体系的构想。综观全书,可以看出它在理论体系结构上的一些特点。首先,它以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和客体的辩证关系为基本线索,在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体和客体的关

系之后，分别从客体方面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动力、活力，社会主义社会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的运行过程，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从主体方面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辩证发展，最后归结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这样，在体系结构上突出了马克思关于主体客体及其关系的思想。其次，突出了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为重点，坚持把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揭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的具体性质、过程和特点，在体系的结构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基本原理同社会主义实践的相结合和统一。再次，以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基本的现实依据，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辩证法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体现了该书第一章所提出的社会主义辩证法这门学科的实践性、应用性的特点。

《新探》不仅在社会主义辩证法理论体系的建构上进行了可贵的尝试和探索，而且在社会主义辩证法的若干重要理论问题的具体研究上也取得了新的进展，提出了新的观点。

首先，提出和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客体范畴，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体客体的关系问题。《新探》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系统包括工人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以及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还包括由这些劳动阶级和爱国民主党派组成的各级政权机构以及各种群众组织；社会主义社会的客体系统包括生产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人民民主政权的上层建筑这三大层次，以及社会基本矛盾的结构和运动。《新探》不仅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体客体新质和新特点，而且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主客体关系的实质，就在于它是一个具有相互矛盾而又内在统一的过程——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作用和整体功能，对于全面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些论述，为我们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其次，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包括性质、运动、解决方法和质变量变、否定之否定、社会基本矛盾等，作了集中的系统的论述，并提出了若干新的见解。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论述，在该书中占有重要的份量，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广东近几年来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新成果。例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问题，《新探》认为这是一种非对抗型的社会矛盾，必须承认非对抗性矛盾的广泛性和主导性，其主要表现为差异性矛盾、新旧性矛盾和并存性矛盾等具体形态。又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结构，《新探》提出，应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式这四个基本方面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上去把握和说明社会基本矛盾总体系统，在这个总体系统中，社会基本矛盾不单是两对而是多对，其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根本矛盾，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式之间可以通过直接联系而形成矛盾体。另外，《新探》不仅概括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解决方法，而且还提出评判解决社会矛盾方法的三条标准并突出了是否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根本标准。

再次,《新探》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新探》提出“社会动力系统”的概念,并以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为主线,从构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客体方面的基本要素、社会主义社会机体的矛盾关系、社会主体改造社会客体的社会实践形式这三个方面,考察和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因而更加符合社会生活的实际。《新探》认为,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社会有机体”的思想,在理论上必然引出社会机体活力的问题;而要深化社会主义的体制改革,也必须在理论上说明社会机体的活力及其实现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机体的活力,主要表现为社会机体的自主能力、自我调节能力、自我更新能力以及应变创新能力;增强社会机体活力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是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所要达到的一个重要目标,而改革又是增强社会主义机体活力的基本方式和途径。这些论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积极意义。

此外,《新探》还考察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发展的曲折前进的过程,论述了生产力标准的科学涵义和如何完整地坚持、贯彻生产力标准的问题,研究了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及其与生产方式的关系等。

作为建立社会主义辩证法理论体系的一种尝试和探索,《新探》当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该书提出了“体系”框架的一种设想,但逻辑结构显得松散,贯彻全书的主线不够鲜明。从该书章节的排列来看,是把主体客体的关系放在首要的和中心的位置的,但全书的结构、内容却不能说是紧扣了这个主线,各章的安排有简单罗列之嫌。全书在微观结构上不乏独到之处,但在宏观结构上却没有很好地体现“整体优化”的特点。再如,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辩证法的重要内容,似应有一些专门的章节集中加以论述。全书不少章节在内容上存在较多的重复,一些提法还不够准确、严谨。这些都是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的。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冯生

# 《第三产业经济学》的探索

陈圣河

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三产业经济学》是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研究所李江帆副教授的一项研究成果。它以严密的逻辑论证，系统地探讨了被我国学术界长期忽视的第三产业领域的经济理论问题，构筑起了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新的分支学科。

该书的理论贡献是把非实物产品及其运动纳入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并由此建立起关于非实物产品及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第三产业经济学体系。

首先，书中关于非实物产品及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与马克思关于物质产品及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相对应的。尽管马克思在其经济学著作中，对服务消费品的范畴，以及关于服务生产、交换和消费的特点等问题作予提示式的论述，但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是把非实物产品排除在其研究对象之外的。作者则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对第三产业的某些提示为依据，结合当代世界第三产业发展的实际，建构起第三产业经济学。其次，从方法论看，《第三产业经济学》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而具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特征。比如，建立了与实物产品相对的非实物商品(服务产品)二因素理论、劳动二重性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流通理论等。就是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的具体运用。因而丰富和发展了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它将无形的服务产品纳入社会产品的范畴，丰富了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产品及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概念；它分析了生产服务型商品的劳动的运动性与凝结性、具体性与抽象性、私人性和社会性的矛盾，丰富了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的二因素、劳动二重性的原理；它将服务产品纳入社会流通和再生产领域，丰富了政治经济学的二大部类理论、再生产理论和积累理论；它还在第三产业的宏观规模、供需平衡、分配机制和消费结构等一系列问题上，充实了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最后，《第三产业经济学》以“双重产品观”(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双重四环节观”(即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各自相对独立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形成它的体系的。作者认为，以物质产品为研究主线的政治经济学可称为第一、二产业经济学，而以服务产品为研究主线的则是第三产业经济学，或称第三产业领域的政治经济学，两者共同构成“一般意义”的，关于“三大产业”的政治经济学。这些见解都是作者的独到之处。

综观《第三产业经济学》一书所展示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论基石比较坚固。非实物产品理论是第三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有鉴于传统政治经济学将产品局限于物品范围，从而把服务产品排除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外，作者突破了传统的产品观，把服务产品纳入社会产品范畴，阐发了服务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及其劳动二重性理论；并据此确立了第三产业的服务生产、服务交换、服务分配和服务消费的概念及其理论框架。

第二，理论体系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第三产业经济学》是在非实物产品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深入拓展和系统推论而全面地构筑起来的。首先，作者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将生产领域局限于实物产品创造部门的陈规，确立服务生产概念，以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阐述服务生产及其过程的本质和特点，并建立第三产业宏观规模的数学模型。其次，在流通环节上，作者全面地分析了服务流通以及社会再生产的宏观平衡条件，建立了30个反映服务产品与实物产品在交换中实现供需平衡的数学公式；其三，在分配环节上，作者阐述了第三产业分配水平的变动机制，指出了我国在第三产业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其四，在消费环节上，作者从服务消费的功能决定其产业地位的观点出发，论证了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此外，书中关于服务消费内、外部结构的数学模型，对我国的生产与消费政策的制定，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三，该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颇有特色。一是矛盾的共性、个性分析法。既论证了第三产业与第一、二产业的共性，又揭示第三产业区别于第一、二产业的特殊性。二是动态分析法。作者将经济发展同第三产业的演变联系起来，研究第三产业的演变规律，以动态的观点把握第三产业作为生产的“运动形式”的产品和社会财富。三是科学抽象法。作者舍去第三产业中非本质的、与第一、二产业相似的经济现象，如混杂于第三产业中的实物产品及其部门，重点研究第三产业中本质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经济现象——服务产品与服务部门。四是定量分析方法。这主要表现在通过建立反映第三产业运行机制的规律性的数学模型，在动态上寻求第三产业在特定条件下的最佳规模，预测服务生产和消费结构的演变趋势，为发展第三产业提供数量依据。五是系统方法。作者把第三产业放在系统中进行研究，以整体性、综合性和层次性等观点对它进行考察。

新的研究主线，具有特色的研究方法、扎实的理论分析、内在的逻辑构造，使《第三产业经济学》独树一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理论内容。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经济所**

**责任编辑：黄振荣**



# 中山高新技術產業開發總公司

Zhongshan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Development

Head Company

“中山高新技術產業開發總公司(以下簡稱總公司)為開發區管委會直屬企業,實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經營方式,與國內各大院大所大企業聯合興辦高科技企業,與香港和國外客商興辦“三資”企業,自成立以來,先后和北京四通集團、廣東京粵漢字電腦研究開發中心、香港日超科技有限公司等單位聯合興辦了“中山四通通用機電有限公司”、“中山京粵電子有限公司”、“中山日超電子廠”等十四個高科技企業。目前總公司有固定資產二千多萬元,建成標準廠房四萬三千平方米,今年將投入更多的資金,再建造七萬五千平方米的標準廠房,“八五”期間肩負開發利用完 1000 畝(約 0.67 平方公里)土地,使高新產業在開發區內初具規模。

總公司熱誠歡迎內地各兄弟開發區企業,各大專院校和研究所,港澳同胞和外國客商前來合辦企業,我們將為朋友們創造一流的投資環境,將向你們提供優質的服務。

The Head Company is an enterprise directly belonging to the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of the Development Zone. She carries out the management pattern of keeping separate accounts and assuming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her profits or losses. She cooperates with a lot of universities of the country to establish high technology enterprises, and also some joint-ventures, with businessmen of Hong Kong, Macau and foreign countries. Since the beginning, the company has cooperated with Beijing Stone Group, Beijing - Guangdong Chinese Computer Center, HongKong Golden Time Science Company to establish " Zhongshan Stone General Machine and Electronic Co., Ltd" " Zhongshan Beijing - Guangdong Electronic Company", " Zhongshan Golden Time Electronics Factory " etc. 14 high technology enterprises. Now, she has fixed assets of more than 20,000,000 yuan, constructed standard workshop of 4,399m<sup>2</sup>; this year, she will put much more funds into another standard workshop of 75,000m<sup>2</sup>. During the 8th five-year plan, she will exploit the land of 1,000m<sup>2</sup>, ( 0.67km<sup>2</sup>) to keep the high-tech technology prosperous in the Zone.

The Head Company welcomes the enterprises,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universities of any brother provinces, compatriots in HongKong and Macau and foreign businessmen come up to establish joint-ventures. We will create a first-class investment environment for our friends and we will provide better service to you.



高科技開發區廠房一瞥 a glimpse of the working building in the high technology development zone





省級先進企業

# 廣東省韶關市模具廠



本廠又名韶關鋁合金型材廠，是國家專業化生產鋁型材擠壓模具的重點廠之一。兼營冷沖、熱鍛、注塑等金屬模具。有二十多年造模經驗，技術力量雄厚，近年引進西德、意大利先進加工制模技術，不但擁有先進冷加工及電加工專門設備，而且擁有引進 600 噸擠壓機先進試模設備。工藝完備，質量穩定。兩個主要產品在全國都享有聲譽，擠壓模具 1987 年創省優兼獲全國模展金盃獎；鋁合金型材 1988 年獲省優。1988 年廠榮升省級先進企業。

廠址：韶關市浛江中路 124 號

電話：885574 885793 電掛：2001

郵政編碼：512023

廠長：劉金輝 經營副廠長：曹偉章

